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當下中國「生態博物館」概念與城鄉發展的關聯性探析：

以安吉縣的博物館群為例

An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Eco-museum"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day:
Taking the Museum Group in the Anji County as an Example

姚之璇

YAO,ZHIXUAN

指導教授：林家暉 博士

Supervisor: Francis Chia-Hui Lin,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January 2024

誌謝

曾經有位學長說，論文寫不出來就先寫誌謝，然後我就發現誌謝都寫了好幾版了論文還是沒進度。這本論文得以最終呈現，不僅展示我這幾年的學習和研究成果，同時也更多的凝結了師長、同學、朋友和父母對我的支持與鼓勵。在這裡我也向他們表達由衷的感謝。

感謝指導教授林家暉老師的悉心指導。作為一個第一次寫論文的小白來說，批判性與一些觀念的轉變真的很難，多次陷入描述性和「用假設證明假設」的詭異命題的漩渦中，家暉老師不止一次提醒我並把我拉出來，熱心慷慨的指導讓我的寫作過程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困難。同時感謝兩位口試委員，陳涵秀老師與趙欣怡老師，彌補了我在博物館學的相關研究上的不足，一份不成熟的論文得以被兩位老師仔細閱讀並提出意見，是我最大的幸運，感謝兩位老師的傾囊相授。論文「破破爛爛」，全靠老師們縫縫補補。

感謝安吉博物館的大家，為我提供實習機會，多次幫助並提供我所需的資料，感謝鄉村中遇見的每一位村民，我操著並不熟練的安吉話與各位搭話，村民們也用並不熟練的安吉普通話與我交流，實屬打擾了，感謝各位。感謝父母和親人的理解與鼓勵，陪著我走街串巷去每個村落發現展示館/博物館，也告訴我慢慢來多思考。感謝朋友們在我瘋狂的想法中鼓勵我去做去闖，為我的研究生生活增添一份濃厚的色彩。也感謝台灣大學，讓我的求學生活過的豐富多彩。最後也要感謝長庚醫院的王輝雄醫生，鼓勵我申請台大，讓我與妥瑞氏症做朋友，並適時給我開點「聰明藥」以緩解注意力障礙的問題。

寫誌謝是幸福的，因為會發現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身後還有無數的堅強後盾在鼓勵我前進。在台北求學時，我見了太多如繁星般的美麗城市夜景，終於在2023年12月31日，我見到了阿里山的日出，就像嶄新的2024年一樣。這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我永遠記得那天的日出，清澈且炙熱，就像未來一樣。

寫到這裡也感謝自己，漫長的研究終於告一段落，未來的每一天，我都將以此為傲。最後我還是以大學時期提到的那句話作為我的人生信條：保持熱愛，奔赴山海。

2024年1月11日星期四(農曆臘月初一)

寫於台灣大學圖書館三樓

摘要

本研究以安吉縣的博物館群為案例，探究當下中國「生態博物館」概念與城鄉發展的關聯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生態博物館概念傳入中國，經歷了第一代生態博物館的「中國化」和第二代生態博物館的「專業化」，安吉生態博物館的出現，代表著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朝著「規劃現代化」方向發展。不同於中國第一、二代生態博物館，安吉生態博物館在博物館學範疇中的「地方」性質、在城鄉連結中的特殊性、在區域發展的包容性，所展現的不一樣的景觀，使得本研究之對象安吉生態博物館群變得特殊且重要。因此本研究認為，安吉生態博物館的發展與連結是基於安吉城鄉空間發展的重要文化能動性再現，是存在於當下中國的特殊方式。基於此論點，本研究從新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領域入手，從理論上回顧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突出其「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論述，分析地方感隨著主體的不同而展現的不同樣貌，進而引入「博物館化」(Musealization)概念，以構連博物館與地方，分析博物館化與區域進程的關係，認為博物館化是一個規劃的過程，最後從「包容性」(Inclusiveness)的概念著手，去討論博物館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關係。在田野研究中，分別以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之間的關係作為側重點，論述在安吉縣內的博物館、地方規劃和發展的過程與現狀，首先以博物館學之下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建立做鋪陳，討論博物館的價值與實踐，和其過程中在地居民的身份轉變；其次，將博物館放置於城鄉環境中，討論安吉城鄉空間博物館化的過程，認為這是具有階段性的城鄉改造，同時由於政策的介入，也帶來了政策博物館化；最後以包容性發展的視角，討論安吉城鄉發展，經濟包容性帶來的擴大參與，為當地創造價值，「安吉模式」的市場化和分配制度，也將在地居民與外來創業者也納入其中，共創、共享價值。最終，博物館化構連起地方感和包容性，地方感經由博物館化和包容性的影響，是一個向內和向外的發展過程，而空間博物館化和政策博物館化的過程，也刺激了城鄉經濟發展的可能，但也因此湧現出形象經濟。因此本研究得出結論生態博物館概念是在當下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政治脈絡下扮演文化主體的一種特殊標記，並經由這種特殊標記的情狀介入城鄉空間發展產生特殊的地緣性經驗，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作為一個統一的文化載體，在城鄉中的發展，是經由「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三者的迴圈關係促成的，為中國生態博物館和當前中國城鄉發展提供經驗性觀點，並以此對話新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領域。

關鍵字：地方感、博物館化、包容性、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中國城鄉發展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museum cluster in Anji County as a case stud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concept of "eco-museums" in China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eco-museums into China in the 1980s, it has undergone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eco-museum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Anji Eco-Museum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eco-museums in China towards "planned modernization." Unlike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of eco-museums in China, the Anji Eco-Museum exhibits a different landscape in the field of museology, characterized by its "local" nature, specificity in urban-rural connections, and inclusivenes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the Anji Eco-Museum cluster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subject for this study. Therefor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 of the Anji Eco-Museum are based on the important cultural agency representation in Anji's urban-rural spatial development. It is a unique manifes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ilding upon this argument, the study, starting from the fields of new museum studies and spatial planning, theoretically reviews the concept of eco-museums, highlighting the discourse of "Sense of Place",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Sense of Place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Subsequently,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usealization"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between museums and places,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alization and regional processes, considering musealization as a planning process. Finally,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nes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s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e of Place, Musealization, and Inclusiveness are emphasized, discussing the processes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 museums, loc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Anji County. Firstly, under the field of museolog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ji Eco-Museum cluster is discussed, exploring the values and practices of museums and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during the process. Secondly, placing museums in the urban-rural environment, the process of musealization of urban-rural spaces in Anji is discussed, considering it as a stage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lso resulting in policy musealization due to policy intervent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Anji, the expanded participation brought by economic inclusiveness, the creation of value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market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of the "Anji Model", involving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external entrepreneurs in value co-creation and sharing. Ultimately, musealization connects Sense of Place and Inclusiveness. The impact of Sense of Place through musealization and inclusiveness is a development proces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e processes of spatial musealization and policy musealization stimulate the possibility of urban-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give rise to the emergence of image economy.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museums serves as a unique marker for cultural subjects in th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politic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this unique marker, Anji Eco-Museum cluster, as a unified cultural carrier, develops in urban-rural areas through the cyclic relationship of "Sense of Place", "Musealization", and "Inclusiveness". It provides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logical museums and current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ngaging in a dialogue with the fields of new museum studies and spatial planning.

Key words: Sense of Place, Musealization, Inclusiveness, Anji Eco-Museum cluster,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目次



誌謝.....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次.....	V
圖次.....	VI
表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脈絡.....	1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分析架構.....	13
第四節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博物館學之下的安吉生態博物館群	16
第一節 地方感與博物館.....	16
第二節 從地方到博物館——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建設.....	20
第三節 從博物館到地方——博物館實踐.....	31
第四節 安吉縣的地方感與博物館化.....	36
第三章 安吉城鄉中的生態博物館	38
第一節 博物館與區域.....	39
第二節 從村到縣的空間博物館化現象.....	45
第三節 博物館作為一個政府指標.....	53
第四章 包容性的安吉城鄉發展	55
第一節 包容性發展.....	56
第二節 安吉模式.....	58
第三節 博物館化帶有形象經濟意味.....	69
第五章 結論	71
參考文獻.....	76

圖次



圖 1-1 研究流程圖	14
圖 2-1 第二章分析架構	16
圖 2-2 安吉生態博物館群(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21
圖 2-3 安吉縣歷史人文類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23
圖 2-4 安吉縣方言分佈圖	25
圖 2-5 安吉縣自然環境類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28
圖 2-6 安吉縣產業類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30
圖 2-7 博物館實踐的能動性示意圖	34
圖 3-1 第三章分析架構	38
圖 3-2 景塢村知青大院	46
圖 3-3 餘村-景區公共廁所入口意象	47
圖 3-4 餘村-村屋區供銷食堂	47
圖 3-5 古城村示意圖	48
圖 3-6 景塢村示意圖	49
圖 3-7 餘村示意圖	50
圖 3-8 景塢村圍牆	51
圖 3-9 餘村-景區大石頭	51
圖 3-10 餘村-村屋區窰井蓋	51
圖 3-11 餘村-景區垃圾桶	52
圖 3-12 古城村-村口意象	52
圖 3-13 空調外機	53
圖 4-1 第四章分析架構	55
圖 4-2 景塢村民宿群	61
圖 4-3 餘村新建民宿	62
圖 4-4 餘村-小吃店葉家鋪子	63
圖 4-5 古城村-村內活動展示	64
圖 4-6 餘村-年年有餘研學中心	65
圖 4-7 餘村-咖啡廳	66
圖 4-8 餘村-全球合夥人站	68
圖 4-9 餘村入駐企業/項目	68
圖 5-1 論文結構圖	71
圖 5-2 Mayrand 的創意三角形	74
圖 5-3 安吉縣的創意三角形	74

表次

表 1-1 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史及其特點	2
表 2-1 安吉生態博物館群(鄉村博物館數量匯總及分佈圖).....	21
表 2-2 安吉縣歷史人文類鄉村博物館清單及分佈圖	22
表 2-3 安吉縣方言分佈統計及分佈圖	25
表 2-4 安吉縣自然環境類鄉村博物館清單及分佈圖	28
表 2-5 安吉縣產業類鄉村博物館清單及分佈圖	30
表 3-1 三座城市的五種博物館化過程的方法	40
表 3-2 中國城鄉關係演變和中國生態博物館的關係	4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脈絡

安吉縣位於中國東部、浙江省西北部，是一個靠近浙江省省會杭州市的小縣城，國內生產毛額(GDP)在浙江省排 28 名(52 個縣)，是一個極具特色的生態縣，地名取自《詩經》，「安且吉兮」之意，在 2012 年成為中國首個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的縣城，地處長江三角洲腹地，是上海黃浦江源頭所在地，距杭州市僅一小時車程。近年來，安吉縣從城鄉發展到美麗鄉村建設，從商業中心發展到鄉村民宿，從產業科技到學校融合教育，囊括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

2008 年，安吉縣人民政府根據 2005 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新華社，2008)，提出《建設「中國美麗鄉村」行動綱要》(2008)，提出 10 年左右時間，把安吉縣打造成為中國美麗鄉村。2014 年，由國家金融資訊中心指數研究院研發和編制的中國美麗鄉村幸福指數首次發佈，旨在系統評價中國美麗鄉村創建能力和水準，促進中國美麗鄉村先進模式推廣發展，浙江省安吉縣成為首個樣本(新華社，2014)。因此安吉縣作為當下中國城鄉發展脈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規劃建設「中國美麗鄉村」之後，逐漸發展為「兩山理念」，「生態立縣」從此成為安吉標誌。

立足「生態立縣」，依託「中國美麗鄉村」和「兩山理念」的建設，從 2008 年至今，安吉縣建設了大大小小的博物館 70 餘家，其中一家省級博物館，四十多家村落館和十多家企業館。安吉生態博物館作為一個執行策略的概念在 2008 年開始規劃，提出「一個中心+12 個專題館+多個展示點」模式(潘守永，2014)。一個中心是指位於安吉縣遞鋪鎮的安吉生態博物館，同時也是各專題館、展示點的培訓中心和遊客接待中心，是公眾文化交流、教育、休閒娛樂的集中地。12 個專題館是生態博物館的特色館，主要功能是原真地、整體地、活態地保護和傳承各類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態環境和文化景觀。多個展示點(區)是全縣各鄉鎮在美麗鄉村建設中，挖掘的鄉村文化，反映鄉土特色的「民間博物館」。因此安吉生態博物館在規劃初期，就肩負著保護生態環境和文化景觀，生態環境既包括博物館所針對的對象保護，也包含博物館周圍環境的保護。

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概念起源於法國，1970 年代由法國人 Georges Henri Rivière 和 Varine(2005)提出，作為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的代表，以其突破

傳統博物館窠臼的實驗性，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順流(呂建昌等，2013)。而生態博物館的出現直接影響了「新博物館學」的發展，或者說拓展了傳統博物館學的領域(于國華，2008)。生態博物館在博物館發展脈絡中主要的五大轉變(張譽騰，1996)，從中央威權「由上而下」的形態轉變為「由下而上」的草根形態；經營方式「由內而外」轉向「由外而內」；放棄大理論或大論述，轉變成文化多元性、地方文化傳統、弱勢群體聲音的博物館論述；由「以物為主」的運營基礎轉變成「以人為主」；從過去導向變成現在或未來導向。生態博物館的特質，使得「地方」浮出水面，漸漸開始重視地方特色文化，把人的活動作為核心，發展保育與管理。「地方」、「地方性」、「社區性」等概念不斷被提起並且再次作用於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是隨著人民的主張和需求而改變的，是一個地區「長期自我覺醒過程」，經由地區、人民的決定，一個生態博物館最後也可以被其他發展方案取代(張譽騰，2003)。

表 1-1 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史及其特點

時間	1998 年	2005 年	2012 年
博物館	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	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	安吉生態博物館
稱號	中國第一代生態博物館	中國第二代生態博物館	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
特點	「中國化」和「本土化」	「專業化」	「規劃現代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世紀八十年代，被譽為「中國生態博物館學之父」的蘇東海先生(安來順，2021)，開始在中國實踐和傳播國際生態博物館思想。如上所示(表 1-1)，1990 年代，在挪威的資助和專家指導下，1997 年中挪兩國簽署了《挪威開發合作署與中國博物館協會關於中國貴州省梭戛生態博物館的協議》，自此開啟了生態博物館「中國化」和「本土化」的探索與實踐(廣西民族博物館，2020)，並於 1998 年，中國和挪威共同建成了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隨後鎮山布依族生態博物館、隆裏漢族生態博物館、堂安侗族生態博物館相繼建成，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也被稱之為中國第一代生態博物館。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的建立直接影響了廣西生態博物館的發展，2005 年，廣西省將廣西民族博物館與全區 10 個民俗生態博物館聯結成「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10’工程」的聯合體(廣西民族博物館，2020)，開展大規模的生態博物館建設，廣西生態博物館朝著更「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也被稱之為第二代生態博物館。安吉生態博物館是中國東部地區代表性的生態博物館，代表了第三代生態博物館的類型，安吉生態博物館不同於中國最早建立的挪威式的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安吉生態博物館是政策扶持、專家的指導和居民的參與下的產物(鄧慧超，2015)，更具有中國特色和現代性。蘇東海先生使用「代際」的敘述呼應了希維賀(Georges Henri Riviere)的生態博物館是一種「進化」的狀態(安來順，2011)，換句話說，蘇東海先生認

為安吉生態博物館是獨一無二的生態博物館，不同於生態博物館理念，但又屬於其脈絡。

安吉生態博物館於 2012 年正式開館，強調對「活態」文化的保存，注重觀眾的參與感，以「體驗」、「互動」形式積極傳遞鄉村傳統技藝(黃衛琴，2018)，活化生態博物館群運行模式，創新其道路。結合安吉縣遺產資源，改「一個中心+12 個專題館+多個展示點」模式為「1+X」結構，即一個中心館和多個鄉村展示館組成的館群模式，X 鄉村展示館分佈在全縣各個鄉鎮，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為主要內容，竹文化、書畫文化、畚民文化、蠶桑文化、關隘文化等，是濃郁鄉土文化的綜合。十餘年來，館群規模不斷擴大，模式改變，從規劃之初 26 家發展到如今近 70 家，安吉生態博物館以其豐富的內涵，創新的形式和強大的社會效應，成為安吉美麗鄉村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黃衛琴，2018)。

在安吉縣的博物館中，僅僅只有浙江省自然博物院安吉館不屬於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範疇。在 2018 年正式對外開放，是浙江省首個落戶杭州市以外的省級公共文化設施，是安吉縣唯一省級博物館。浙江省自然博物院安吉館與安吉生態博物館分屬於兩個不同機構系統，其層級也不相同。浙江省自然博物院安吉館不僅受浙江省自然博物院管轄，也受安吉縣文化旅遊局的管控。在安吉縣的博物館中，不同層級的博物館之間相互作用，也構成了如今安吉縣文化面貌和文化規劃。

博物館作為文化資產，但隨著不同的地域想像與政策，往往呈現不一樣的景象，也建構出不一樣的地景(李秉霖，2006)，安吉生態博物館作為典型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產生了不同於第一、二代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地景、形態和樣貌。就博物館學而言，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特殊之處在於是以縣作為基本單位，以國家政策為引導，依託當地縣政府及基層鄉鎮政府扶持的生態博物館。安吉的生態博物館群豐富了生態博物館的區域範疇，將原本「社區性」的尺度擴大，換句話說，安吉生態博物館群融合建立了「社區」與「社區」之間的連結，從而促進整體的發展，並且努力實現中心館帶動「鄉村展示館」到「大千世界」的跨越(黃衛琴，2018)。因而可以說明，在規劃上這樣的連結已經建立了博物館與城鄉之間的關係，換而言之，在政策層面，安吉生態博物館是一種工具、一座橋樑，串聯起城鎮與鄉村的連結，並且影響全縣的規劃。

回到生態博物館概念發展脈絡及特點來看，生態博物館概念讓在地的或社區的博物館，參與了社區賦權(Empowerment)行動，重要性增加(王嵩山，2004)，生態博物館將在社區中扮演協調的角色，並且生態博物館具有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是指藝術品的即時即地性，即它的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呂建昌、嚴嘯，2013)，使得生態博物館建立在原本文化遺產出產地。從區域規劃角度看待，生態博物館是一個工具、一個實驗室，在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脈絡中，第一、二代生態博物館建立在民族文化豐厚，居民卻貧困落後的地方，承擔著社區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雙重責任，而民族文化被整合並且建立起博物館，這樣的過程稱之為博物館化(Musealization)。從博物館環境來看，生態博物館所具有的本真

性，旨在保護和保存其博物館主題的對象，也是整體區域的環境。因此安吉縣的博物館，區別於生態博物館概念和中國第一、二代生態博物館的特點，在博物館學範疇中的「社區」性質、在城鄉連結中的特殊性、在發展上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所發展出不一樣的城鄉樣貌，使得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浮出水面。

因此安吉縣的博物館群區別於生態博物館概念，所呈現的特殊性，展示了自然人文景觀的博物館化過程的同時，還能夠直觀的討論當下中國「生態博物館」概念與城鄉發展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將以此作為問題意識，並提出以下三個具體研究問題：

1. 安吉擁有這麼多博物館背後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政治脈絡為何？這些博物館在不同層級的歸屬下是如何並存並且相互連結的？
2. 以博物館學的角度，在安吉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發展過程中，其博物館群的建立是為了展示什麼樣的權利與知識關係？
3. 在縣域的可持續發展考量下，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作為一個整合文化載體，並且擁有統一的規劃與管理，是如何再現城鄉空間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的形式是如何影響地方建設的？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回顧

由於本研究之對象為博物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由博物館學構連空間分析的認識論，藉由整理博物館學論述、空間規劃的相關理論和中國近代城鄉關係的文獻，為本研究提供研究基礎，最終建立以中國作為研究脈絡，博物館學與空間規劃的理論分析平臺。

一、新博物館學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一) 新博物館學發展理論：生態博物館概念中的地方實踐

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是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下的產物。新博物館概念最早於 1971 年，傳統博物館學與新博物館學在展示、管理、定位等有著本質區別。Varine(2005)指出，新博物館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有前殖民地國家獨立形成的強烈民族意識、有色人種的平等權力鬥爭引發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興趣、學生運動¹、開始重視傳統社會特性、雷同化的傳統博物館，因此

¹ 學生運動(Varine, 2005)：1968 年歐洲學生運動。由一小群知識和政治精英發起的關於社會、文化、教育、經濟根本性問題的全面論戰，引發了學生運動。其鼓勵想象和創造，以及回歸傳統價值。

導致部分年輕學者對傳統博物館不滿。

Peter Vergo(1997)認為，傳統博物館經常通過展示與展示方式本身，改變和調整文物在其收藏中的地位，即傳統博物館是帶有人為意識形態的展示或機構，是威權主義影響下的機構，並在殖民擴張的影響下，來自於其他文化的人工製品、異國情調的自然物品，甚至是「本地人」本身都放在的視野裏(Vergo, 1997)。傳統博物館受到精英主義與殖民掠奪，使「物(展品)」本身跳脫原本出產地，並且使觀眾對「物」的理解，源於人為意識形態下的文字解說，並且有了個人的想像，對於「物」的理解，缺少客觀性與真實性。

因此 20 世紀 60 年代，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嘗試。美國為華盛頓特區的非洲裔居民創造了「鄰里博物館」，重建他們的民族自尊心；瑞典出現了為促進地方文化和外部文化交流的「民族研究」的流動展覽；法國一些地方性博物館得到發展形成「戶外博物館」；非洲為推動多個少數民族文化價值，建立了「國家博物館」。1971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上做出了對博物館定義的修改，要求建立發展非歐洲式博物館模式的願望(Varine, 2005)；1972 年，聖地牙哥圓桌會議將博物館與社會整合在一起的「整體博物館」思想，啟動了新博物館運動的創建(蘇東海，2009)。總而言之，新博物館學運動是學者對傳統博物館學同質化的不滿，轉而探尋不一樣的以民族文化為主的博物館形式，由於殖民者的離開，各地區開始注重傳統民族文化，增強傳統民族文化自信而建立的新博物館。

國際博物館協會於 2010 年出版的《博物館學大辭典》中，最終將生態博物館的表述為：「生態博物館，是一個致力於社區發展的博物館化的機構。它融合了對該社區所擁有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存、展現和詮釋功能，並反映某特定區域內一種活態的和運轉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同時從事與之相關的研究。」Peter David(2011)則認為，生態博物館往往在較小的地理範圍內運作，並帶有地方性，有時是內省的政治議程，即生態博物館帶有的地方性指的是地方特質，是由環境本身和居住在那裏的人和社區來定義的，代表當地社區行事。更有學者認為以生態博物館為代表的新博物館學運動將具有「社會」意味的社區、鄉村或遺址作為傳統博物館反思的實驗室(尹凱，2017)。

綜上所述，在過去的博物館學發展史，和近幾年學者們的普遍認同之下，生態博物館更是一種地方機制，由地方人民自主管理與運營的民間機構，但在中國脈絡之下，這樣的機構有了官方色彩。

(二) 地方感的本土情愫

Yi-Fu Tuan(1977)認為「空間」(Space)和「地方」(Place)的概念需要被相

互定義，如果認為空間是允許運動的，那麼暫停的就是地方。Tuan(1977)從戲劇作品和文學作品中分析，地方的親密性是累積的過程，也是產生地方感的方式之一，認為在度假村無論多麼愉快，都是一種虛假的親密體驗，也就是說，唯有過親密性累積的地方，產生的地方感才是真實的。而人在幼兒時期的大多數經歷，都是在生長的地方產生，這樣的經驗普遍被認為是一種人的本土情愫。與親密性累積的地方感相悖的是虛假地方感，是有一種產業試圖塑造地方的「形象工程」(imagineer)，創造出「獨特性」來吸引注意、遊客，以及最後金錢(Mike, 1998)，這種由外來者創造的、以外來者為目標的空間並不是地域文化的表現。顯然，「形象工程」不是創造地方感的最優選擇，而從地方中來到地方中去，創造屬於地方的本土情愫，才能夠讓地方「人」產生鄉土共鳴，讓外來者感受專屬於本土的「地方感」。

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而命名是賦予空間意義，使之成為地方的方式之一(Cresswell, 2006)。生態博物館從「地方」中產生，因此「某某生態博物館」就成為了「某某地方」的空間意義，使其本身就帶有一種「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向內的「地方感」。地方感為個人主觀所建構，其過程往往受到經驗、情感、記憶等複雜因素混合(Tuan, 1977)，因此「某某生態博物館」就有了「本土化」的表現。政治地理學家 John Agnew(1987)認為所謂的「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Cresswell, 2006)，而張譽騰(2003)強調生態博物館具有的「由下而上」特點，主張地方草根的參與，追求地方與文化的認同。因此，地方草根具有的地方感，並以此建立的「某某生態博物館」，將賦予其「地方感」，是向外疊加的「地方感」。當向內「地方感」與向外的「地方感」相結合，形成並建立起具有「地方感」的生態博物館，將成為「某某地方」的代名詞，也是一種鄉土情愫的展示。具有「地方感」的生態博物館，是認識地方的工具，而地方也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Cresswell, 2006)。

Tuan(1977)認為的「地方感」是親密性累積的過程，是以人為主體，在情感上的人與地方的維繫。而生態博物館概念在世界各地流傳併發展至今，沒有走向「迪士尼化」，其原因是生態博物館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感」，是用於展示地方的工具，也是生態博物館「本土化」的表現。本研究認為地方感作為人的主觀情感，其價值可以表現為人與地方的連結，若作為「本土化」的表現，則可以認為是一種工具，一種尋找並建立博物館目標的方法，因此地方感是主觀情感，也是「本土化」的表現。

二、博物館化(Musealization)是一個規劃的過程

接續上文對地方感的定義，將引入「博物館化」概念。根據地方感建立的博

物館，其本身的「本土化」的表現，將鞭策與發展博物館因應當前社會形勢所產生的「地方感」，並不斷完善生態博物館存在之意義。此節將探索博物館與區域空間的關係，建立博物館學與空間規劃的連結，並認為博物館化是空間紋理改變的過程。

(一) 博物館化與城市化進程

19 世紀後半葉，由於工業興起，鄉村建築等鄉村文化日漸消失，瑞典學者從斯堪的納維亞民俗博物館(Museum of Scandinavian Folklore)得到靈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館——斯堪森(Skansen)露天博物館，隨後這樣的博物館在各個北歐國家紛紛被建立。董元亮等(2013)認為，露天博物館是在室外一個區域通過搬遷、縮微、模仿等手段集中展示某一種或多種文化，以活態的方式向人們展示文化的場所，能夠保留地方特色和社會風貌。露天博物館就像把人置身於博物館中，展示品是摸得著的歷史與民俗，其展示性與傳統博物館發生巨大變化，在露天博物館中，展示性是歷史的重現，工作人員是演員，通過角色扮演或模仿的方式去演繹某一時期的地域歷史，啟發觀眾的理解和思考。萬國博覽會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前來觀賞與獵奇，萬國博覽會代表著現代性最具象征意義的發明(陳其彭，2011)。1851 年倫敦博覽會建造了水晶宮(Crystal Palace)，1889 年巴黎博覽會建造了埃菲爾鐵塔等，大多數博覽會留下的建築都是現代性最好的表達，而 1867 年的巴黎博覽會使得巴黎有機會建成歐洲最美都市，1893 年芝加哥哥倫比亞博覽會讓歐洲都市建設進入美國都市。至此，現代性已經隨著博覽會的發展，深入都市發展，影響了城市建設。而置於博物館，或更為一般性地，將一個生活場所——如人們的主要活動地點或自然景點變成一個博物館，這樣的概念在《博物館學關鍵概念》(2009)裏就是「博物館化」。捷克博物館學之父 Stránský 提出「博物館性」(museality)為博物館學範疇中人與現實(reality)的互動表現，這種關係既是知識也是價值判斷，為了傳承給未來社會而挑選出具有價值的物件置於博物館內(李思薇，2019)，「博物館性」的載體就是博物館「物」。「博物館化」是人類對物的一種獨特的認知與態度，其本質是將物從現實時空中抽離出來，使「物」轉變為「博物館物」(Desvallées, 2009)。

露天博物館和博覽會的發展，使得展示性從以往精英主義轉變為逐漸平民化，並且大型建築的產生，影響了都市規劃的走向。隨著西方殖民勢力的擴張，博覽會逐漸變成展示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的舞臺，而在亞洲，部分前殖民地國家的博物館，主觀的記錄亞洲歷史，以遵循特定權利/知識操縱所形成的的特定意識形態(Lin, 2021)，博覽會逐漸具有的政治性，開始肆意瘋長，成為國家貫徹意志的工具(陳其彭，2011)，權利的拉扯，知識的操弄，使得歷史成為最本真的存在，而歷史遺產的博物館化，是國家主體意識的再現，被政治操弄的歷史，又將如何在政治博物館化的形勢之下真實的呈

現。歷史本就是勝利者書寫的故事，那這樣的具有主觀意識的歷史，或充滿批判意味的野史，如何清晰的辯證的看待，這將成為每個人需要學習的課題。撇除歷史是否具有主觀意識，卻都已建立成為博物館，我們將以何種姿態去面對歷史，殖民地人們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之上、帶有殖民色彩，還是另闢蹊徑，完全捨棄殖民，本研究或許無從得知也不做討論。但歷史遺產的博物館化卻真實的影響了城市空間的佈局與走向，這也反過來影響了博物館。

Pınar Aykaç(2019)通過分析伊斯坦布爾半島的Sultanahmet特區城市空間的改變，來論證博物館化是推動歷史城市轉型的變革過程之一。Sultanahmet特區作為歷史名城，被設想為「博物館區」，文化主導的城市復興成為一項主要政策，通過廣泛重建Ottoman時期的建築，優先考慮歷史，因此「博物館區」的計畫刺激了城市轉型，並且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時間的積累與連續性，解釋了城市形態通過博物館化的過程進行操縱。1970年代，Sultanahmet特區的紀念碑和博物館吸引了許多遊客，因此，當局認識到旅遊業的經濟效益，支持該地區以旅遊業為主導的復興。Aykaç認為，歷史遺產的保護和旅遊業的發展，是Sultanahmet特區博物館化的催化劑。隨著歷史城市被再脈絡化為文化遺產，歷史建築成為文化保護的焦點，卻忽略了社會因素，附近的建築被徵用，在地居民疏散，進駐一批「商人」，居民日常生活被抹殺，取而代之的是旅遊業主導的相關活動。因此Aykaç得出結論，博物館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並且有三種方式擴大其在城市環境中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歷史建築和遺址的物理改造，第二根據保護理論和意識形態的轉變，改變對歷史遺產的觀念，第三是通過與居民的日常生活進行社會互動。

在中國研究脈絡中，權利的單一性使得「博物館化」簡單的成為一種政策，權力的拉扯也轉變成為政府與地方的關係，即針對政府政策，地方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利，但保守主義的規範之下，大多數地方以不出錯為原則，建立博物館，雖促進了博物館化進程，但也限制創新的、另類的發展。近幾年博物館青年人的創新廣泛受到國家認同，但大多以理論為主，因此，中國博物館之路還在緩慢穩步向前發展中。

在該「地方」建立的，具有收藏、展示等博物館功能的展覽或類似博物館形式，皆有可能成為博物館建構出來的「網路」的一部分，而這些不完全的博物館被稱為「類博物館」(quasi-museum)或衛星站(慕思勉，1999)。而地方為了全區域博物館的運營與發展，將這些「類博物館」納入管理組織，以一個或幾個規模較大、較正式的博物館擔任中心館，賦予其資訊、管理等職責，從而形成博物館群。在當前博物館學走向和空間規劃的相互影響之下，博物館化已經不單單是博物館建立的形式樣態，而是博物館建立與其周邊環境規劃的過程，成為縣域博物館化的過程，博物館化又反應了空間紋理的改變，將社會目光轉移至鄉村，擴大了對鄉村發展的範疇，因此，博物館化是博物館學在空間規劃中的過程。



三、包容性(Inclusiveness)概念之下的中國城鄉關係

根據前兩節內容和本研究之對象，本節需要梳理中國情境之下的城鄉關係和理論基礎。回顧近代中國城鄉關係，改革開放²成為歷史節點，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擔任不可或缺的作用，而 2012 年推動的包容性發展，成為另一個重要時間點，為後續新型城市化進程提供理論依據。

(一) 從分割走向融合：近代中國城鄉關係概況

規劃的過程和結果在不同的環境中是不同的，有著不同的歷史能力和規範(Fainstein, 2016)。中國自 1949 年以來，由於特殊國情及政策的導向下，在建國初期，著重優先發展重工業，因此逐漸建立起城鄉分割的體制。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改革開放成為重要歷史節點，城鄉分割的局面被打破，城鄉關係不斷走向融合(張海鵬，2019)。

20 世紀 5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的從 1953 年到 1957 年發展國民經濟的計畫(以下簡稱「一五計畫」)的主要任務有兩點，其一是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其二是加快推進各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工業方面，集中主要力量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建立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等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由於當時中國社會貧窮落後，選擇集中農業剩餘以支持重工業的發展，政府也相應出臺一系列平衡工業和農業的適配管理辦法，因此構成了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為了保障二元經濟體制的運行，政府在社會領域也建立起城鄉二元體制(張海鵬，2019)。張海鵬(2019)進一步指出，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城鄉二元體制基本概括為五個方面：採取犧牲農業的工業化模式；按照計畫配置城鄉要素資源；實行偏向城市的建設投入機制；對農業進行非常規的控制；建立起城鄉分立的福利制度。中國城鄉關係呈現分割局面。

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生產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加強了農民和農村社會的自主權(張海鵬，2019)。1984 年之後，政府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支持，因而成為城鄉經濟和工農業生產的重要紐帶和橋樑(蔣永穆、胡筠怡，2022)。1998 年特大洪水災害暴露出政府在農業投資上的問題，因此政府才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力度(秦富等，2006)。整體來說，二十世紀末，中國城鄉關係在農業政策和經濟政策的作用下，二元分割的局面逐漸破冰，是城鄉關係的「搖擺時期」(王大偉等，2021)。

城鄉二元體制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張強，2013)，那「城鄉一體化」

² 改革開放：是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實行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資料來源：<https://reurl.cc/M0kj2K>)

是為解決城鄉二元體制產生問題的政策。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城鄉二元體制開始鬆動(張岩松，2013)。經過幾年的探索，政府對於破解城鄉二元體制的思路更加明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成為構建新型城鄉關係的新目標(張海鵬，2019)。200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人民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七大」)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政府主導構建城鄉融合機制的進程開始駛入快車道(張海鵬，2019)。

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共十九大正式把中共城鄉關係從統籌發展、一體化發展推進到融合發展階段(孔祥智，2021)。中國近代城鄉關係，即從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到城鄉融合，這種層層遞進的關係(孔祥智、張效榕，2018)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鄉村振興戰略應運而生。

包容性的概念對中國城鄉關係發展具有理論和現實前瞻性(張明鬥、王雅莉，2012)。根據上文可知，城鄉關係在分割到融合的過程中，城市出現空心化、鄉村存在農村病的現象，導致城鄉不均衡發展，張明鬥(2012)在文章中提出包容性發展的內核，從發展主體的全民性、發展內容的全面性、發展過程的公平性和發展成效的共用性著手，提出中國城市化道路包容性發展的最優路徑。以上研究對中國城市化的包容性發展進行了分析，但卻忽略了城鄉發展二元體制的威脅。因此徐偉(2013)針對城鄉關係提出了四點舉措，即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發展以城市網路為基礎的城市群，增強對人口的吸納作用；深化土地改革，加快農村建設；加快教育、社會醫療保障改革，構建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包容性發展其實是共用機制的發展，要照顧弱勢群體，從制度上避免城鄉差距過大(徐偉，2013)，從而推動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 包容性的理論研究

空間中的包容性概念多以包容性城市概念為主，包容性城市概念源於1995年世界社會發展會議(The 1995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在哥本哈根通過的「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red)的發展方針。早期關於包容性城市研究主要關注經濟的不平等造成發展的不均衡，Liu等(2020)在文章中指出，從最早的建議增加窮人對公共決策的參與、加強基礎設施的治理，到關注教育、種族、性別、福利等的不平等，到2001年聯合國人居署將包容性城市定義為「每個人，無論其經濟手段、性別、種族、民族或宗教，都能充分參與，城市必須提供社會、經濟和政治機會」，包容性城市都是以社會性為主的概念，而在2017年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擴大了其定義，引入解釋了「包容性城市」的基礎：

(i) 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綜合城市規劃；(ii) 知識和資訊共用；(iii) 公眾參與和貢獻；(iv) 確保弱勢人口適足生活水準機制；(v) 地理和社會流動性；(vi) 商業環境和扶貧融資服務；(vii) 應對全球環境和社會經濟衝擊和威脅的能力；(viii) 確保可持續使用其資源的機制。(Z Liu et al., 2020)

根據上述解釋可以認為，ADB在社會領域對「包容性城市」有更清晰的看法，也更著重於地理空間。Anttiroiko等(2021)則認為，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ies)是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政策概念，是從社會角度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Anttiroiko(2021)在書中討論了包容性的各個方面並且建立了一個全面的概念架構，展示了當決策者促進社會經濟政治時做出的努力，並且認為多層面的城市包容，是旨在擴大參與為當地價值創造做出貢獻，有助於解決城市快速發展帶來的「碎片化」(fragmented society)問題(王政琪，2017)。Anttiroiko(2021)在書中舉例，Helsinki包容性被納入城市規劃的日常運作原則；在Barcelona，現代化與技術民主化相互融合，為包容性提供新的工具，並且強調公民社會和公民參與；Potlan認為包容性城市是致力於促進經濟包容的關鍵；Bittsburgh則將包容性納入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政策。在這幾個案例中，包容性城市被當做一個政府政策，著力從社會發展中促進經濟的發展，又產生經濟包容性來促進社會包容性，以此形成良性迴圈。因此包容性發展不僅僅局限於城市建設，還突出表現在經濟發展中。

城市在面對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的作用之下，城市空間都會有所變化，而城市空間都以建築形式來構成。Crysler(2012)等用地方化(provincializing)、世界化(worlding)、聚集(gathering)來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一種時間模式和思維方式，關注全球化世界中圍繞著不同問題的複雜性和矛盾，他們認為建築是包含了地方化、世界化和聚集的形式，是一種物質實踐，不僅收集了技術和材料，還搜集了人和它們的社會互動。用Crysler的話來說，如果要代表和干預建築環境與整個世界不斷變化的條件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對其不斷修正和保持開放態度。間接說明包容性擁有的有根據的包羅萬象的性質，在建築領域應當擴展其範圍，建築環境指的不僅是建築還包括其周圍環境。就本研究而言，博物館建築作為博物館規劃的主體，其周圍環境理應被納入考量，而事實上在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在規劃之初，建築周圍環境就被納入考量。

不同於Crysler從建築角度審視空間，Larice(2012)等從歷史和當前的挑戰來作為切入點彙編成書，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城市設計圖景。Larice(2012)等提供了一系列城市設計的基本原理和策略，為了加強地方的自然認同和創造流連忘返的地方，Campanella(2012)在此書中認為，中國城市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使得中國城市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發展趨勢，但當中國成為了世界前列經濟體，這些破壞開始被人們意識到，

Campanella並沒有根據中國歷史國情做闡釋，他認為中國太過重視大都市的發展，反而遺忘了建成這些大都市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不得回到鄉村或者前往另一個大都市的發展中，從而導致貧富差距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而事實上，在 2000 年代初期，中國已經認識到城鄉分裂的局面，並以政策加以調整。和大部分國家一樣，當經濟不斷向前進的同時，從理論上說其資源、人力等，不論主動或被動，都會朝向周圍地區擴散，因而城市擴張，本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包容性發展的效益。Fainstein (2015)在彙編書中強調了城市環境中的規劃、追求社會公正作為規劃活動核心目標的挑戰，以及對規劃工作的批判性社會科學觀點的重視。特別是在第五部分，關於全球化世界中的規劃，詳細闡述了對於日益變化世界的規劃者重要性。其中Friedmann(2015)認為地方的恢復，特別是城市地方小空間，如何釋放建設性能量，收回旨在實現利潤最大化和狹義效率的社會力量，他相信，通過關注和復興城市社區，可以使城市重新人性化。Friedmann補充了對「地方感」的論述，同時認為可以從被忽略的小空間，例如社區或鄉村，去重新思考城市規劃與城市建設。包容性城市的概念最終回到「地方感」。

經濟流動、人口遷徙、城市擴張等因素，勢必會影響鄉村消失或縮小，從而喪失了人類最本真的家園，如果以鄉村出發來理解城市擴張，大城市人口朝向鄉村遷徙，從而使得鄉村面積擴大和鄉村整治力度加強，是否可以認為是鄉村發展促進解決了城市發展問題，換句話說當人們意識到鄉村可以作為一個中心而發展時，或許城市問題就有了緩解的理由。

由於中國城鄉關係長期處於分割狀態，且規劃中心與重心普遍落在城市，使得鄉村被忽視。而在一系列對於鄉村的政策實施之後，城市、鄉村的關係逐漸被打破，處於邊緣位置的鄉村開始發展，雖然中心-邊緣這樣的權力關係並沒有被顛覆，但鄉村的發展在不斷重視的同時，城市、鄉村之間的距離被縮短。關於鄉村的發展政策，實則是包容性發展的策略，縮短差距，協調發展，使得重心開始偏移向鄉村。結合上一節對於生態博物館的論述，本研究認為，生態博物館將作為包容性發展的手段，是拉近城鄉關係的媒介，在其博物館功能的基礎上，增加空間規劃領域的作用，包容性理論的在地發展，也體現了「地方感」。

關於前文關於「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城市」概念，在本研究安吉縣城鄉發展中，包容性城市概念體現在地方感中，而地方感促進了博物館化的發展，博物館成立越來越多，或許可以以博物館為中心，擴大其建築環境的包容性，從而以鄉村發展為中心，實現城鄉發展，以此形成良性迴圈。

第三節 分析架構



本研究以安吉縣的博物館為例，探究生態博物館與城鄉發展的關聯性，延續文獻回顧中對「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的論述，以「博物館化」作為切入點並從三個層面進行分析。第一個層面，以地方感作為分析主軸，結合安吉縣的博物館價值和實踐，討論博物館學之下的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中，地方感到博物館化的過程，可以發現對於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來說，地方感包括對安吉縣的歷史人文、自然環境和產業等因素，並且在博物館化的過程中，地方感試圖成為博物館的價值所在，博物館的實踐也試圖靠近地方表達地方感，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在地居民的身份轉變的過程來深入討論並總結這兩個方向，指出其背後的知識關係。第二個層面將博物館放置於區域中，討論城鄉空間中的博物館化過程，在安吉城鄉中的生態博物館，通過安吉城鄉中從村落到縣域的博物館化過程，並且伴隨政策介入，使得城鄉空間發生改變的過程，指出其背後的權力關係，這一階段是將本研究引導向空間規劃領域的關鍵層面。第三個層面則是以安吉縣的城鄉發展為主，在減貧目標下，包容性的發展在安吉縣形成「安吉模式」的發展方式，並以第二個層面中博物館化的結果來促成經濟發展，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回應並促成第一階段中在地居民身份轉變的過程。最終以這三個層面，構連起「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之間的關係，以安吉縣的城鄉發展，呈現生態博物館與空間規劃的結果。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結果將豐富安吉生態博物館和安吉城鄉發展的論述，並且回應當前中國生態博物館和中國城鄉發展，對後續新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領域提供實踐經驗和見解。

第四節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一、方法論

本研究企圖從生態博物館和空間規劃領域的相關概念出發，以「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的論述視角，展開對安吉縣的生態博物館群為經驗性案例的分析，試圖經由建立新博物館學、中國生態博物館和城鄉發展之間的對話，來論述生態博物館概念和空間規劃在當代範疇下的區域性扣連。如下(圖 1-1)所示，為聚焦本研究之經驗性案例的特殊性，文獻回顧將涉及生態博物館概念和空間規劃領域。在研究操作上，首先回顧當前博物館規劃理論與研究和中國近代城鄉發展的現況，其次從現況研究中整理出「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三個理論概念，並確立其迴圈關係，即地方感促進了博物館化的過程，並且博物

館化的結果也擴大了包容性的範疇，區域的包容性發展也體現了地方感，這樣的迴圈關係為新博物館學、中國生態博物館和當前中國城鄉發展提供理論與實踐觀點，最後，新博物館學等通過對照經驗性案例，以對話生態博物館概念和空間規劃。

「地方感」作為新博物館學中生態博物館概念的觀點，是從具體地方剝離出來的人為感性經驗，亦可以生態博物館為主體，在不同的地方提煉不同的地方感，這會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博物館化」作為生態博物館概念和空間規劃共同促成的概念，是地域文化的重新建制的過程。對空間規劃的「包容性」發展做相關理論論述，其廣度超越了「社區」的局限性，並且在區域發展擴大參與，考量在地居民和外來創業者，共創、共享創造的價值，最後包容性的發展回饋於地方，以形成循環模式。上述這三者的迴圈，其結果是通過博物館的價值和實踐，促成區域空間的博物館化過程，並在包容性的發展之下，發展經濟以回饋地方，這樣的過程建立起新博物館學與空間規劃之間的連結，也為中國生態博物館與城鄉發展提供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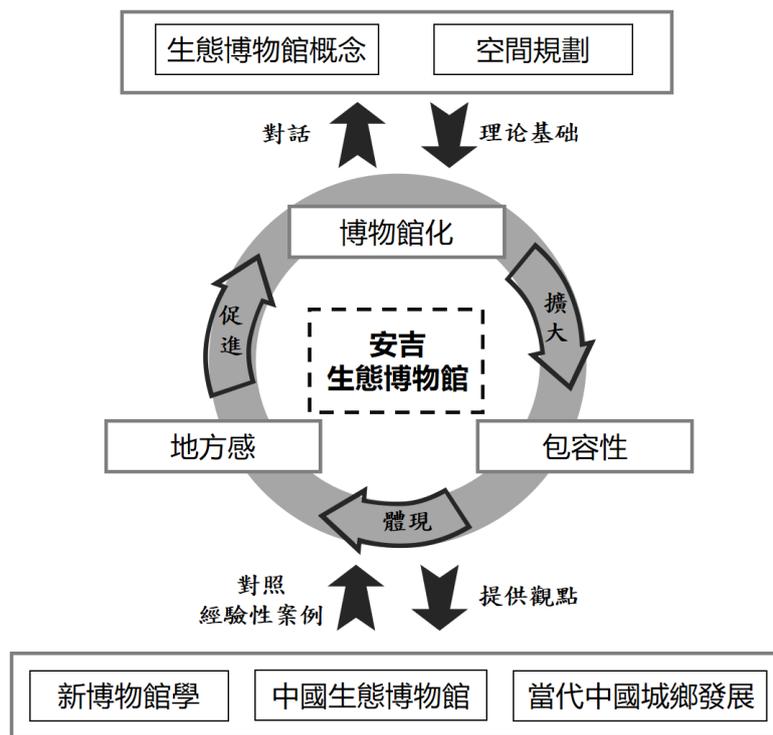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將通過批判性的文獻回顧(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和觀察法(observational survey)的方式展開研究脈絡，探析生態博物館在城鄉發展中的作用，最終以文獻案例回顧和田野資料敘述作為內文的寫作模式。批判性的文獻回顧以國際學者的理論研究、地方知識和地方官方新聞報道和政策文件為主，以利從學術和政策中對該層面的論述有清晰和首要的認知，另外，遺憾的是安吉生態博物館的官方網站已於 2021 年關閉，因此本研究大部分相關新聞資料，多是以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的信息和安吉日報的新聞報道為主。理論研究主要圍繞「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三個方面進行，包括新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領域等的文獻，並結合地方，為整體考察作為論點分析提出基礎。

通過對安吉縣的生態博物館群的觀察，完成田野的論述，在田野初期尋找適合的博物館發展研究，最終以其獨特的地方感，顯著的博物館化現象和不同形式的經濟發展形式等原因，本研究選擇以景塢村、餘村和古城村內的博物館代表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在安吉城鄉中的發展，但是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內的博物館數量眾多，本研究僅以「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作為普遍特殊性，來選擇適合具體分析的村落，安吉縣村落的規劃和發展模式並不局限在這三個方面，還有少部分以其他形式為主發展的村落，本研究並未提及。

通過研究者自身經驗，進行博物館內外的觀察，主要以鄉村中的博物館建立、博物館在鄉村中的發展、博物館群在縣域的整體發展、在地居民與之的連結、鄉村發展的經濟活動等的觀察為主。企圖從上述文獻研究發現整合後所提出的批判性觀點，對照經驗性案例，爬梳並總結研究成果。本研究以安吉的經驗性案例比照新博物館學、中國生態博物館脈絡和當代中國城鄉發展，提出以生態博物館做為概念介入城鄉空間發展文化能動性的批判性「當代中國經驗」。

第二章 博物館學之下的安吉生態博物館群



生態博物館往往在較小的地理範圍內運作，並帶有地方性的，代表當地社區行事(Peter, 2011)，因此生態博物館將地方和博物館聯繫在一起，部分博物館以在地文化作為博物館主題，並且在本研究案例中，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也是如此，將在地文化作為鄉村博物館的主題，並成為博物館本質，成為順應趨勢的現象。地方文化凝聚著地方記憶，地方記憶經由長時間情感累積成為了地方中的特殊情感，這樣的情感就成為了地方感，因此地方感就成為了「促進博物館化」條件之一。

本章將致力於論述地方感是如何被展示，並且以博物館的形式呈現。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如下所示(圖 2-1)，首先從文獻中論述地方感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指出雙向的影響結果，即通過地方感為之建立的地方博物館的博物館化現象，是博物館價值的體現，以地方參與的展覽來表達地方感而建立的，從博物館到地方的影響，則是博物館實踐的結果；其次以安吉縣為例，以雙向的影響結果為其餘兩節，藉由這樣的分析方式，在中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影響下，建立安吉地方感與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連結，以此回到論證地方感與博物館化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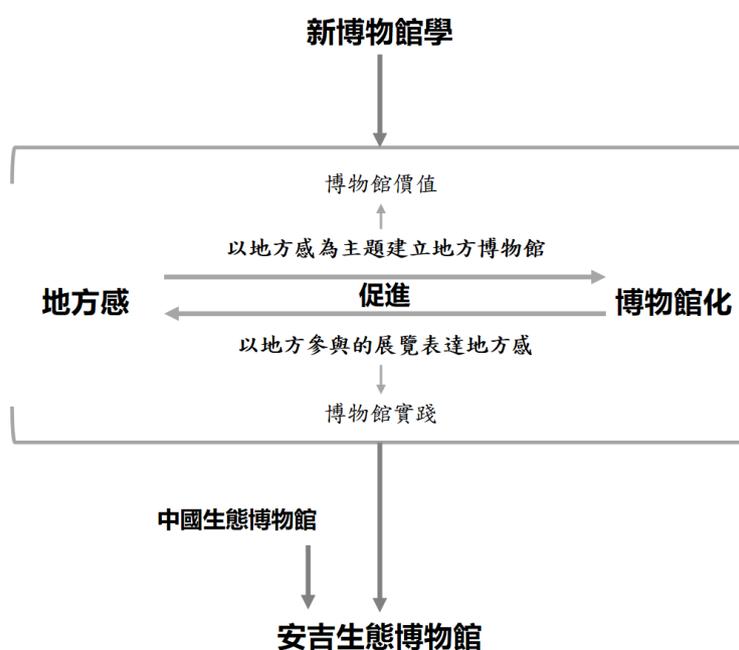


圖 2-1 第二章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一節 地方感與博物館

過去博物館學這門學科一直致力於博物館的理論化論述，1977 年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ICOFOM)成立；1972 年智利聖地亞哥圓桌會議和拉丁美洲人對以歐洲為中心的博物館概念的批判性討論；20 世紀 80 年代初，法國出現的「新博物館學」運動，並伴隨著第一批生態博物館和社區博物館的出現，特別是第一批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訂與開始實行，這些事件有助於打破以歐洲為中心的博物館學和博物館觀念(Guedes, 2021)。

在過去的實踐中，這樣的運動不斷迫使博物館學尋求「理解實踐博物館學、參與博物館化過程的主體，和群體從內到外的經驗之間的聯繫」(Brulon, 2019)。博物館化被理解為「生產價值和創造現實的社會行為」(Brulon, 2019)，以及 Stránský 將博物館視為與社會功能相關的目的手段方式(Dolák, 2017; Brulon, 2019)。在新博物館學運動之前建立的被稱為「實驗博物館學」的實踐理論框架，在其分析中促進了「致力於並向不同價值制度開放的博物館學」(Brulon, 2019)。它構成了博物館學的方法論和框架，將博物館化理解為「作為集體過程的價值生產和實現創造的社會行為，博物館學和博物館是社會變革的平台」(Brulon, 2019)，前人論述使得在博物館學的發展史上出現轉折，即朝向「社會變革的平台」發展。博物館學的轉變和發展方向，使得博物館從保證國家話語權的層面上，轉向落地到地方，成為地方論述的工具，至此，博物館學更加貼近地方，試圖融入地方發展。

在科學的博物館學和博物館學發展方向的指導下，建立地方博物館成為主要方式之一，本節從兩個方面切入地方感與博物館化之間的關係，分別以 Cristiane(2023)在巴西社區的社區博物館實踐，和 Guedes(2021)為印第安人博物館展覽的實踐為主，從以地方為主題建立博物館，和藉由博物館展覽詮釋地方的兩方面出發，分別論述從地方到博物館，和從博物館到地方的雙向關係，並產生的結果。

一、地方感的博物館化

博物館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Cristiane(2023)藉由創造巴西社區博物館的過程中涉及到的博物館化過程，討論濃厚記憶(memory spots)的博物館化的內容和方式，並指出通過參與式的方式，提高認識和培訓，對於喚醒社區記憶這一願望是非常重要的，這些記憶被構建為博物館化的過程中，優先考慮的不是博物館物的形成，而是地方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文中指出，「社區倡議中心是相對於政府自主成立的，由社區自己以參與的方式管理，用於識別、研究和推廣其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並使用社會博物館學方法，旨在承認和評估其集體記憶」(Cristiane, 2023)，因此在這些空間中涉及的博物館化過程，旨在討論所謂濃厚的記憶中博物館化的內容和方式。

首先，Cristiane 就拋出了核心問題，為什麼要建立博物館，他認為這是一個記憶、文化和鬥爭的故事，有必要通過社區或團體形式的程序，讓地方重回記憶中，即成立委員會以管理每一段濃厚記憶，並且納入與之相關的文獻和研究，拯救記憶，並在專家的幫助下，通過合作和參與的行動研究，從每個社區之間的關係，將建立博物館成為一個工具化的行動。換句話說，博物館專家通過分析地方資料、走訪等田野研究和訪談，確立普遍認同的記憶節點，並開辦研討會或展覽，來講述一些關於當地歷史，整個社區被理解為一個記憶的區域。

至此 Cristiane 就又提出了另一個核心發問，這些記憶節點和歷史如何博物館化。在這裡，記憶被理解為一種隨著人口移動的動態呈現，在記憶節點上，參與式的發展讓記錄集中在記憶的生產上，並發展出了「記憶節點收藏保護」的拓展項目，同時與大學和其他博物館倡議建立夥伴關係，這是被認為這成為記憶節點博物館化的工具，除了空間層面，並保留獨立性，記憶被集體建構又分散在區域內，在地居民的記憶收集中，分享記憶，賦予記憶一種歸屬感。同時文中也指出，地方的記憶節點被權力關係所插入，自然的就包含了衝突和對抗，因此 Cristiane 在文中也強調，不能忘記領土特性概念的戰略房門之一，是居民的歷史建構以及從這些做法和經驗中產生的歸屬感，這將成為參與過程中與國家關係的戰略工具，實現形成公民空間的目標。本研究認為，Cristiane 是在提醒，在地方記憶的博物館化過程中，應當釐清社區的範圍，並且區分記憶節點的原生性，和博物館化的政策建構過程中產生的所謂地方記憶。

在記憶博物館化行動中，廣泛收集的當地記憶又賦予其一種歸屬感，這樣的地方感建構，是人們對地方情感的再現，或者是喚醒了當地人對於腦海中對巴西社區的想念，在文章中 Cristiane 強調，居民對記憶的渴望，為那些重視為他們說話的人提供了關注，但也在該案例中指出，記憶節點的創建和維護，涉及地理、身份和政治問題，因此也成為衝突標誌，地方記憶被權力關係插入，自然而然就包含了衝突和對抗。這樣情況下建立的社區博物館，是最能直觀體現社區的，以人為主體的地方感，連結到地方，成為一種特殊記憶，是地方感促成了博物館化的形成，而博物館本身也是地方的代名詞，是「本土化」的表現。

在這一部分中，地方感的主體性就能夠分為歷史人文和博物館化建構中產生的地方感，因此這樣建立的博物館，是能夠代表地方成為地方感的集大成者，是地方感到建立博物館的過程，是一種博物館化，並且同時帶來的也是權利介入後的結果。

二、博物館展覽中的地方參與

不同於 Cristiane 將博物館專家直接介入地方採集記憶節點，並以此建立博物館的方式來表現地方感，Guedes(2021)藉由以原住民參與里約熱內盧的印第安

人博物館展覽的事件為例，討論博物館化範式的轉變，和博物館、人類學家和原住民之間的「參與系統」所發生的轉變。

2002年3月22日，Dominique Gallois 策展的「時間與空間」：Amazônia”Wajãpi 展覽開幕。這次展覽應博物館和策展人的要求，遠距離製作展覽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因此 Wajãpi 人來到博物館，在博物館內建造了一個傳統 Wajãpi 房屋，Guedes 認為這是將原住民放置於物品市場，從而在博物館和土著質檢建立新的關係。在展覽籌備過程中，原住民積極與博物館學家和博物館工作者合作，突出他們的意見，協調展覽的安排，並根據他們的信仰指出是否允許。這樣的跨文化對話使得 Wajãpi 人這樣的原住民能夠創造一種自我文化的敘述，換句話說，通過在地居民論述中的在地文化，帶有地方性。在展覽中，從對象的選擇和收集收集開始，到最終展覽中發生的交流和衝突，都應當保障原住民的話語權和控制權，這也是地方性的有效保護。同時 Guedes 也指出，並沒有任何指導手冊能夠明確在地居民如何有效的參與博物館化進程，並保證他們有控制文化的權利，因此這是需要機構去實現，這裡的機構，泛指地方博物館。

Cristiane 案例中的專家，更像是政府工作者的角色，其本身帶有一種行政上的工作感，這樣直接收集而來的博物館化，和參與式的博物館化就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地方感是激發博物館化形成的因素之一，並且伴隨著博物館化過程中產生新的地方情感，博物館化作為博物館學的方法論之一，連結了地方感到博物館的聯繫。

在這樣的博物館展覽中出現的地方參與「合作」和「夥伴關係」提及很多，更突出了一種平等關係，在展覽過程中展示的地方性，不僅是展覽本身的地方性，還有過程中湧現的地方性，是博物館化產生過程中的地方性，因此，就像是生態博物館內在和外在的地方感，博物館化也伴隨著內在和外在的地方感，這樣的地方感能夠將地方與博物館融合在一起，使得地方感能夠呈現在博物館中，也能夠是博物館能夠代表地方成為地方標誌。

綜上，不論是地方感的博物館化，還是博物館展覽中的地方參與，是涉及博物館展示、博物館實踐和博物館話語權的，在建構過程中都離不開地方感的建制，如何表達地方感是通過博物館活動的方方面面的，完全顛覆傳統博物館中藏品的唯一性，當然受到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衝擊，各個地方似乎趨於一致，因此在地居民成為重要角色，也成為博物館工作的重要一環，因此博物館的地方感，將成為博物館建立和發展的基礎，地方感和博物館密不可分，也是「促進博物館化」條件之一。

第二節 從地方到博物館——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建設

承接上文，在博物館學的影響下，地方感的博物館化使得博物館存在的意義離不開地方，本節將回到本研究的對象——安吉生態博物館群，探索安吉生態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及其背後的文化脈絡與政治經濟。由於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內，博物館數量眾多類別混雜，因此本節首先將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內的博物館進行分類，在各類別中分別回顧背後的歷史人文、自然和產業發展史，以論證在安吉案例中，從地方到建立博物館的正當性，並以此驗證地方感的博物館化現象。

截至 2022 年 7 月，安吉縣共計 73 家生態博物館，其中 1 家中心館和 72 家鄉村博物館，縱觀全部博物館，本研究大致將其分為三類：歷史人文類、自然環境類和產業類，這三個類別分別對應安吉的特點，即歷史跨度大、自然環境豐富和當地特有的經濟產業。其中中心館的內容包含了安吉縣的歷史、自然和產業，為綜合類博物館，從鄉村博物館數量上看(表 2-1)，歷史人文類博物館佔大多數，總計 60 家，自然環境類博物館僅 4 家，其餘 8 家為產業類博物館，並且從全縣分佈上來看，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均勻的分佈在全縣，歷史人文類鄉村博物館更是遍佈全縣。

在博物館學中，博物館物一直是討論的焦點，2016 年 11 月中國博物館協會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博物館的社會價值研究」學術研討會中，浙江大學嚴建強教授明確了「古董是過去傳承下來的具有經典意義的可攜帶物品」，是傳統博物館對「物」(Object)的理解，嚴教授接著說明「展品的拓展是從經典到日常，從可移動到不可以移動，從物質文化到非物質文化，從過往到現在」，因此可以將「物」理解為「日常+不可移動+非物質文化+現在」。當「物」(Object)轉變為「博物館物」(Musealita)時，就擁有了博物館的特性，而當「博物館物」放置於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內，其特性之一就發生了轉變，並且根據「博物館物」的選擇，物本身再文本化的過程，使得選擇對象也成為了博物館的一部分。在安吉案例中，本研究認為歷史人文、自然和產業也一併認為是博物館物，以此建立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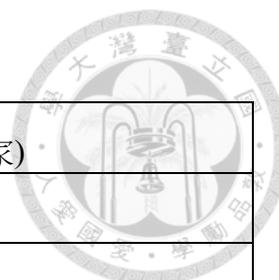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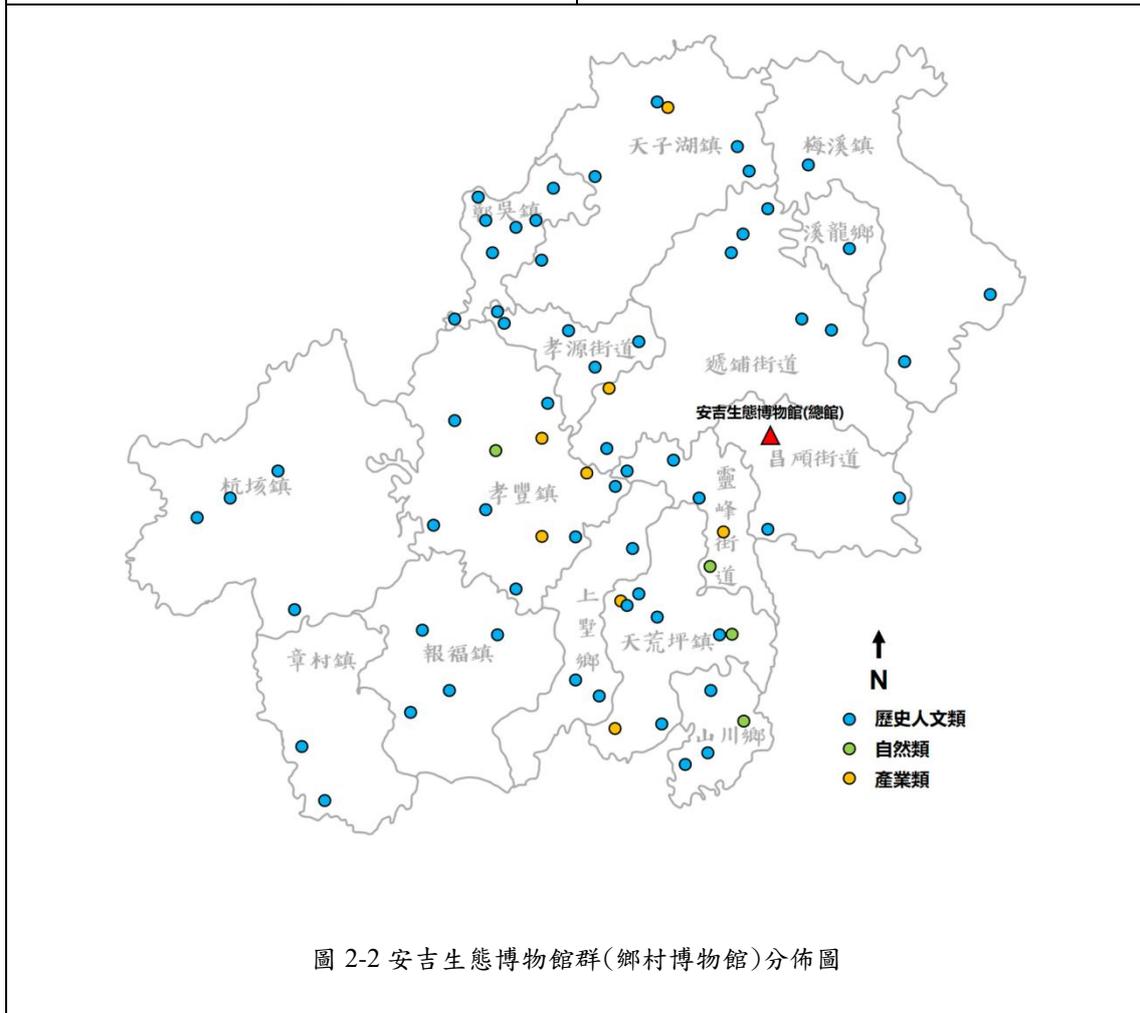


表 2-1 安吉生態博物館群(鄉村博物館數量匯總及分佈圖)

類型	數量(家)
歷史人文類	60
自然環境類	4
產業類	8



資料來源：安吉縣博物館，本研究再製

一、複雜融合的安吉歷史

安吉縣擁有的歷史人文類博物館中，能連結到安吉縣的整理歷史變遷的並不多，但在重要事件節點都有相對應的博物館展示，從舊石器時期到現今的發展，安吉縣的每一步都清晰可見，在中心館和這些鄉村博物館中，都足以了解安吉的歷史發展和人文景觀的變遷。歷史人文類博物館數量眾多，從下表(表 2-2)中能夠直觀了解其數量之多，範圍之大，各式展示館的主題將物轉變為博物館物，成

為書畫、文化、歷史等的博物館，並且通過這樣物的轉變，把博物館與地方結合在一起，也從另一方面透露博物館本質，即與地方密不可分的關係。

表 2-2 安吉縣歷史人文類鄉村博物館清單及分佈圖

天子湖鎮	迂迢農民書畫館	天荒坪鎮	新四軍三次反頑戰役館	遞鋪街道	安吉水土保持館
	廉政文化展示館		馬吉村新四軍三次反頑戰役文化展示館		中藥文化展示館
	農耕文化展示館		竹文化展示館		鶴鹿溪名人文化展示館
	安吉移民文化展示館		浙北農家樂展示館		古城歷史文化展示館(古城遺址博物館)
	安吉岳家軍抗金文化展示館		餘村兩山文化展示館		木藝文化展示館
鄞吳鎮	上吳百藝文化展示館	孝豐鎮	皮影文化展示館	梅溪鎮	千年桃城展示館
	林梓醉書畫展示館		二十四孝文化展示館		蠶桑文化展示館
	才晴館		中共安吉縣黨史陳列館		龍舞文化展示館
	金石書畫展示館		瀕口溪孝文化展示館		梓坊茶文化展示館
	清風展示館	老石坎水庫展示館	上墅鄉	古道文化展示館	
	知青文化展示館	金龍山民展示館	上墅鄉	小水電文化展示館	
	農耕文化展示館	安吉漁文化展示館		上墅劉家塘師說館	
章村鎮	根雕文化展示館	溪龍鄉	安吉白茶文化展示館	昌碩街道	古驛文化展示館
	朗村畚民文化展示館				

孝源街道	尚書文化展示館	觀音橋文化展示館	報福鎮	山民文化展示館	畚民文化展示館
	法制文化展示館	雲裳文化展示館		報福生態文明展示館	統里老街記憶展示館
杭垓鎮	橋文化展示館	平安文化展示館	靈峰街道	高式熊書畫展示館	美麗鄉村文化展示館
	石片文化展示館	關隘文化展示館		泥塑展示館	蔓漫美術館
山川鄉	五坊六藝文化展示館	安吉青少年兩山教育館	九畝山民俗文化記憶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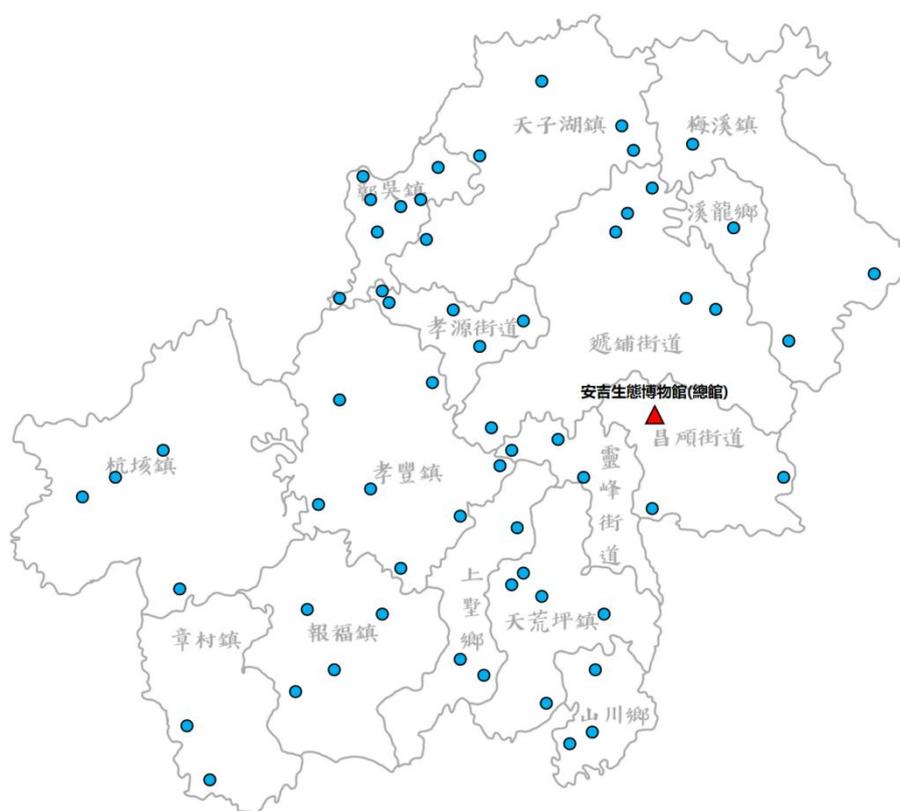


圖 2-3 安吉縣歷史人文類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資料來源：安吉縣博物館，本研究再製

余秋雨曾寫到：「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於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里的歷史扒剔出來，舒展開來，窺探自己先輩的種種真相。那麼，考古也就是回鄉。」對區域的考古，是對史料的驗證。2002 年 10 月，考古人員在安吉山坡上發現了

古人類生活的印記，「上馬坎遺址」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在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相繼出土了包括石片、石球和砸石器石製品，正式證實了早在 80 萬年前就有古人類耕作的生息，因此上馬坎遺址被稱為「浙江舊石器文化遺址考古第一點」。相較於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發現就像忽如一夜春風來的欣喜，接二連三被發現，1997 年對外公佈安樂遺址，2005 年開始挖掘芝里遺址。這些遺址挖掘出來的藏品，全部儲存在中心館內的歷史展廳，這些腳下的歷史，是證明遠古時期人類活動的標誌，在安吉縣目前的發展中，未來也將成為遺址公園，作為開放式的博物館公開。舊、新石器時代出土的考古物，是專家學者認定的博物館物，使物擁有的展示性足以成為一種博物館性，因此成為博物館價值，是專家賦予的意義，也是社會賦予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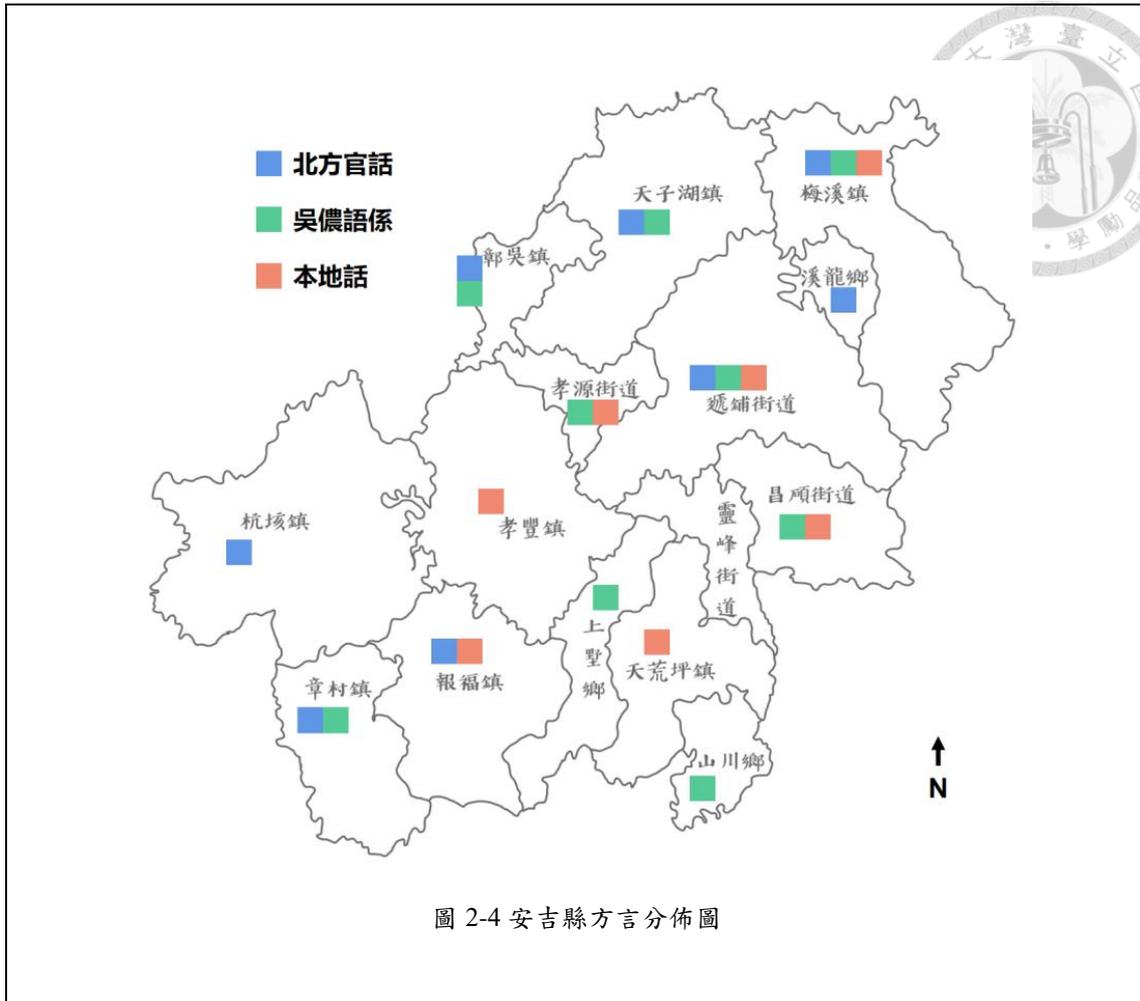
安吉的行政等級也隨著歷朝歷代的更替起起伏伏。秦始皇統一六國，推以郡縣制作為地方管理行政制度，為現代行政區劃劃分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考，秦始皇分會稽郡西部地區設置鄞郡，郡治就在今天的安吉縣古城村，即故鄞城。鄞郡作為浙江地區最早的郡治，一直延續了數百年。到了漢武帝時期，更鄞郡為丹陽郡，直到 185 年，漢靈帝割故鄞之南為安吉，至此沿用至今的縣名誕生，漢靈帝取《詩經·無衣篇》中「安且吉兮」之意，賜名安吉。在接下來的歷史長河中，安吉縣經歷分分合合，行政等級上上下下的波動，最終於 1983 年歸屬於湖州市管轄。在本研究的走訪中，經常聽老一輩的居民說到：「安吉本來就是孝豐和遞鋪合在一起的，再前面(的中心)是梅溪，再往前(的中心)是安城...現在好了，除了遞鋪都是農村了。」由於政策的改變和城市發展的原則，安吉縣中心不停的更改，以往人們逐水而居，靠近河流出行方便也能走的更遠，安吉的母親河西苕溪，下游是黃浦江途徑上海進而流向大海，並促成安城村和梅溪鎮的崛起，而孝豐擁有清末的建築，是安吉縣唯一基本保存完整的歷史街區，而如今安吉縣的行政重心是遞鋪鎮，除了歷史因素，當年為通往臨安(今杭州)的驛站歇腳點，更多則是行政劃分和綜合考量。行政區劃的改變是區域空間的調整，在歷史更迭下，這樣具有政治意義的轉變，成為一種博物館物，在城市博物館中指向城市變遷史，具有行政意義，也是一種博物館價值。

行政區劃的改變象征著權利的改變，並導致歷史的動蕩，也使得移民也隨之而來。城市文化學者陳少非(2020)曾寫道：「如同江流中的一塊礁石，當洪峰來時，泥沙俱下，雜物紛紛，遇到礁石，便停滯下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小島。安吉就是這樣形成了移民島。」。中國歷史上有多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不僅對中國經濟和人口分佈產生巨大影響，也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產生決定性因素。安吉縣最早的人口遷徙可追溯到秦朝，據《越絕書》記載：「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鄞。」故鄞即為安吉郡治所在地。安吉縣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主要移民潮，分別為西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亂」和 19 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爭」。東漢末年分三國，群雄爭霸，西晉永嘉之亂使得北方難民為躲避戰亂紛紛南遷，不少人選擇定居安吉。北宋靖康之亂，宋皇室倉皇南渡，

北方百姓也大批跟隨南遷，沿著苕溪水找到了魚池鄉(今安吉縣鄞吳鎮)，便在此定居。而太平天國時期則是有規模的政策移民，當年太平軍與清軍在安吉縣發生激戰，導致大批原住民喪身，清政府為恢復生產，實行「招墾」、「招佃」等政策，將豫楚等地的農民遷徙過來開墾荒地。而在歷史上還有蘇北船民，他們則多是聚集在水系發達的梅溪地區，安徽移民多集中在靠近安徽的村莊。在動蕩的年代，浙江省內南部山區的少數民族——畚族也遷徙至此，定居在安吉的村落。因此安吉擁有多種方言，從表 2-3 中可以看到主要為吳儂語係和北方官話，這些資料目前都存於安吉移民文化博物館。

表 2-3 安吉縣方言分佈統計及分佈圖

方言各類		分佈地區
本地話		主要分佈在西苕溪以東的報福、王家莊、孝豐、塘浦、遞鋪、安城、曉墅、小溪口等地。
吳儂語係	浙江台州話	主要分佈在鄞吳、豐食溪、章村、上墅、港口和山川等鄉。
	浙江紹興話	主要分佈在遞鋪、豐食溪、上墅、白水灣、山川、港口等鄉。
	浙江寧波話	主要分佈在西畝、三官、皈山、塘浦、赤塢等鄉。
	浙江溫州話	主要分佈在梅溪甲子山、曉墅石龍、南北莊安樂、豐食溪的方家上和午莊、鳳凰山鄉的朗里、余墩和雙溪口等村。
	畚族話	主要分佈在杭垓鄉的唐舍、報福鎮的中張和章村鎮的郎村等畚民聚集地。
北方官話	河南話	主要分佈在高禹、南北湖、荊灣、溪龍和三官等鄉，以及梅溪、曉墅和安城的部分村。
	安徽安慶話	主要分佈在鄞吳、良朋、西畝、姚村、三官、報福和章村等鄉鎮。
	湖北話	主要分佈在杭垓、下湯和西畝等鄉。
	江蘇蘇北話	主要分佈在荊灣、梅溪和曉墅、溪龍的後河和親豐、安城的曹埠和馬家渡、三官的銀灣、南北莊的長弄和魯家等村，人數不多。



資料來源：安吉移民文化博物館，本研究再製

方言的不同也將不同文化帶入安吉，雖然鄉音卻隨著文化交融不斷改變，不變的是民俗，更是一種地方情感。不同地方的移民決定定居在安吉，也將他們的民風民俗和傳統文化帶來安吉。經過了上千年的融合，有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和吳越文化，共同組成豐富多彩的移民文化，各地的移民後代，在生產生活、飲食習慣、民風民俗等都有差異，但在時間的撫慰中，相互影響逐漸類似，因此在移民島內形成了不同於但又神似移民地的風貌。語言作為一種非物質概念，是一種文化，地方方言作為地方特色，在安吉的土地上講述著不同的文化，這樣的方言衝突帶來的文化交流，是使得安吉這片土地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因此移民文化作為抽象的物，見證的移民歷史，成為博物館物，在地居民是見證者，同時也是賦予地方方言的參與者。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被稱為「民族記憶的背影」，在安吉縣的非遺調查中，項目涉及民間藝術、手工技藝、人生俗禮等。舞龍、舞獅、花燈等民間藝術形式多種多樣，主要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存活於現今，在安吉縣上吳村百藝展示館內，存放著安吉縣大部分的傳統慶典表演形式的用具，有梅溪旱船、漁蚌舞、儺舞、花鼓戲等，展示品多是色彩鮮艷，彰顯著豐富熱鬧的節慶氣息和

傳統民居的樸實無華，但最難過的莫過於村民說的：「東西都在，就是沒人會用了。」。據村民介紹，「儺舞」是源自於中國遠古時期驅逐鬼邪的原始舞蹈，不過上吳村中目前可知的只有幾位近百歲的老人小時候有幸見到過，2006年「儺舞」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傳統技藝中，章村鎮的根雕、昆銅鄉的竹雕、上墅鄉的手工造紙技藝、溪龍鄉的白茶手工炒製、天荒坪鎮的毛豆筍乾製作、鄞吳鎮的竹骨折扇製作、山川鄉的白酒釀造等非遺項目，是南來北往的人們在安吉這片土地上的創造，是技藝的傳承也是歷史的沉澱。非遺的傳承往往遵循著「傳男不傳女」的祖訓，但在今天的安吉，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樣的方式不利於文化的傳承，因此傳承人們全部收徒，毫無保留的將絕活技藝交給弟子，不論男女，不論近親外戚，只要想學，就都能實現。非遺的傳承意涵使得這些非遺物成為了博物館物，因此被人類選擇的物的意涵，成為了建立博物館的價值。

考古物的展示性、區劃轉變的行政意義、方言的在地文化意涵和非遺的傳承意涵，都成為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中鄉村展示館中的「博物館物」，石器時代人類、古代人、現代人都在這篇土地上生產生活，賦予了這些「博物館物」的意義，成為博物館價值，這不僅是博物館學學科的發展，也是地方居民對地方情感的表達，這樣的地方感作為博物館的主題，也創造了一批擁有地方感的博物館，這是一種博物館化現象。

二、中國竹鄉，白茶故里

不同於前文中對於博物館群中歷史文化的分類，物轉變為博物館物的直接，自然環境成為博物館價值的新主題。在安吉縣生態博物館群中，自然類博物館貫穿歷史人文類和產業類，因此在歸類中難以確切分類，因此在分類(表 2-4)中的博物館，其展示內容僅僅以自然環境為主，自然環境更是一種生態的表達，這裡的生態僅僅指的是自然環境，是在地居民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崛起而建立的展示館，在安吉案例中，不乏是以安吉環境的獨特性而建立的博物館。

表 2-4 安吉縣自然環境類鄉村博物館清單及分佈圖

靈峰街道	中國竹子博物館	孝豐鎮	奇石文化展示館
山川鄉	高家堂紅茶文化展示館	天荒坪鎮	竹林碳匯展示館

圖 2-5 安吉縣自然環境類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資料來源：安吉縣博物館，本研究再製

安吉縣地處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帶，四季分明，縣內山脈以丘陵居多，境內的天目山為浙北第一峰，是天然的物種園和基因庫，也是環太湖人類文明的搖籃，自然環境茂盛，氣候適宜，漫山遍野的翠竹和成片的茶園成為安吉自然風貌的一大特色，當安吉縣境被考證為黃浦江源頭所在地，感受的是空氣中負氧離子含量的倍增，是竹葉的清香，是白茶的醇厚。優越的自然環境吸引的文人墨客不計其數，這樣大自然的饋贈也使得往來遊客對安吉環境有一個良好印象。

蘇軾曾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安吉的大片竹林就吸引了眾多文人墨客再此修行，目前安吉境內擁有 108 萬畝的竹林，擁有東南部最大的竹林，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就提筆寫下「寧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聞鶯不見鶯」來形容安吉竹林的曲徑通幽，茂林修竹的場景。安吉縣作為「中國十大竹鄉」之一，有著

「世界毛竹看中國，中國毛竹安浙江，浙江毛竹看安吉」的豪言壯語，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取景地就在安吉竹林。因此也催產出眾多與竹相關的產業，在生活物件的生產中，安吉人開始有了藝術的追求，竹樂開始登上舞台，其中竹鼓、竹管琴等 4 件竹樂器被授予「實用新型專利證書」。從自然環境到對藝術的追求，或者說從對藝術的追求到與環境結合的藝術，具有展示性，在展示過程中，也被收入博物館保存，在藝術表達上促成了與自然共舞。

安吉山多田少，安吉人自古就與竹相伴，竹筍也成為了地方特色，「百筍宴」就成為了迎賓客的上品。元代安吉籍的文學家凌說提筆寫下的《鄞南八詠》，其中提到的八個場景是安吉最具代表性的美麗景色，即天目晴學、渚溪夕照、北莊梅花、樊塢梨園、梅溪春漲、獨鬆冬秀、浮玉晚嬌、石埭夜航。陸羽在《茶經》中提到，「浙西地區的茶以湖州為上，而生長在安吉、武康二縣山谷間的茶，則與金州、梁州所產差不多。」而安吉的白茶就是生長在山谷間的珍異品種。安吉縣以丘陵地貌為主，並且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植物資源，得益於優秀的自然環境，早年在安吉發現了特有動物，並以安吉命名的安吉小鯢。動物園、植物園是一種專門博物館，在安吉案例中，這樣的生物被納入生態博物館群內，囊括在安吉自然環境的分類中，其介紹保存在中心館，成為安吉的特殊代表。

靠山吃山，保護環境也是歷年來發展的主軸。在安吉，大片竹林和漫山的茶園成為主要風景，自然環境在歷史人文的影響下，在經濟產業的促進下，環境成為重要基礎。豐富的环境也為安吉建立生態博物館群提供內容基礎，在生態博物館理念並未完全被中國學者吸收之時，安吉縣的博物館群大多以保護自然環境為主體，建立自然類的博物館，其教育意義多是環境教育為主，以歌頌環境對安吉的影響。

三、安吉產業名片

區域的發展離不開地方產業的發展。開放初期，安吉椅業開始萌芽，後又本著靠山吃山的能力，安吉人漸漸催生出竹子和茶葉這樣的以自然作為原材料的產業，至此，以椅業、竹業和茶業三者為首的產業發展逐漸在安吉迸發，成為安吉產業的三張名片，全縣大部分人都依靠著這些產業發家致富，椅業遠銷海外，並且逐漸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椅子產業聚集地，竹業貫徹生活方方面面，完成從音樂藝術到生產生活用品的轉變，百畝茶園更是將白茶打造成為集休閒旅遊和禮品的上乘之作，當然安吉縣也不止這三個產業，如表 2-5 所示，其他產業也隨著萌發，為安吉的經濟增添一把火。

表 2-5 安吉縣產業類鄉村博物館清單及分佈圖

孝豐鎮	永裕現代竹產業館	天荒坪鎮	天荒坪生態能源館
	烏氈帽酒文化展示館		銀坑影視文化展示館
	和也睡眠文化展示館	天子湖鎮	祖名豆文化展示館
靈峰街道	竹產業文化展示館	遞鋪街道	大康椅業展示館

圖 2-6 安吉縣產業類鄉村博物館分佈圖

資料來源：安吉縣博物館，本研究再製

安吉縣在 21 世紀初期，由於中國竹鄉的名號，漸漸發展以竹產業聞名。從前，安吉縣的毛竹作為原材料銷售，讓安吉人民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但在社會不斷發展中，逐漸落伍，資源市場不佔優勢，還造成大量的環境破壞，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一位台灣商人創辦的竹涼席廠，廉價毛竹原料經過加工，成為高級涼席，身價倍增，隨後，安吉人自己的竹製品廠商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包括但不限於竹地板、竹筷、竹窗簾等，有些廠商熟練運用竹纖維等創新，竹纖維毛巾、竹纖維飲料、竹纖維面膜等也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產業建立博物館在近幾年成為熱點，不僅展示了企業產品，更好的為買家服務，並且成為景點之一。

安吉白茶屬於綠茶類，但因其成熟時表層的白色細小絨毛，因而稱之為白茶，每年三月開始，便是茶農們最忙碌的時節，來自附近省份的工人也會來到安吉縣，幫助在短暫的成熟期，快速將茶葉採集回來，接著炒製。「白葉 1 號」將安吉白茶推向正軌，成為招待貴賓的上禮，並成為安吉的名片，2010 年安吉白茶製作技藝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遺產名錄，成為扶貧政策的關鍵經濟作物。安吉產業類博物館，是將產業發展到旅遊業，是將物轉變為博物館物的結果，其博物館價值更具有經濟效益。

在本節中，安吉的歷史、自然環境和產業三大特點，成為建立鄉村博物館的內容基礎，以此建立博物館的過程，是博物館化，地方感成為了「促進博物館化」條件之一，換句話說，安吉生態博物館群是以地方感促進博物館化的現實案例。在鄉村建設中，鄉村博物館也成為地方感的集大成者，通過挖掘在地文化尋找地方記憶，物被放置於博物館中就成為了博物館物。「博物館物」在《博物館學關鍵概念》(2009)中，被認為「最根本的哲學意義，是物本身並非一個實體，而是一個產物、一個結果或一個關聯」，換句話說，物只有被賦予了某種意義，並成為了一個產物、結果或關聯，Stránský(2012)曾經提到：「並不是每一個物品都具有博物館物的標誌的... 只有某些物品可以被認為是所謂的博物館物」。因此當物被人類賦予了某些特質，成為一個具有收藏性、歷史性或展示性等意義時，或許才能成為「博物館物」。因此，「博物館物」的選擇，是對象定義的，物本身是一種單向的，即只接收不反饋的存在，是對象賦予了物的意義。因此是在地居民選擇了「博物館物」，是物的被文本化的過程，在地居民選擇的、帶有地方記憶的「博物館物」，成為了情感寄託，也就成為了地方感的表達，促進博物館化的過程。

第三節 從博物館到地方——博物館實踐

在本章第一節中提及，博物館展覽中地方參與，也是能夠體現地方感和博物館化之間的關係的，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從萌發之初，就是為了地方發聲，展示地方，而博物館常設展，一般展示的都是當地特有的。在安吉案例中，除了常設展，還有各種文化下鄉的活動，安吉山多因而偏遠地區的出行較為不便，中心館的博物館學者和研究員，每年都是組織活動，希望能夠拉近城鄉之間的文化供給，是一種支教，同時也能藉機學習在地文化，挖掘地方精神，為全縣博物館工作做好田野調查的工作。這樣的博物館工作，是建立在已建成鄉村博物館的基礎之上的，在安吉縣近 20 年的發展中，這樣的模式已經走上正軌，從博物館到地方，是展覽的延續，也是文化的傳承。

一、文化下鄉

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激發廣大群眾投身文化事業建設的熱情，安吉縣博物館圍繞「三服務文化下鄉」的工作目標，開展系列主題活動(安吉縣博物館，2020)。文化下鄉雖然是一個文化政策，但其中的「下」是傳遞的意思，意為將其內容傳遞到另外的地方，是需要被其指導或教育的，因此「鄉」可以是行政區位上的鄉村，可以是鄉村館，也可以是博物館以外的機構。隨著安吉縣生態博物館慢慢走上正軌，博物館工作者們開始有計劃的實施文化活動輻射至全縣。

2020年，安吉縣博物館聯合諸樂三藝術館，組織文化下鄉活動，助力2020年遞鋪街道鶴鹿溪村首屆文旅節日，鶴鹿溪村名人文化展示館擺放著多位安吉籍的藝術家作品，為傳承諸樂三先生偉大的藝術造詣，安吉縣五位書畫家現場做書畫禮送給村民。2022年伊始，安吉縣文化下鄉活動來到安吉縣鄞吳鎮民樂村，邀請縣書法家寫福字贈送給村民，傳遞美好祝願。將博物館的書畫藝術，傳遞到偏遠鄉村，與傳統新年結合，將「福」傳遞到全縣，這樣意味著文化經過博物館的作用，去往地方居民家中，這樣從博物館到地方的在文本化過程，是文化下鄉的意涵之一。

中心館肩負著行政指導和博物館工作的指導任務，對於新建立或正在籌備的鄉村博物館，作為生態博物館群的中心館，有著對講解員的培訓工作。2019年4月28日，「安吉生態博物館群講解員培訓班」在中心館正式開課，共有60名來自全縣各博物館的講解員參加(安吉縣博物館，2019)，通過學員現場講解，講師現場點評的模式開展培訓。博物館和旅遊業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近年來文化旅遊項目日益熱門，對博物館講解員的要求也逐漸提高，不僅要知識豐富，更需要通過通俗、接地氣的語言傳遞博物館內容，在講解員的內在轉化過程中，不自覺的帶有鄉土氣息，方言成為最顯著的特征，因此講解員大多來自當地，既能夠用普通話講解，又能夠帶出方言特色，給安吉縣人一種親切的感覺，又能夠給外地遊客提供地域文化，這是一種地方性的表達，也是在地人對地方感的理解，更是外地遊客對於安吉文化的首要印象和特殊感的產生。

講解員被認為是城市形象的窗戶(安吉縣博物館，2019)，因此對於講解員的培訓將從禮儀、傳統文化和講解技巧下手，這也是標準化講解員行業的渠道之一。安吉這樣的講解員培訓班的特殊性在於，一部分學員來自美麗鄉村的優秀村落，這樣的村落可以理解為類博物館或露天博物館，通關對村落的介紹，對自然和人文生態的展示來告訴遊客，安吉的村落也值得被講解，生態博物館也並不只是一個場館，也可以是一個區域，為鄉村振興注入文化動能(安吉縣博物館，2020)。

文化的傳遞也是教育的過程，安吉生態博物館致力於將博物館文化帶入校園，向學生們展示安吉文化。2022年5月12日，安吉生態博物館走進安吉縣第二小學多個班級，開展「5·18國際博物館日」的系列活動——「身邊的文化遺產」微課程(安吉縣博物館，2022)。安吉生態博物館的工作者們通過對安吉歷史的充分

解讀，並轉化成淺顯易懂的語言，激發學生對歷史的強烈興趣，也使得安吉博物館工作者也獲得了極大的成就感。



二、文化反哺

文化下鄉是在安吉縣，是將博物館文化傳遞到地方，或從縣城傳遞到鄉村，反之則是將在地文化回饋到博物館，或回饋的縣城，即文化反哺。隨著安吉文化不斷挖掘，安吉的歷史、人文景觀和衣食住行也不斷顯現出來，後續鄉村政策等的發展，使得鄉村文化氣息濃厚，根據館群的協調作用，鄉村館是能夠補足中心館的文化缺失，或者說更詳細的解釋某一種文化或現象。鄉村館反作用於中心館，為展示在中心館的一些觀點提供事實依據，因此鄉村館將反哺中心館，為其提供養分。

2022年7月，在安吉生態博物館中心館門前廣場，舉行安吉縣首屆「文博夜市」，為廣大在地居民提供了一場沉浸式的文化體驗。文博夜市以百名少年古箏齊奏開場，以古典曲目的恢弘氣勢為夜市的開幕走出華麗樂章，博物館內展出安吉白茶、竹工藝等特色產品，推出手工、古代體育活動等文博體驗項目，並聯動安吉縣圖書館佈置書吧。博物館外，在遞鋪港邊，非遺小吃攤³、文化街景、竹藝文創和宋韻體驗⁴等板塊一字排開，時不時還有身著漢服的人群來往，讓當地居民享受著創和穿越千年的文化市集體驗。館內展品肅穆，館外人頭攢動、熱鬧非凡，博物館內外見人見物見生活，是從館舍天地到大千世界的雅俗共賞，是宋韻文化的情景再現，也是世俗生活的歷史印記。文博夜市讓傳統工藝走上街頭，讓工匠精神具體呈現在居民面前，讓孩子們直觀的體驗非遺傳承，是民族文化的接力。

同年7月，第九屆安吉生態博物館「暑期小小講解員培訓班」正式開營，在半個月的時間內，來自不同學校的3-6年級學生，通過集中授課和實地考察的學習形式，讓小朋友能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安吉故事，傳播安吉文化。培訓課程以理論課為主，手工、實踐課為輔，開設歷史、生態、銅鏡、禮儀等方面的課程，並通過志願服務強化前期所學知識(安吉縣博物館，2022)。活動中，上午博物館工作者們精心製作演講稿講述在地文化，隨後帶領他們去各個展廳看實物，讓圖片還原到現實中，真切感受文物的力量，下午安排小型考古活動或非遺扎染、雕版印刷和拼圖活動，週末帶領孩子們開啟「尋宋之旅」，來到當年通往臨安(今杭州)的唯一道路和關口——獨鬆關，沿著千年前古人的腳步，感受同一片土地，體驗不同的心境。在獨鬆關變還有安吉公路文化展示館，館內記載了安吉縣內的路、橋，秉承著「要想富先修路」的口號，歷年的安吉工程師們，開闢了許多通往偏遠山村的路和橋，既保留著宋朝時期的拱橋，又打造便於通行的現代橋樑，

³ 非遺小吃攤：安吉文博夜市中，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小吃為主的攤販，例如吳均湯包等。

⁴ 宋韻體驗：中國歷史上宋朝的文化體驗，例如投壺等體育活動。

讓孩子們了解造路的艱辛。像安吉公路文化展示館這樣的專業面向博物館，是全縣孩子們的學習基地，也是當地村民的文化財產，不僅讓當地居民和縣城孩子們了解歷史，更能夠讓孩子們把文化帶去不同的地方，秉持精神傳遞信仰。

文化下鄉和文化反哺，如下(圖 2-7)所示，是博物館工作把地方感和博物館化串聯起來，以帶動地方感和博物館化之間的能動性，這樣的能動性，本研究認為是「安吉模式」中重要的一環。在安吉，博物館是一個官方機構，受文化局管轄，是政府機關下的文化單位，代表政府機關行事，在安吉縣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官方活動佔主導地位，行使所謂知識教授權利，也有傳播知識的義務，因此安吉博物館的活動，既是服務大眾，也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若是過於依靠外在動能，這樣的轉動就會適得其反，一旦博物館工作者撤出鄉村，鄉村博物館就處於停滯狀態，因此在安吉案例中，大片鄉村博物館的停滯，不是能動性的消失，而是基層管理無法代替中心館專業學者工作，從而使得鄉村博物館後續發展動能不足，導致停滯局面。



圖 2-7 博物館實踐的能動性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在地居民的身份轉變

不論是文化下鄉還是文化反哺，在新博物館學中，在地居民都被認為既是受益者也是參與者，這樣的地方參與，是一種情感體現，也就是地方感。地方感的表達需要一個契機和一個動力推動，動力即為博物館工作的能動性，但地方參與和地方配合，依舊需要內驅力來推動。在本研究中，在地居民的身份轉變，就成為了表達地方感的契機。在研究走訪中，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如此熱情和認識，大部分會由一個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過程轉變，這也是在地居民對於公共事務，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

旁觀者，似乎帶有一絲貶義的意味，意味無動於衷的看著，而在田野中發現，這大概是另類的支持。「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所以我沒有講話」是在走訪中經常聽到的話，這裡的「講話」意為講閒話，就是發表反對觀點，在村民理解中就是一種支持，因為他沒有反對和否定，再次追問，又得到了於我無關的態度，再跟進指出這是村上的大改造，又得到了「他們都說好，我也覺得好」的回答，這裡的「他們」指代村委，可以說是一種信任，也可以認為是一種隨大流的支持，

但充斥著別人的觀點。在地居民並沒有意識到，建立鄉村博物館是一件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又或者說對於博物館所代表的文化，內心的崇敬讓他們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如何參與，認為「這是你們文化人的事情」。

雖然新博物館學所代表的草根性，但在安吉案例中反映出，並沒有從人的視角解讀生態博物館的草根性。本研究認為，在安吉案例中，部分所謂的生態博物館依舊是一種傳統博物館，讓在地居民充滿著神聖不敢觸碰的情感，在地居民心中將自己與「文化人」區分。這樣的割裂除了與在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也和博物館工作有關。「旁觀者」是在地居民的給自己的定義，「參與者」更像是在地居民中覺醒的、受益的人。

在秋季的竹林間，會看到村民伐竹並運往山下，「以前都是自己搞的，現在村方裡組織一到(起)砍，這樣也對啦，讓那片(竹林)長長好」，據章村村民介紹，像是海邊的禁漁期，安吉村落中也有類似的時間段，村委聽取駐地林業局專家建議統一規劃集中開採，保障了大片竹林的再生。保護環境一直是在地居民所堅守的，因此科學開採的指導，就成為了在地居民新奉承的宗旨，這個案例具有草根性，是與在地居民生產生活分不開的，並且專家建議能夠幫到村落，因此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而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機構，鄉村博物館在鄉村中的抽象概念，難以被在地居民理解，因此就難以真正成為鄉村博物館的「參與者」。與村民直接相關的林業、農業問題，基層政府稍加干預，村民都會聽從建議進行修正，而對於公共事務，例如文化相關的活動，村民大多持有觀望狀態，他們並不清楚支持或反對會對事件有任何影響，也不太清楚未來的發展，因此會選擇不提出反對意見作為自己的支持，這也正是專業學者可以介入的節點。

能讓村民聚在一起的文化活動，大多是慶典活動，一起跳舞、看戲，是每一個村民的共同記憶，並且大多能哼上幾句或跳幾個動作，節奏鮮明參與度高，並且帶來歡樂，這是村民農忙之際最喜歡的娛樂活動，而在安吉縣上吳村，有一位老人意識到這是需要傳承和記憶的，因此走訪了每家每戶，收集服飾和歌舞道具，以此建立村落記憶博物館——上吳百藝展示館。

上吳村位於安吉縣鄞吳鎮，與安徽省交界，村中有三口古井，故亦稱「三井村」。上吳村四面環山，因此保留著較為原始的自然環境和原始村落，由於歷史原因和地緣的關係，村內 90% 為皖籍移民後裔。村落擁有豐富的山林資源，先輩們的勤勞和開拓精神，使得當地從事手工藝的人數較多，在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下，產生了一批活躍的民間文化活動，又經過時代的傳承，各顯異彩。豐富的手工藝和文化活動，使得上吳村有了「百藝之村」的美譽。「美麗鄉村」政策實施以來，上吳村的在地居民積極響應政策號召，挖掘本土文化，最終確定以「百藝」作為主題，建立「上吳百藝展示館」，在展示館內，收藏著晚清、民國和現代的工藝和文化展品。2022 年 10 月，安吉縣上吳百藝文化展示館獲選「浙江省第三批鄉村博物館名單」，這是安吉縣第 17 家通過浙江省認證的鄉村博物館。這樣的省級表彰，意味著上吳村的展示館受到更高層級的認可。

館內收藏品大多村民主動提供，上吳村村民意識到這些是需要被保存的，民俗是需要被傳承的，紛紛主動拿出家中的寶貝，「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去展示館」、「啊呀都是我很小的時候看村裡的大人跳過」、「這些現在也是古董了」、「這個東西比我年齡都大」，諸如此類的感慨，村民們雖笑著說但眼裡數不盡的失落，形容的天花亂墜，但外來者只能想象。在參觀展示館期間，有位陸姓大爺主動介紹起每一個展品，都有說不完的話，陸大爺介紹上吳村的「傩舞」，俗稱跳和尚，只有村中以為 80 多歲的老人孩提時期見過，已經失傳很久了，「東西都在，就是沒人會跳囉」，這大概是最遺憾的了。上吳百藝展示館呈現的是當地村民的熱情與記憶，是當地村民想要留在世界上的文化，村民們或許並不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但是「我家的古董在那裡(展示館)」是他們最常說的，使他們作為參與者能夠投入到展示館，或者說作為創作者、傳承者，投入到村落的文化建設中的。

老人在博物館籌備的走訪中，其本身作為「參與者」去執行這樣的活動，在與村民交流過程中，將理念和想法傳遞給村民，村民作為「旁觀者」，貢獻出自己的展品，首先在形式上將在地居民與鄉村博物館聯繫在一起。博物館建成後，村民參觀並交談，談及展品時候的滔滔不絕，成為展品的代言人，也因此成為講解員，在這裡村民又成為了「參與者」，這樣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身份轉變，也是鄉村博物館的草根性體現的瞬間，同時也是地方與博物館之間雙向影響的結果。在中國社會和當前文化政治分為中，這樣被動的、自上而下引導的參與感創在了在地居民對地方的特殊認識，博物館工作並不能全然代替，而是以獨特的意識形來管理。人與物、人與博物館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被建立，幾乎是在潛意識，就認為「這是我們村的特點，別的沒有的」，這樣的文化自信帶有土味和鄉味，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風俗來應付的(費孝通，2008)，土氣更不是嘲諷的詞彙，而是最高禮遇的讚美。

第四節 安吉縣的地方感與博物館化

安吉生態博物館群所呈現的地方感和博物館化現象，是在新博物館學影響下產生的結果，同時也離不開中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在中國博物館學的發展史上，蘇聯的影響成為中國博物館學轉向「較小的地理範圍內運作」的轉折點。蘇聯博物館學在 1950 年後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博物館組織機構逐漸固定化和模式化；博物館各項工作政治任務和主觀色彩突出；地誌博物館和紀念博物館比例顯著增加(趙慧君，2017)。1952 年，中國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引進並翻譯多部著作，包含《地誌博物館的陳列方法——自然之部》、《地誌博物館的陳列方法——革命前之部》、《關於地誌博物館科學研究、收集、陳列與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條例》等，成為當時建立中國地誌博物館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中最顯著的在於地誌性，即為地方性的表達，是突出當地的文化、文物和文明的鮮明特點，在情感累

積中成為地方感的轉述。

這樣的地方性帶有的政治色彩，使得安吉縣以地方感作為依據建立的博物館，並沒有如此純粹，換句話說，這樣建立的生態博物館無法完全的代表地方。因此在從地方到博物館的過程中，存在著政治權利的介入，博物館化是政策引導下的產物。但在安吉案例中，這樣的地方感似乎無法打動在地居民，在地居民也因此保留著「旁觀者」的身份，這樣的博物館化結果最終淪為鄉村評鑒的指標，大大忽略了博物館的意義，因而在地居民無法從鄉村博物館中得到共情。在地居民從「旁觀者」到「參與者」身份轉變的契機，是在規劃鄉村博物館的前期研究中，生態博物館的草根性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體現。回到本章第一節中巴西社區博物館的案例，Cristiane(2023)同樣也討論到權利介入的問題，認為「地方記憶被權力關係介入，權力關係自然就包含著衝突與對抗」，這樣的對抗在博物館中被忽略了，因此 Cristiane 通過參與式的方法，提高認知和培訓，在博物館化過程中優先考慮這樣衝突和對抗，才有了能夠代表地方的博物館。

同樣，在目前安吉縣的鄉村博物館的實踐中，政治權利依舊佔主導地位。文化下鄉和文化反哺，都是依據當年的博物館目標進行的，受中心館統一管理，而文化工作在鄉村工作中無法佔據主要地位，因此基層政府在指標完成後，鄉村博物館正式成為閒置，又或者僅僅只是在更高一級的政府活動下重新歸置整理，失去了博物館的能動性。Guedes(2021)藉由以原住民參與里約熱內盧的印第安人博物館展覽的事件，是以策展團隊的能動性帶動博物館的能動性，同樣也是參與式的方式促成的帶有地方感的展覽，在展示上，是博物館的能動性促成了展覽的地方性。而安吉案例中，權利的介入和鄉村博物館實踐的旁觀者心態，使得全縣的博物館僅存在縱向發展，即中心館到地方、中心館到鄉村館、鄉村館到地方的發展，而非橫向，即鄉村館之間的发展。

安吉生態博物館受到新博物館學中對於地方理論的影響，同時又受制於蘇聯博物館體系中政治權利的介入，而這樣的現象也是中國生態博物館從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的「本土化」，到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的「專業化」，到目前安吉生態博物館的「規劃現代化」的轉變，權力關係的不斷介入，也因此產生了安吉生態博物館是否是生態博物館的質疑。博物館學之下的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以地方感作為主體建立博物館的過程，是博物館價值的體現，同時由於權力的作用下，博物館實踐在意識形態之下有著特殊的處理方式，從物到博物館、在地居民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轉變，同時受到博物館學在地方的發展影響，和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的影響，因此造就的安吉生態博物館群，是地方感促進博物館化的實例。

第三章 安吉城鄉中的生態博物館



縱觀前一章，眾多博物館建立在安吉縣內，成為生態博物館群，並且分佈在各個鄉鎮，因此本章將更關注這些博物館與鄉村規劃間的關係，並且就全縣尺度來說，這樣的館群網絡與全縣整體規劃之間的關係。地方感成為了「促進博物館化」條件之一，這些擁有地方感的博物館，在安吉鄉村政策的扶持下，影響鄉村規劃，朝向具有地方性的方向發展，又因博物館擁有的地方感，鄉村發展朝向文化旅遊為主的包容性城市方向發展。包容性城市概念是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政策概念(Anttiroiko, 2021)，因此在安吉縣內，博物館在鄉村中的影響，似乎成為了連通地方感與鄉村發展的一個契機展示。

針對這樣的假設，如下所示(圖 3-1)，本章首先通過學者的研究案例，分析案例中的博物館是如何處在區域規劃之中的，並且討論分析中國城鄉關係和中國生態博物館體系，其次通過田野調查，總結安吉縣的博物館化的過程，指出從村到縣的博物館化現象，討論這一現象的形成，最後討論安吉的博物館化與博物館之間、博物館化與城鄉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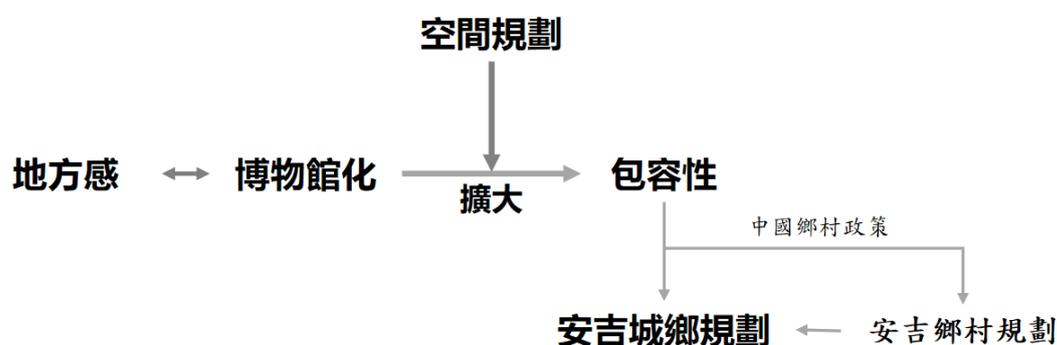


圖 3-1 第三章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一節 博物館與區域

隨著旅遊業的發展，文化旅遊成為城市未來發展的戰略之一，城市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都成為潛在的展示對象或旅遊環境，有助於城市博物館化，因此博物館化將生動活潑的遺產轉化為面向遊客的階段性工藝品(Daher, 1999)。正如 Bruner(1993)所指出的，博物館、旅遊和文化遺產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的展示都是有選擇性的，這取決於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他們應該構建甚至發明他們所展示的東西，他們都依賴於遊客(Aykaç, 2019)。在博物館化的複雜過程中，城市是生活的、動態的環境，博物館和博物館化產生的「階段性工藝品」只是複雜關係的一部分(Orbaşlı, 2000)。

將博物館化概念擴展到區域發展，學者們有不一樣的討論。Baudrillard(1981)在批判博物館涉入文化時，認為用博物館化來論證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博物館化，甚至在它成為潛在的博物館對象之前，Huysen(2003)使用了「博物館化」一詞，認為博物館不再局限於機構，這是將博物館從博物館化過程中剝離開去。Relph(1976)將博物館的概念運用在旅遊業上，並將其定義為對傳統村莊和城堡中的歷史保存、重建和理想化，其界限被進一步模糊，將區域範圍擴大，將城鄉納入整體發展，又被 Ashworth 等(2015)稱為「鄉土博物館化」。這是將博物館化範圍擴大。以文化主導的區域再生計劃，將區域轉變為旅遊景觀和文化消費的對象(Aykaç, 2019)，博物館化成為區域發展的契機。

一、博物館化計劃

Nelle(2009)認為，儘管博物館化被認為是「改變城市空間的策略」(Muller, 1999)，但並沒有博物館化計劃(museumification programmes)，因此 Nelle 通過研究 Cuba 的 Trinidad、Mexico 的 Guanajuato 和 Philippines 的 Vigan 三個遺產城市的博物館化過程，來探討城市語境中的博物館性(museality)定義，從而確定了一套可以用於遺產城市的發展計劃的博物館模式。Nelle 通過五種方式首先對博物館化過程的分析，分別是對存在物的保存與恢復、重複使用、拆除當代標誌和提升歷史形象。如下(表 3-1)所示，作者通過觀察建築設施、旅遊公共空間和活動等方面，指出三座城市的博物館化過程。

表 3-1 三座城市的五種博物館化過程的方法

	Trinidad	Guanajuato	Vigan
保存與恢復 (To conserve and restor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被納入當地政策，由當地遺產辦公室監督並執行 ● 在地居民讚賞這種方式，認為是加強了旅遊業的活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由當地遺產辦公室負責監督，但不負責規劃執行 ● 被在地居民視為限制旅遊業等商業活動的發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沒有單獨遺產辦工作，只有總體規劃辦工作 ● 僅由富裕家庭執行，委託建築師保護他們的房子，以旅遊業的聯繫不緊密
重複使用 (To reus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適合重新使用於餐廳、紀念品商店和博物館 ● 重複使用率很高，經濟效益很高，但污水處理問題也成為焦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房屋需求和住屋安全成為新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立了一種法律工具，以拆除被認為「不符合旅遊城鎮的衛生、道德、和平和秩序」的現有設施 ● 但建築並沒有翻新 ● 豐富的社交活動空間和少量的私人房間不符合當代要求
可利用的外部空間 (To additional utilise external space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城市遊客活動控制質量非常高 ● 禁止機動車聯和動物牽引車輛使用道路，在節慶活動需要活動許可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於額外使用的規定很少 ● 僅限制廣告和裡面的設計，為有助於實現遊客拍照雖追求的視覺質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法規明確將旅遊用途作為公共空間的功能 ● 大量蚊蟲降低了遊客對去廣場閒逛的吸引力，大量機車被視為造成噪音和空氣污染

			的源頭，並且 人行道空間狹窄
拆除當代生活的 標誌 (To dismantle signs of contemporary lif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該活動沒有任何意義，並認為這不是他們的優先事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遺產辦公室給出了建議拆除擾亂城鎮面貌的標誌 ● 集中體現在針對路面、電力供應和街道照明的方面，公共垃圾桶和電話亭被排除在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製圖限制當代生活跡象的可見性，政府向業主和建築生傳遞這如何最大限度的隱藏生活跡象的消息
提升歷史形象 (To promote a historic imag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所有設計活動必須得到遺產辦公室的批准 ● 國內和國際營銷材料將其宣稱為「博物館之城」(Knapp, 200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限制了設計的選擇，要求設計必須基於歷史案例 ● 宣傳強調小鎮的浪漫和異國風情，但沒有建立博物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沒有太多限制，但表面協調和適應性的設計是可取的 ● 將浪漫、懷舊和「活博物館」聯繫在一起

資料來源：Nelle(2009)，本研究重新繪製

在 Trinidad，博物館化是通過政府投資保護修復的建築，將其重新用於滿足旅遊需求的場所來完成的，遊客對公共空間的佔用更多的集中在這些場所周圍，Nelle 認為這是在功能和環境的轉化意義上留下的，而拆除當代生活標誌的活動並不重要，因為政治和經濟制度已經保證了廣告等的東西小時，並且通過植入歷史標誌來提升歷史形象的作用微弱，這些措施與開一家餐廳相比，並不明智。當地政府沿著不相連的街道進行活動的 Guanajuato，改變了一個集群模式，促進了歷史形象，對公共設施的投資很高。在步行街的創建影響了遊客佔用公共空間的模式，步行街更多的是旅遊為導向建立的商業街，是遊客使用的服務，政府將歷史形象集中展示，和商業行為相結合，成為歷史形象的推動者。似乎最有效的博物館化策略是在 Vigan，政府把所有活動集中在一個精緻的區域，設法建立了一個博物館島，通過拆除當代生活的標誌來實現功能和環境的轉變，並建立規章制度，促使遊客重新使用空間。Nelle 提出的方法是將博物館化從作為發生的事務的被動角色中解放出來，並且認為在對城市空間的商業化、中產階級化和迪士尼

化的各種改造方式，博物館化的被動得到了解決。從三座城市中可以看出，當地政治、行政、經濟、社會和文化是影響博物館化的上層因素，Trinidad 當局的集中權力、Guanajuato 微弱的行政控制以及 Vigan 城市中精英的影響力，是對實施參與式的政策規劃提出的不同挑戰。

博物館化帶來的城市空間改變和商業行為，似乎延伸了博物館學本身的意義，從建築、街道以及私人住宅的改變中，都引導指向包容性城市概念。包容性城市理論的實踐在遺產城市博物館化過程中尤為明顯，博物館化的動力首先是保護歷史，在包容性的作用下保護範圍不斷擴大，使得博物館化也同樣擴大，在城市背景下的博物館化包括去脈絡化和再脈絡化的相互作用(Nelle, 2009)，並且在城市發展中逐漸強調歷史(或被博物館化的物)的重要性，因此博物館化能夠促進城市規劃，並且能夠擴大包容性城市概念在區域內的發展。

Vilcea(2023)等學者在 Craiova 的建築遺產博物館化的研究中，認為城市中的歷史街區在振興發展的過程中，往往導致了博物館化，這些博物館化是在城市功能改變的過程中實現的，最直觀的就是歷史建築的功能最終以展覽為目的展現，強調城市保護和通過旅遊遺產資本化(Capitalization of heritage through tourism)的背景下，有利於創建一個露天博物館的一系列活動和特征。Vilcea 等學者在 Craiova 的田野研究中發現兩點，其一，在地居民認為歷史悠久的市中心是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最願意推薦給遊客的地方，這映射著在地居民對遺產的情感依戀，然而，在對比非中心的遺產區域，市中心的遺產區域更被大多數在地人推薦，原因是市中心有更多的私人住宅和生活氣息；以此引出第二點，歷史街區的博物館化擁有三個明顯特征：功能的喪失/改變、背景的改變、缺乏生活的跡象。沒有生活氣息的歷史建築是冰冷的，這樣的生活氣息是地方感的表現，遊客作為外來者，生活在歷史街區的在地居民是他們能夠接觸到的最有溫度的存在，儘管建築的博物館化促進的是建築功能轉變，但活動的在地居民依舊是地方性的主要貢獻者。建築外牆的修復、為提升歷史形象的標誌和繪畫，像是憑空套上的紙盒而淡出視野，久而久之，商業化的冷漠改變了人們對地方的認知，導致地方感的缺失。

從包容性角度看待博物館化計劃，Craiova 城市並沒有如預期的發展，這也是 Nelle 所認為和 Vigan 同樣的博物館化程度，短期來看確實能夠明顯看到城市區域的規劃和旅遊業的發展，在初期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若是往長遠看，這樣的模式似乎並不可持續，並且就大範圍看，並沒有解決迪士尼化的問題。Nelle 認為的精英影響力，是否加速擴大了內部的貧富差距，是否造成區域內部的規劃不平衡，即遺產區和居民區分裂，遺產區變成一個商業大公園，成為了 Vilcea(2023)等人對建築博物館化浮於表面的質疑，建築博物館化和歷史步行商業街，其本質上都缺少了在地居民的參與，或者說從生活上將其分開，步行街成為在地居民上班的地方，從居民區帶去的地方感也在日復一日的旅遊活動中消失，沒有溫度的「歡迎光臨」淪落為商業話術。反觀 Trinidad，短期內造成的遺產與

和居民區生活氣息的混亂，卻是加深了地方感的存在，城市化和同質化的現象讓遊客更追求自然，這樣的博物館化，雖然帶來的經濟效益並不多，更多的是依賴博物館功能和實踐，但遊客體驗感一定是和 Vigan 不一樣的。

遺產城市的博物館化過程，是將區域內的遺產通過博物館化轉變為具有博物館性質的展示品，遺產作為區域內的展示品，通過對展示品的博物館化，擴大到區域內的環境博物館化，打造具有遺產特色的博物館化區域，並在包容性的影響下，開發文化旅遊為城市賦能，提高經濟效益。安吉縣內也存在著同樣的發展模式，受到生態博物館和城鄉關係的影響，歷史、自然和產業作為安吉縣的展示品，將其打造成具有博物館性質的展示品，通過對展示品的博物館化，擴大到村落的环境博物館化，並且開發鄉村旅遊。

二、安吉縣的博物館化

在中國語境之下，城鄉關係影響著中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並導致安吉縣的博物館化現象的產生。「一五計畫」時期，正是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城鄉二元分裂使得博物館事業停擺，後受到蘇聯影響，各地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建立，其地方性得以顯現，但因為有限的地方材料和欠缺的科學研究，以及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政治導向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地誌博物館選擇了地方性與全國性並重的雙重表達(趙慧君，2017)。而在具體實踐中，特別是 1956 年黑龍江省博物館指出(趙慧君，2017)，地方歷史的材料缺乏一貫的徵集，對地方歷史的發展有缺乏考察和研究，因而不得不用全國性的文物來代替這一陳列。地方性和全國性之間錯中複雜的紛爭，使得中國博物館事業一度陷入糾結，如何合理的處理地方性和全國性之間的關係，成為每一個地方性博物館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70 年代改革開放和 80 年代的城鄉關係不斷緩解，對於村落或落後地區的關注度不斷提高，蘇東海先生適時引入生態博物館概念，於 90 年代後期與挪威建立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這一時期的博物館注重「中國化」和「本土化」的發展，縱觀中國社會發展和博物館事業的發展，90 年代依舊建立以地方性為主的博物館，這樣的地方性，是關注於貴州梭戛當地苗族的文化歷史，是人與物之間的連結，而生態博物館概念注重於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因而在 90 年代乃至 21 世紀初期，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是中國唯一涉及到人與物、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博物館。2002 年中國城鄉二元體制開始鬆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成為構建新型城鄉關係的新目標(張海鵬，2019)，此時城鄉之間的交流也逐漸變多，大量城市博物館專業學者去往村落，因此 2005 年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成立，這一階段開始有能力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這是城鄉關係的突破，也是博物館事業的突破，博物館專業學者開始大量發揮作用，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被定義為中國第二代生態博物館。

在 2007 年之後，政府主導構建城鄉融合機制的進程開始駛入快車道(張海鵬，

2019)，這也意味著政府政策的力量成為鄉村發展的主要力量。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也正是這一年安吉生態博物館正式落成並對外開放，被稱為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不同於前兩者，安吉生態博物館不處於少數民族聚集地，並且處於東南沿海省份，而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狀況位於全國前列，因此安吉生態博物館為發達地區和非少數民族聚集地，建立生態博物館提供可能性。為符合「城鄉發展一體化」，綜合「本土化」和「專業化」的各項優勢，安吉生態博物館是政府扶持下的、具有「規劃現代化」的博物館。而在這 11 年(至 2023 年止)的時間內，安吉生態博物館群還在不斷擴張，隨著安吉縣城鄉發展的態勢，不斷融合鄉村規劃和在地文化，不斷將中心館的資源帶去鄉村，將教育、傳播等能夠不斷滲透至安吉縣的方方面面，可以說安吉縣的博物館發展離不開中國城鄉關係的發展，而安吉城鄉發展也離不開安吉生態博物館的發展。

表 3-2 中國城鄉關係演變和中國生態博物館的關係

時間	中國城鄉關係	生態博物館特點	代表性博物館
20 世紀 90 年代	城鄉二元分裂	「中國化」和「本土化」	貴州梭戛生態博物館(中國第一代生態博物館)
21 世紀初期	城鄉二元體制開始鬆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成為城鄉關係新目標	「專業化」	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中國第二代生態博物館)
2012 年後	城鄉發展一體化，朝向城鄉融合發展	政府扶持下的「規劃現代化」	安吉生態博物館(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上表(表 3-2)中可以發現，中國城鄉關係和博物館的相輔相成，是如今安吉縣的博物館，源源不斷的根據城鄉關係和政策需求而發展，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中，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位置，除了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水平等基礎設施建設，還重點提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目標，而中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讓專業學者認識到，這是一條博物館發展軌跡。

從中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過程中也能發現，政府介入逐漸強勢，並把發展視線指向鄉村。第一、二代生態博物館的特點「本土化」和「專業化」是在博物館學基礎上提出的，雖然部分場館設置在鄉村，但產生了水土不服的現象，使得幾

年之後博物館荒廢，博物館獨立於鄉村，是與在地居民之間的格格不入，也是鄉村建設的缺失，這也是蘇東海(2017)提到的因生態博物館行動者代際更替造成的「空檔」效應。「十四五規劃」強調縣區發展的要求，安吉縣的鄉村政策，代表著政策的可實踐性，而安吉生態博物館代表著非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生態博物館的可能，將鄉村政策與生態博物館放在一起的模式，用本研究的運行模式來說，是將村落中的地方感，通過博物館化，將其功能轉變，使其獲得展示性，在包容性之下擴大其影響範圍，從村單元起，到縣單元止。因此，帶有包容性的博物館化，隨著強勢的政府政策介入，博物館化的擴大也成為展示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也造就了如今安吉縣的局面。

第二節 從村到縣的空間博物館化現象

2008年安吉縣制定了《安吉縣建設「中國美麗鄉村」行動綱要》，圍繞「村村優美、家家創業、處處和諧、人人幸福」這四個方面制定鄉村改造計劃和標準，具體內容包括空間規劃、經濟、環境、安全、健康等方面。鄉村空間改造由點到線到面的過程進行，從污水處理、生活垃圾處理到河道管理，此時並未出現相關地方性的設施出現，到後期生態和環境的治理和美化，和後續的「一村一品」提出，才逐漸展現所謂地方感的表現。回溯這一歷程，安吉縣作為美麗鄉村的示範縣，似乎從一開始就有博物館化的跡象顯露，不僅從政策角度，也從具體實踐中展現。而地方感的介入也十分巧妙，是在基礎設施基本完成之後，鄉村整體改造時提到的，因此在這一小節中，本研究更多的著墨於整體改造時的博物館化。目前安吉縣共有168個行政村、19個村改居⁵和20個社區，在擁有博物館的行政村內，有三個代表性的村落展現的不同博物館化過程：鄣吳鎮的景塢村、天荒坪鎮的餘村、遞鋪街道的古城村。景塢村以知青文化著稱，村內擁有知青展示館在內的多處文化遺址；餘村作為中國鄉村政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源地，擁有很強的政治性和很大的環境轉變，因此以環境和政策性為主進行鄉村改造；古城村近年來由於越國遺址的發掘，由於景區制度的管理，使得村落樣貌發生改變。

村落的博物館化，是在鄉村政策之下的產物，以發展鄉村為目的進行的改造，因而在村落內的博物館化過程是帶有包容性的，在本研究的田野中，村落的博物館化改造通常以階段性的改造為主，從微觀到宏觀的過程。

一、第一階段：保存與恢復

⁵ 村改居：農村改為社區，包括土地性質變更、農民身份變更等。資料來源：<http://mtw.so/5MxUxbl>(取用日期：2023年10月16日)

第一階段通常是對歷史、自然或產業進行點狀的保存與恢復。在安吉縣中，更多的是關於生態博物館原地性的特點，大多大型物件都保留在原地。村委首先盤點村落的歷史、自然或產業名錄，最終歷史、自然和產業的發展，保存與恢復具有地方意義的物件或空間，這一過程將物轉變為博物館物。景塢村由於特殊的歷史，知青文化很快成為村落的改造主題，村內一直留存著當年的大院和水壩，因此村委首先藉由保存和恢復這兩處遺址，將全村的文產進行歸納，以知青文化為主軸進行鄉村改造，知青大院(圖 3-2)、知青壩等大型場地或工程，依舊保留在原始的地方，改造過程中也是秉持著恢復的理念，但因水文系統的改變，知青壩的儲水功能轉為展示功能，留在原地也是以全村整體規劃角度實踐的。十多年前餘村以販賣礦業為生，但也因此破壞了環境，後來通過對環境的保護，又以環境為主進行村落規劃。保留礦坑，並且以音樂和藝術的方式介入，將其納入全村的導覽路線，和景塢村的知青壩一樣，礦坑已經廢棄，並且是餘村環境轉型升級的原點，目前已沒有其實質性的功能，當青年創業者進入餘村，將其打造成為美術館和露天音樂場，礦坑的功能轉變，也映射著餘村功能的轉變，即從販賣礦業到販賣環境。曾經的古城村是自然形成的，外來移民定居在此，依山而建，自從發現了越國遺址，古城村就因此踏上了規劃村的命運。越國遺址最早發現在村民幾十年勞作的山間，考古人員的搶救性挖掘，將大範圍的山和田納入其中，政府規劃將村民盡數歸整到統一的小區，後遺址範圍由旅遊公司接管，成為如今的景區管理，因為遺址的整體規劃，將古城村的在地居民整體搬離至車程五分鐘的地方，也算是一種對遺址的保護。



圖 3-2 景塢村知青大院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二、第二階段：可利用的外部空間

第二階段是將第一階段的博物館化擴大到全村範圍，將可利用的外部空間進行博物館化的過程，是從點到線的擴大。景塢村通過將在地居民的圍牆重新粉刷和歸整，將空地改造成小公園，讓村落中的房屋看似擁有統一的風格，並且重修了鄉間小道和鄰里之間的小路，串聯起知青大院和知青壩這樣的展示點之間的距離。並且隨著上游漂流設施的完善，景塢村成為民宿的聚集點，除了招商引進的一座酒店，村民也將自己的部分房屋納入村中民宿體系。在地居民為了讓自己的民宿能夠獨樹一幟，在建築和美化上也思考了很多，從最開始的一家兩家民宿，影響到全村不論是民宿還是村屋，都有獨特的風格。村落中的在地居民是景塢村的主人，也在村落外圍打造了一條健行步道，該步道也將所有的展示點和村屋都包圍在一起。

餘村在對展示點外部空間的利用中，大致可分為景區和村屋區。在大範圍的景區中，將現有的田野分區，讓不同季節都有鮮花和農產品，配合體現自然風格的竹製建築和廢棄小學改造，公共廁所(圖 3-3)以江南風格改建，將景區範圍不斷擴大，修建環山綠道，將人往山間引導，並以此設定餘村景區範圍。而在村屋區，房屋間的小路將鄰里距離拉近，修繕下水道，並開辦「餘村供銷食堂」(圖 3-4)等村內服務站，將居住在山谷間的居民牽出，歸整到靠近餘村行政中心的村屋區，提出「大餘村計劃」，試圖將周邊小型村落也納入發展。

而古城村的越國遺址直接景區化管理，使得與村落本身的關聯性降至最低。在景區內，除了考古現場的保留，小湖被開發成釣魚場，草地被開發成孩童玩樂趣，還附有射箭體驗，並且開發小火車軌道包裹著田埂，顯然是為了打造生態親子旅遊而設定的遊戲場。在地居民都是附近自建房屋拆遷，搬遷至此的居民，統一的小洋房取代了形態各異的自建房，村委開始規劃社區活動。總之古城村的外部空間被劃分為兩部分，村委只有權力對社區內的空間做規劃，而對於景區只有掛名而已。



圖 3-3 餘村-景區公共廁所入口意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3-4 餘村-村屋區供銷食堂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安吉縣的村落以漸進式的方式進行村落改造，而最終呈現的樣貌差異，從空間上來看體現在展示點/區與村屋區之間。在景塢村，村落範圍將知青文化展示點包括在內，在地居民的房屋與展示點交融在一起，是在地居民出門就能看到的存在。在餘村，兩者的關係更像是家門口的公園，展示區與村屋區相隔不遠。而在古城村，由於景區化管理，村屋區與展示區有 5 分鐘的車程距離，並且似乎找不到兩者的連結。這三個村落博物館化後的樣態，用 Nelle 的分析來說，古城村的博物館化更完全，因為能讓遊客沉浸式體驗越國文化和考古發現，餘村次之，原因是村屋區與展示區有距離但很近，最後則是景塢村完全交融在一起。而本研究認為，若是將生態博物館的特點納入案例中，這樣的順序似乎完全不同。

在生態博物館的特點中，以人為本也是要素之一，在地居民作為區域內活動的物，具有極強的地方感，在全球化的肆虐中，最難同質化的是在地居民，他們世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習慣決定著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改變著生活空間，門口的院子、後院的鴨棚、村口的大樹和路邊的井，都充斥著生活氣息，而博物館化帶來的是對村落文化功能的整合，古城村(圖 3-5)因此壓縮了村屋區原有的空間，將其歸整至小區，看似住進了精緻洋房，但也失去了開闊的院子，看似村委組織的美麗庭院的活動，實則約束了村民在自家庭院的散漫，因此所謂完全的博物館化，伴隨著一種約束力，並且與展示區分開的樣貌，又與生態博物館以人為本的特點不合，景區內是工作人員和遊客，景區外才是在地居民，又或者說景區內的以人為本，是立足於展示性的，這樣的展示性，帶有形式主義意味。



圖 3-5 古城村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反觀景塢村(圖 3-6)展示區與村屋區交融的情形，以生態博物館的角度，似乎是把在地居民納入展示區內，實則在空間中也確實做到了，遊客在遊覽展示點時，必然經過在地村民的家門，低矮的圍牆將村民院子暴露無遺，對於所謂隱私在地居民是不在乎的，畢竟很久以前就是這樣，反而隨著旅遊業的旺盛，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到此，對隱私權無畏僅僅是對鄰居或者同村人，對外人的戒備使他們常常大門緊閉，遊客似乎打擾了他們正常生活，對於成群的遊客也已經麻木。在空間上追求的展示性，與現狀適得其反，反而惡性循環，這樣的博物館化結果也不是村落期待的。



圖 3-6 景塢村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餘村(圖 3-7)的樣態恰好處在古城村和餘村之間，展示區與村屋區有一定距離但並不遠，遊客有兩條主要動線，分別先經過展示區和村屋區，或者說看遊客是否期待走進村屋區，靠近展示區的村屋被在地居民改造成特產店、小吃店和飯店，提供休閒和特產展示。餘村因其強烈的政治意涵，因此其改造程度也遠超其他村落，並且在村屋區存在著藝術介入的展示點，是青年藝術家留下的伏筆，這樣的博物館化，保留著村落的完整性，同時也將展示性發揮到極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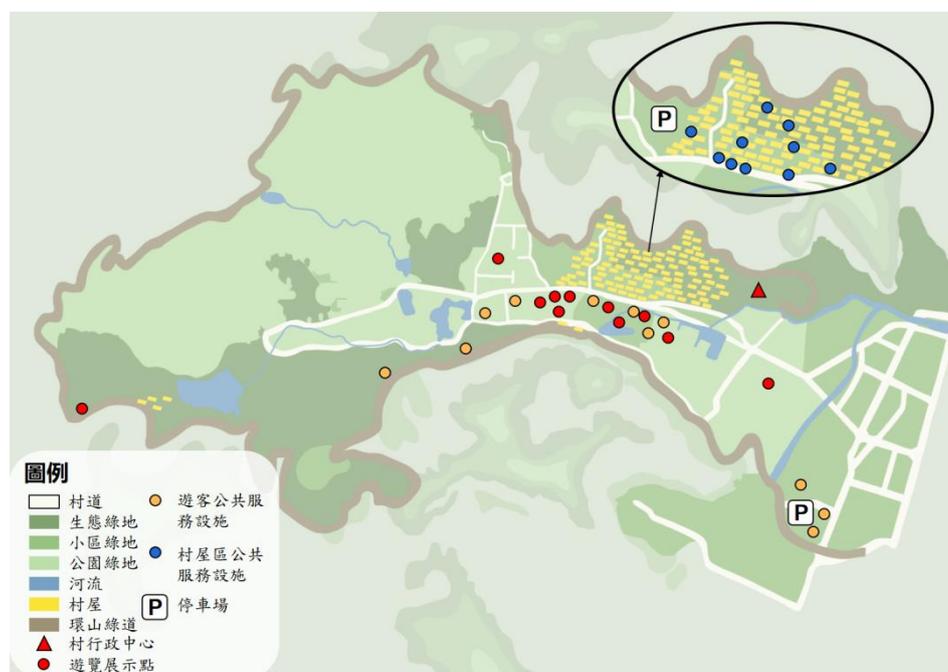


圖 3-7 餘村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鄉村改造過程中的博物館化現象，將村落從空間、管理和形式上規整為能夠自成一脈的小單元，安吉縣從 2008 年至今都還在轉變中，村落朝著更數字化的方向發展，但也因此遇到了瓶頸，但這也並不影響這些村落組成在一起，對鎮的整體改造計劃，「大餘村」計劃等都是以鎮(鄉)為單位的，較村更高一個層級的博物館化計劃，而這樣的計劃，也將博物館化推向更高的行政級別——縣。

三、第三階段：強調主題形象

第三階段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的美化，並突出村落的主題形象。2007 年安吉縣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一村一品，試圖將每個村落打造成極具特色的美麗鄉村，而在改造工作告一段落之時，適時強調村落主題形象的工作就浮出水面。景塢村根據知青文化，在村屋圍牆上畫上具有鮮明時代風格的繪畫(圖 3-8)，在知青大院中也放上那個年代的農具和食物模具。餘村的特點是突出政策落地後的完美形象，凸顯「美麗」鄉村，設立打卡標誌性大石頭(圖 3-9)，空調外掛機

套上了竹文化鐵網，窰井蓋畫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字樣和繪畫(圖 3-10)，路燈掛滿了美麗鄉村的宣傳標語。另外，餘村另一大主題是數字化，因此垃圾桶(圖 3-11)是太陽能自動的，山間捕蟲器是太陽能驅動的。古城村則是體現在路牌和村口意象(圖 3-12)，並且在景區內隨處可見的路燈也都是張貼著古越國的圖騰。



騰。

圖 3-8 景塢村圍牆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3-9 餘村-景區大石頭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3-10 餘村-村屋區窰井蓋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



圖 3-11 餘村-景區垃圾桶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3-12 古城村-村口意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隨著一村一品政策在各個村落的實踐，都成為了極具特色的展示村，以村為基礎的鄉鎮改造也如約進行，將周圍村落一起納入規劃成為一個新計劃，可預見的鄉鎮改造納入全縣整體改造，作為鄉村博物館化的可能。在村落中，從對展示點的保存與恢復，到利用外部空間作為展示點包容性空間的改造，最後到強調主題形象為鄉村賦能，這樣從點到面的發展模式，同樣也能夠運用到鄉鎮和縣一級的博物館化規劃中。安吉縣內共有 169 個村和 39 個社區，這些村落組成 11 個鄉鎮和 4 個街道，這樣鄉鎮和街道共同組成安吉縣，從博物館化的角度看，每個村落的博物館化過程是促進了鄉鎮的博物館化，將村落看做展示點，村落間的馬路、田野、山都是外部空間，這些外部空間的改造在鄉鎮規劃中也一併納入其中，最後將鄉鎮的特色冠以強調主題色彩，這也正是為什麼景塢村的路燈是扇子的形狀，因為景塢村屬於鄞吳鎮，而鄞吳鎮的竹扇成為了鄉鎮的文化意象，也因此鄞吳鎮內的村落公共文化設施的美化，多以扇子為主。

而對於全縣來說，每個鄉鎮都有自己的規劃體系，就像每個村落也自成一脈，全縣博物館化的過程，也從展示點開始，鄉鎮作為展示單元，展示美麗鄉村的成果。可利用的外部空間縮小到道路，而安吉多丘陵多河流，盤山公路和橋樑成為特色，安吉也因此有公路文化展示館。安吉縣一直以「中國竹鄉」著稱，竹子也被當做全縣的文化象征，空調外機(圖 3-13)、變電箱、窰井蓋、路燈、垃圾桶上都刻畫著竹子形象，更有小區名稱、道路名稱等也都帶有「竹」字，強調主題形象成為安吉縣博物館化計劃的方法之一。從博物館學的角度，安吉縣的鄉村博物館化，使得全縣成為一個露天博物館，場館內按照鄉鎮分區，每個村落就是展示點/品。這樣的博物館化促進空間的重新規劃，也以此擴大了包容性的範圍，即從對地方感的保護挖掘，到村落的改造，以此延伸到鄉鎮和縣的整體規劃發展，將鄉村作為全縣發展重點。



圖 3-13 空調外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安吉縣作為美麗鄉村政策提出的縣城，其村落本身就帶有展示性，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又將部分村落冠以「美麗鄉村精品示範村」的字樣，這樣村落的博物館化，也同時展示鄉村政策的實施成果和政策的實踐性。後續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使得鄉村政策擴展到全國，安吉縣的鄉村又成為了其他村落學習的對象。如果說第一次的博物館化是針對鄉村治理和改造的，這次的博物館化過程即是針對第三階段的。安吉的村落近年來成為外縣市村落參觀的景點之一，為了強調政策的決定性，各個村落在強化主題形象中，增加了關於政策的裝飾工作，即對「美麗鄉村」的標語或圖解，在村落以外的外部空間，也盡數以美麗鄉村的 logo 作為美化裝飾，因此遊客來到安吉，首先以美化裝飾上的美麗鄉村字樣作為安吉縣的初印象，並以此帶入參觀村落，更進一步加深對政策實踐的感知。這樣帶有包容性的博物館化計劃，在安吉縣的實施過程中，不僅以村落單位擴大了對村落的改造，也擴大了對政策的宣傳和實踐的作用，因此這樣的博物館化的擴大，也展示了政府實施的政策，並推廣全國，帶有包容性的博物館化，使得安吉縣呈現如今的樣貌。

第三節 博物館作為一個政府指標

每一個政策的提出，都伴隨著試驗場地，而安吉縣就成為了這樣的試驗場地，

美麗鄉村政策最早是安吉縣提出的鄉村政策，後來發展成為全國鄉村政策，安吉縣就成為了鞏固政策的案例。從中國城鄉發展和生態博物館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博物館學逐漸削弱，政府強勢介入，而從鄉村發展過程中，發現鄉村博物館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博物館化的開始。鄉村中的博物館在短時間內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後續依舊出現了博物館廢棄的「空檔」現象。當博物館化的天平倒向政府政策，博物館成為一個指標，博物館的存在似乎並不影響鄉村博物館化的過程，那麼在鄉村中還需要博物館嗎？又或者說在博物館化過程中，需要設立博物館嗎？

在安吉縣的博物館是在博物館化過程中出現的階段性產物，用本研究的方法論來說，是地方感到博物館化這個階段的產物，鄉村改造是一個博物館化過程，博物館屬於博物館化過程，但不會是必要產生的。博物館化作為一個機構化的過程，一種再論述的方式，可以通過建築、美術等具有展示性的樣態呈現，在景塢村(知青大院、知青壩等)、餘村(五彩水稻田、竹製建築等)和古城村(孩童考古區等)等村落都有相關體現，在博物館化過程中，他們的功能都增加了展示性、生態性或教育等意義。同樣的發展模式，有些村落並沒有以博物館作為鄉村發展的契機，那能說明這些村落沒有從地方感中汲取養分改造鄉村嗎？並不是，博物館化從對歷史、環境或產業的功能性轉變就開始了，並不意味要建立以歷史、環境或產業為主題的博物館，也並不是只有博物館才有展示教育意義，在博物館化的過程中，這些鄉村改造的結果已經成為了展示品，鄉村成為了露天博物館，展示改造的經驗，也展示政策的實踐。

在本章的論述中，博物館化的脈絡性在對城鄉關係的分析中得到證實，在這樣的觀點下檢視安吉縣，政策被博物館化解釋了安吉縣有這麼多博物館但並不活躍的現象，突出在政策執行時的衝突。安吉縣提出的鄉村政策被推廣至全國，是一個從特殊性到普遍性的過程，暗示著中國當下的城鄉政策落實是採取一種普同、形式主義對於在地生活模式的對話，博物館化所隱喻的城鄉包容性是建立在唯物主義的特殊性視野上的，博物館化的完成度要對比鄉村改造的完成度，而不是博物館建設的完成度，但是由於在安吉縣的博物館化過程中，強調政策的被博物館化，忽略了全面的生活與地方，使安吉縣的鄉村成為一種政策的展示，所以城鄉發展一直會處於階段性或不確定的狀態上。

生態博物館成為了鄉村政策中的一個指標，而鄉村改造中並不一定出現博物館，因此鄉村博物館產生「空檔」的現象，與其說是對指標的執行，不如說是對博物館化概念的認知差異，是一種人與物的衝突。相較於第一、二代生態博物館獨立於區域發展的體系中，其博物館化終止在博物館的建立，安吉生態博物館群被納入鄉村發展的體系中，成為安吉發展中的文化角色，博物館化沒有在博物館終止，反而繼續朝向可持續的發展目標，博物館只是地方感博物館化的結果，而博物館化是一個貫穿鄉村改造全過程方式，擴大了包容性的規劃，不僅在鄉村發展中，在全縣的規劃中，還需要更多博物館化來促進整體的發展。

第四章 包容性的安吉城鄉發展



2015 年，聯合國第七十屆大會上通過了《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議程呼籲各國採取行動，為今後實現 17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努力，在這個議程中，第一項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的減貧目標，而中國在 2013 年就已經提出「精準扶貧」的思想，並逐漸形成「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的扶貧工作方法，隨之而來的，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在鄉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促進鄉村發展。而安吉縣呈現的鄉村發展，在博物館化過程中發展的戰略，是一種具有包容性概念的發展模式，以促進地方的發展。

本章(圖 4-1)針對博物館化過程中的安吉鄉村發展模式，來討論在包容性概念之下，如何通過鄉村經濟包容性發展創造價值，並以地方為發展目的，討論地方包容性發展體現或再創地方感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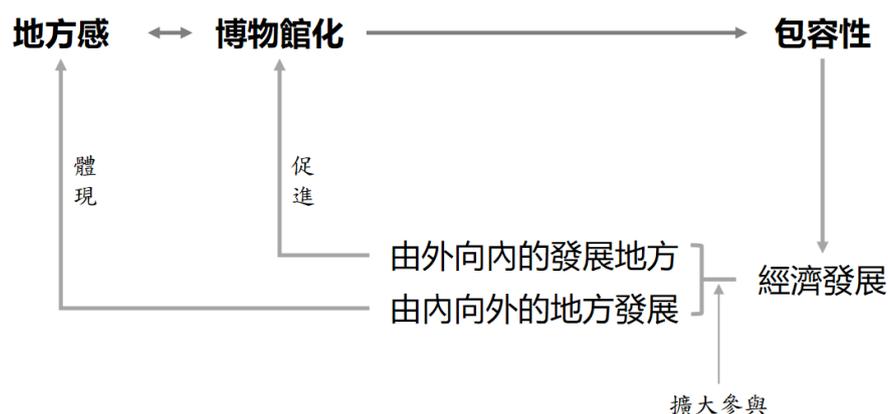


圖 4-1 第四章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一節 包容性發展

自 2007 年亞洲開發銀行(ADB)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為尋求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各國、各組織都紛紛發表相關報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佈的「包容性成長及發展報告」(WEF, 2018)中指出，國家經濟發展並不能實際反應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必須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包容。最終指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以經濟包容性推動社會包容，也能夠以社會包容性推動經濟包容。全球化的影響下，全球貧富差距過大、城市和鄉村差距不斷擴大，使得各國紛紛追求均衡發展，包容性城市概念應運而生。包容性城市作為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概念，是從社會角度促進經濟發展，也能夠從經濟角度促進社會發展(Anttiroiko, 2021)，Anttiroiko 呼籲建立一種新的城市社會經濟模式，在城市發展的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可以通過具有包容性的價值創造和消費，並考慮到一切利益相關人對觸發經濟發展的貢獻來實現，並最終實現社會包容。

一、經濟包容性：推動社會包容

Anttiroiko 對於包容性城市概念的看法是建立在包容性的概念上的，即價值創造和共享。包容性城市關注的是城市發展的社會方面，而 20 世紀 80 年代之後，城市技術經濟範式使得貧富差距過大，城市經濟發展使得距離包容性城市越來越遠，因此社會包容把事情變成了建設性的、面向發展的一個任務(Silver, 2015)，其中有一些相關概念可以分為四大類，首先是社會正義、公平和結果平等等概念描述了目標和最終結果，其次機會平等、團結和公平概念描述了社會可接受的最終結果的條件和意圖，第三是基於利益或可取性的，包含社會凝聚力、和諧和福祉等概念，最後描述了社會有益條件與機會平等相同，例如社會資本和共享的聯繫。

在社會包容的論述中，公平意味著結果平等，這意味著每個人的能力和資產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需要通過糾正性的安排在區域內平等生活的機會(Jones, 2009)，因此結果平等需要大規模的國家干預。機會平等不同於結果平等暗示的在給定的領域內，所有社會成員創造相似甚至相同的最終結果條件，機會平等是允許每個人追求其目標的公平條件和規則(Gosepath, 2011)，因此許多政策的重點轉向社會包容和機會平等。在這一背景下，討論的社會凝聚力概念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指出(2011)，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致力於所有成員的福祉，創造歸屬感，並以防止不同群體內部和之間的邊緣化為目標。社會資本和共享，可以被描述為社會行動和組織的有利條件，社會資本的存在可以成為社會包容性的主要貢獻者(Anttiroiko, 2021)，因此，社會包容性可以通過經濟包容性來推動。

經濟包容性與減貧、提高收入和就業平等有關(Silver, 2015)，這也是 Anttiroiko 的論點之一，即不在專注於要求和強迫社會包容，而是將注意力轉移到從問題和確實的機會上，以及為什麼和如何需要不同的個人和群體來創造經濟價值，也就是說在包容性城市概念中強調經濟包容性的重要性。在包容性城市的概念中，經濟包容性的原理是包容性增長，反應了商業的多樣性，涵蓋了包容性的工作場所，有助於低收入社區的包容性企業、以及採用重視寬容、多樣性、多元文化和社會包容的企業形象等，並在此基礎上改善員工、客戶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互動(Porter, & Kramer, 2011)。同時，經濟包容性也被賦權的個人和群體機會，這種觀點強調人們在當地社區創造的價值努力，表明他們致力於利用他們所擁有的、可控制的資本類型來為自己以及社區服務(Gibson-Graham, 2017)。在這一部分中，經濟包容性強調社區內部的發展，也就是說，以在地居民的力量，使得地方能夠發展，或者說，以地方為起點，創造價值以達到地方發展的可能。經濟包容性也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地方的創業能力，使得在地居民都擁有創造經濟價值的能力，機會平等也體現在政府的政策，和政府主辦的活動上，地方政府發揮的是領導作用，構建平衡統一的框架，而不是成為被動處理利益的處理中心(Anttiroiko, 2021)。

在 Anttiroiko 的論述中，展示了以權利為導向轉向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包容性，他強調，各種群體或個人的晉級包容是一種建設性的、積極的包容形式，人們所擁有的資源、才能和潛力，在包容性結構之下，有助於促成社區所有成員的福祉。同時，經濟包容性城市，是將包容性作為經濟內在要素的城市社區，既討論區域內的被排除在外的弱勢群體，將金融資本形式轉向其他資本形式，即文化、社會、物質或自然等資本，又關注各種團體經濟、聯合經濟、公民經濟等的活動，拓寬了價值創造的視野。綜上所述，在包容性城市概念中的包容性概念，是價值創造和共享，包容性經濟使得區域內的居民利用他們的創造潛力，創造的價值造福於整個區域，包容性創造的機會平等，使得這樣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地方發展，即通過在地居民創造的經濟價值，使地方發展。

二、擴大參與為當地創造價值

經濟包容性不僅需要在地居民的創造潛力，還需要確定各種地方利益相關人，以及他們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支持包容性驅動的價值創造的潛力(Anttiroiko, 2021)，也就是說，需要擴大參與，為當地創造價值，這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發展地方的形式。擴大參與在經濟包容性中，是一種價值創造，是將機會平等的包容性擴大到區域以外的經濟創造者，並且各利益相關人之間的合作與協調能夠擴大經濟包容性在區域內的影響。在地方政府主導的統一框架下，越來越多的利益創造者，希望擺脫單一的、以權力為基礎的社會包容性議程，以經濟創造議程作為補充，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經濟包容性方法(Anttiroiko, 2021)。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具體指出(2017)，價值

創造包括提供技能和就業機會、支持創業和融資以確保獲得增加經濟機會的服務等活動，創造的是機會平等，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激勵那些缺乏動力的人，並幫助那些缺乏技能或能力的人。政府指導下的包容性，需要建立在協作和分配治理的形勢之上，這就要求在參與進來的相關者之間，建立平等、靈活、互利的關係。這樣的協同發展模式，逐漸成為一種公共治理的概念，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並制定和執行相關策略，以追求集體利益，這使得新的公共治理接近利益先關著的管理(Rixon, 2010)。

同時地方政府也是一個參與者，在協同發展中納入機構、組織等的內部治理，以發展為導向的包容性，支持邊緣化、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機會平等，並在商業環境中，組織招聘、培訓和非正式聚會等活動(Ortlieb, 2014)，更好的輔助他們的發展。網絡的發展也促進了包容性的發展，在 Anttiroiko 的體系中，網絡是交換知識和利用社會中的各種資源庫的重要手段，並且能夠使得小規模的利益相關者聯合起來，匯聚資源，創造出無法獨立產出的產品，網絡更是將區域發展和數位平台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平台能夠最大限度的產生協同效應，激勵並且產生動態的影響，這樣的附加值的產生，不僅能夠擴大利益相關者的範圍(OCED, 2015)，還能夠將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轉化為一種互動，創造的價值遠超於單打獨鬥的成果，在經濟意義上的參與，是每個人作為價值創造者參與社會的能力。

擴大包容性強調的是通過網絡、夥伴關係和數位平台的方式，建立足夠龐大的知識庫，採用社會和促進整合協同發展的政策，豐富區域發展的可能性，讓這種由外向內的發展地方的模式，藉由擴大外來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讓經濟包容性推動社會包容性，進而充實包容性的區域發展。

第二節 安吉模式

過去的城鄉關係失衡，造成了城市和鄉村多種困境(權衡，2016)：一是「三農問題」和農村貧困化逐漸固化；二是城鄉二元結構與發展持續擴大；三是社會排斥導致流動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造成城鎮內部新二元結構；四是城鄉資本和土地要素配置不合理，城市反哺農村的體制機制不健全；五是城鎮空間分佈和規模結構不合理，大城市病與城市群發展滯後並存；六是城鄉建設缺乏特色與鄉土文化流失。因此，後續提出的城鄉協調發展，形成平衡發展結構的城鄉一體化體制，是為了解決和緩解上述城鄉問題，並提出了包容性發展的思路。安吉「美麗鄉村」政策中就包含著對鄉村發展的初步構想，並最終確立「安吉模式」的發展，以縮小城鄉差距。安吉模式是一種生態經濟發展模式，簡單來說，第一是靠產業升級驅動綠色發展，第二是靠環境優化支撐綠色發展，第三則是靠制度改革和創新機制，釋放政策紅利以促進內生經濟動力(王秀玲，2023)。

「安吉模式」最早在 2010 年 12 月被提出，是中國美麗鄉村政策的一種實踐方案，充分發揮安吉自然資源和農業資源優勢，變資源為資本，實現一二三產業聯合、城鄉統籌發展，最終建成環境優美、生態良好、生活富裕的美麗鄉村(姚禹陽，2018)。綜合來說，安吉模式的做法，是以村書記為主體，讓村書記成為鄉村振興的領路人，並且注重共建共享，讓有限的財政資金發揮最大效果，以持續改善人居環境，促進鄉村科教文衛全面發展(湖州市人民政府，2021)。在這樣的背景下，挖掘村落資源和如何運營發展成為鄉村發展的兩個階段。挖掘村落資源這一階段，普遍在鄉村規劃階段完成，或者說，挖掘村落資源，包括農業、文化等方面的資源，同時在村落規劃階段，有意識的發展起經濟效益，因此在規劃階段，村落中的這些方面都成為規劃的重點。

對於鄉村運營發展，安吉縣提出了《全域鄉村經營的實施意見》，推行「兩入股三收益」的政策，簡單來說，是資源、資產入股，農民拿租金、掙薪金、分股份的方式，用「國資投入+民企運營+利益鏈接」的機制來經營鄉村。在對每個村落的資源量化之後，資源入庫「兩山合作社」⁶和數字鄉村圖，讓生態資源能夠以圖像化的方式更直觀的呈現。農旅、文旅、文創、科創、康陽等生態項目成為首選，通過招募一批優質項目，來實現生態資源的轉化(朱言，2022)。然後就是入股並確定分配方式，《浙江日報》在 2022 年根據這樣的實施意見做了簡單總結：

主要按照優先股和劣後股兩種方式，建立「企業+村集體+農民」利益聯結機制。「優先股」是指直接利用的土地經營權、資產資源使用權入股，在促進鄉村資產保值增值後，按照「保底收益+增值分紅」形式參與分紅。「劣後股」是指間接作用的自然資源、配套服務等，在專案投資方收回成本後再參與分紅。同時，要突出對低收入群體的幫扶和救助，提倡按照不低於其他股民 1.5 倍享受分紅。

這樣的分配方式，保障了在地居民的權益，在村政府的帶領下，加入村資本，以集體形式成為鄉村經濟發展的股東，以在地居民的立場來說，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地方發展，在鄉村博物館化之後，將其展現在遊客面前，同時在地居民也是鄉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吉鄉村的運營模式，也吸引了社會資本來安吉縣投資，創造經濟價值。同時鄉村也邀請青年人才來地方創業，涵蓋了品牌推廣、鄉村運營服務、文化創意產業、美麗鄉村建設、生態研學教育、休閒旅遊業等多個方面。外來資本入駐和青年來到鄉村創造鄉村經濟，是一種對地方資源的再挖掘和再創造，把資源帶來鄉村發展，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發展地方的模式，從鄉村發展來說，

⁶ 兩山合作社：安吉縣兩山生態資源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縣級「兩山合作社」），為安吉城投集團全資子公司，具體負責安吉「兩山合作社」平臺搭建和後期運營，並率先成立「鄉鎮兩山生態資源資產經營有限公司」（鄉鎮「兩山銀行」），統一主體和名稱對外運營。通過設立縣鄉兩級兩山公司，創新「縣級兩山公司統籌專案規劃、鄉鎮兩山公司著力專案落地」運營聯動機制，並廣泛吸納 N 個多元主體參與建設「兩山合作社」專案，實現對全縣生態資源進行統一規劃、統一收儲、統一開發。（資料來源：<http://www.anjilsyh.com/cms>）

青年在鄉村中創業，是回到挖掘村落資源再發展的過程。

從包容性的理論研究中可知，包容性城市概念的核心在於對包容性的理解，所謂包容性，體現在價值創造和共享上，並且通過經濟包容性和擴大參與的方式，讓區域發展有兩個方向的努力以創造價值，即地方發展和發展地方，前者是以在地居民為主的，以地方為主體的發展經濟效益，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發展形式，後者則是在經濟包容性中，擴大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讓外來經濟創造者也加入發展地方經濟的行列，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發展形式，兩種發展形式受到在地政府主導的框架之下，協同發展，共同促進地方的發展。安吉模式體現著包容性的理念，是政策引導下的，通過地方發展和發展地方的兩種形式，促使安吉縣的鄉村從村落空間規劃走向發展。

安吉模式成為了一種標準化的機制，從挖掘資源到鄉村運營模式的完整地方發展政策，從包容性的視角來看安吉模式，經濟發展一直存在於鄉村規劃中，在地居民的收入也是一直被關注的重點，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本，將在地居民納入資本本體，是經濟包容性的表現，在地居民被納入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一環，而由於經濟模式的轉變，擴大了權益範圍，並且良好的創業條件，擴大了經濟創造者的參與，吸引收納了社會資本和青年創業者來鄉村創造經濟財富。

一、地方發展：在地居民

承接上文針對地方發展的論述，是由內而外的在地居民創造的經濟價值以推動地方的發展，可以理解為，是鄉村的博物館化現象和政策的博物館化現象，使得發展鄉村旅遊成為一種水到渠成的活動，而在地居民的經濟活動，是附屬在鄉村旅遊之下。

依附著知青文化開發的紅色鄉村旅遊項目的鄣吳鎮景塢村，村委以「文化+旅遊」的概念打造的項目，並引進多家資本人駐投資旅遊業。景塢村位於天目山北支，千山萬壑，丘陵地帶造就了山脈平均海拔並不高，但在景塢村附近的鄣吳溪，在低海拔的落差下，適合開發漂流產業，由景塢村村委註冊的安吉鄣吳溪旅遊開發公司開發的漂流項目，並且吸納了附近村落共同開發，形成「6村+1企」的村企聯營的模式，並且依附著漂流業的項目，創建了民宿集聚村(圖 4-2)，形成「山宿+溪宿+田宿」的民宿產業體系，將景塢村所有民宿，納入體系整體對外宣傳，創造利益做大化，民宿經濟成為在地居民外來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圖 4-2 景坞村民宿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但是，近年來安吉鄉村中的民宿，試圖走向現代的路線。早期村民將以已建造完成的村屋，改造成為民宿，後來由於大量城市遊客湧入，崇尚自然、「逃離城市」的想法迅速蔓延，村民紛紛將村內的民宿推倒重建，修建以開闊的天台、巨大的落地窗和以簡單幾何空間等的現代主義建築為主的民宿(圖 4-3)，外立面多以江南特色的黑瓦白牆為主的配色，或是直接以徽派建築馬頭牆做建築裝飾，這樣類型的民宿，價格往往比早期村民的自住屋貴好幾倍，但配套服務設施並沒有跟上，因此性價比不高成為安吉民宿普遍存在的問題。另外，節假日的房費也是離譜增長，小長假往往是旅遊業最發達的時期，鄉村民宿的價格往往比平時搞出兩到三倍，安吉縣多山並且靠近上海，成為城市遊客短途旅行的好去處，因此鄉村中一直流傳著「殺豬不如殺上海人」的俗語，意為聽見上海口音，價格往往被抬高，消費亂象也成為鄉村旅遊的問題之一。



圖 4-3 餘村新建民宿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餘村的在地居民以農家樂、特產商店和民宿為主要方式創造經濟價值增加收入，靠近餘村景區的村屋區，也就是村屋區最外側的住宅，多改造成為農家樂、小吃店(圖 4-4)和特產店，而民宿則是錯落在村屋區內，值得注意的是，餘村的經濟發展最早是以農家樂為招牌的，村內第一家農家樂「春林山莊」，也就是村長的家，餘村也以村長的嘗試而發展起農家樂產業，店內也多以竹林雞、竹筍為主製作菜餚，突出竹林經濟為在地居民帶來的價值。



圖 4-4 餘村-小吃店葉家鋪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不同於景塢村和餘村依附著旅遊業而興起的地方發展，古城村以社區營造的方式發展地方經濟。古城村的村屋區和景區相隔甚遠，因此遊客鮮少會走進村屋區，因此村內的經濟規模很小，地方政府在村內的活動，也多以促進社區凝聚力而舉辦的活動(圖 4-5)，例如美化院子或者共同製作青糰子等活動，這樣的社區營造，是以在地居民生活為主的，而非獲得直接經濟收益，村內的商店、菜店也都是以居民生產、生活為主。



圖 4-5 古城村-村內活動展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古城村的村屋區和景區在空間上的分裂，也在生產生活上分裂，遺址公園景區帶來的經濟效益，繞過了在地居民，或者說，景區的經濟效益盡在土地租賃上能夠提供在地居民效益，部分區域的後續發展，是承包給第三方，在地居民可以在第三方的管理下，被僱傭參與景觀維護和房屋修建等工作。對於古城村的在地居民來說，他們在地方的常規經濟來源主要有兩部分，首先是失地保險，這是一種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社會保障的制度，在地居民能夠獲得政府提供的保險，值得注意的是，失地保險要求的是「人地對應」，也就是說，只有是古城村的農村戶口，才有資格領取，例如一家三口人，只有父母是農村戶口，而孩子由於工作等原因戶口被遷出，因此只有父母二人才能獲益。第二個主要收入來源，是承包景區田地或應聘第三方工人，景區內的田地根據季節而分種，以景觀花卉、油菜、水稻為主，生產出的糧食作物，由第三方直接售賣，也就是說，在地居只需要操心作物生長，並不需要操心如何銷售，第三方統一以市場價付予工資，使得農民收入穩定。

地方發展體現的地方感，是在政府統一規劃之下出現的經濟模式，依附於創造出的經濟價值成果，因此在地居民的收入並不穩定，三個村落在不穩定中尋求的收入，是在外來資本介入下，為保持原有生產生活方式的穩定，在發展地方體系下創造的經濟收入。安吉縣的地方發展，大多取決於政策和外來資本的投入，不可否認確實為村落帶來經濟效益，提高在地居民的收入，但這樣的商業模式讓地方文化成為一種噱頭或標籤，包容性的經濟發展在安吉縣缺失的是文化再創性和可實踐性，並且對地方來說這樣的經濟模式帶來的普遍是觀光客的流動，並非是能夠創造地方文化的經濟創造者，因此對於安吉縣的地方發展來說，眼前利益

大到讓人忽略了可持續發展的目的，令人擔憂熱度消散，斥巨資的文旅項目是否只剩下對過去榮光的肯定，因此如何轉型誘發真正的地方發展成為鄉村難題之一。



二、發展地方：外來經營者

安吉的發展地方模式普遍以外來資本為主，分為產業落戶和市集，更直接帶來經濟效益和人氣。產業落戶多依靠自然環境開發的經濟項目為主，而市集多是以政府主導下的藉助安吉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題的攤位。藉助生態環境開發經濟建設，並以此開發新產業，吸引外來資本投入安吉縣旅遊業的發展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吸引了小資本來此落戶，民宿和酒店成為最大的資本落戶。景塢村由於景區與村屋區交融在一起，因此村內的商店設施多是以在地居民生活為主，村內的外來經營者也都是以住宿功能為主的創業，安吉鯨客酒店落戶在景塢村，成為民宿群的一部分，該酒店同時也創造了多種職位，讓在地居民在家附近就能有工作有收入。不同於景塢村，餘村由於政策的影響，有一定的政治性能，因此餘村的「年年有餘研學中心」(圖 4-6)承接了多次大型會議，研學中心隸屬於安吉文化旅遊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是由縣一級的國企投資建設，主要以研討會、階梯教室等會議室組成，以酒店管家時服務理念，成為研學培訓、公司會議的場所，讓餘村成為了「開會+旅遊」一體化的村落。



圖 4-6 餘村-年年有餘研學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古城村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在政府主導下，藉助社會資本和浙江省內的

文物保護、考古專家的力量，為遺址公園設置了考古研學體驗、自然探索、新勞動教育和紅色傳承等親子活動。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投資建設景區各項設施，成為古城村最大的資本投入，景區內的博物館，雖屬於安吉生態博物館群體系，但在實際管理中，並沒有參與安吉縣博物館的整體運營。古城遺址博物館是直屬於安吉縣文物保護中心的，屬於文保單位下屬的博物館，這也是安吉縣唯一一個屬於文保單位的博物館，因此在博物館的展覽和宣傳中，有極大的自主性，與其他省份的展覽交流，多次更換特展內容，事實上在安吉縣的鄉村中，古城遺址博物館的發展最為活躍，原因之一是遺址公園的屬性，遺址公園作為社會資本投資的景區，是具有商業價值的園區，需要購買門票進入，這也是造成了在規劃時期，村屋區和景區分離從場景。遺址公園的唯一建築，是博物館連接著酒店，古城村的完全博物館化，能夠讓遊客沉浸在園區內，搭配住宿服務設施。景區內還分佈著多種帳篷形式的房間，主要以安吉縣的學生和散客為主，遺址公園所在地原本就是丘陵，依山而建的帳篷，能讓城市遊客體驗山間的寧靜。

在酒店和民宿的發展下，越來越多的城市遊客願意來安吉度假，因此咖啡文化也被帶入安吉鄉村。安吉縣的鄉村咖啡廳數量在 2023 年達到了驚人的 300 多家，本節提到的景塢村、餘村、古城村都至少有一家咖啡廳，餘村(圖 4-7)更是擁有 9 家咖啡廳。安吉鄉村中的咖啡廳，多是以環境為主的咖啡廳，山間、溪水邊、民宿間都藏著風格各異的咖啡廳，這些咖啡廳的主理人，以青年為主，成為一種創業形式，更是因為露營的盛行，咖啡成為年輕人表達休閒狀態的工具。這些自然、悠閒風格的咖啡廳，吸引了更多的城市年輕遊客進入鄉村，為鄉村帶來不少的曝光度和經濟收入。



圖 4-7 餘村-咖啡廳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但是在鄉村博物館化之下發展的旅遊業，朝向大城市期待的風花雪月模式，或者自然、自由模式發展，鄉村中的咖啡廳是為遊客準備的，35 元人民幣一杯的普通美式咖啡(折合新台幣約為 155 元)，最終以「來都來了」的想法而消費，這種一次性的消費，能夠在短時間帶來人潮，特別是社交媒體的普及，越來越多的遊客來此打卡，但熱度散去，留在鄉村的是在地居民，且不談是否能夠適應都市文化都市咖啡習慣，被抬高的最低消費，能否落回草根價格，被抬高的消費意識，消費能力能否承受落差，能否匹配消費習慣，這樣氾濫的、浮於表面的擴大參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能否以福祉意識促進地方發展，地方不再是回憶裡的地方，充滿著快消產業的慢節奏鄉村，似乎在可持續的、綠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政府主導下的市集也成為鄉村吸引人氣的手段之一，不同於酒店、民宿吸引的城市遊客，在鄉村中的市集吸引的大部分是在地居民和鄰村居民。安吉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很多，文保單位主辦的市集，其攤位都是以非遺為主。安吉縣的非遺文化分佈在全縣各地，因此這樣的市集在安吉縣的流動，讓非遺走出村落，也讓在地居民看到不一樣的文化。

發展地方的模式，是具有市場性的，安吉鄉村規劃在博物館化的影響下，成為全國鄉村的典範，安吉模式更是吸引了眾多社會資本投入鄉村發展，以此形成良性循環，安吉模式似乎的成功，但是略有趨之若鶩的嫌疑。民宿的價格戰令遊客猶豫了，對高昂的住宿費的擔憂勝過了對美麗鄉村的好奇，咖啡廳的網紅屬性，也確實營造了一種「不去很失望，去了更失望」的現象，性價比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而快閃式的市集，三天之後村落又歸於平靜，一模一樣的非遺攤位出現在各個村落，逐漸對其感到疲憊。發展地方的模式理應更關心消費水平這樣的細節，因此在安吉鄉村發展中，還需要填補細節讓發展地方的模式更完備。

三、安吉縣作為一個大鄉村

2018 年中國頒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對鄉村的定義凸顯了空間的視角：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安吉模式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安吉模式是以鄉村發展為主體的，將政策、資源朝向鄉村發展傾斜，同時安吉縣也意識到縣域推動鄉村發展的優勢，提出「一個縣域就是一個大鄉村」的理念，這樣的理念在「大餘村計劃」中窺見一斑。大餘村計劃將天荒坪鎮、上墅鄉和山川鄉三個鄉鎮確立為「大餘村」的跨區域發展圈層，形成以點帶面、片區聯動、整體提升的局面。

在「大餘村計劃」之下，如何吸引創業者來到鄉村，如何創鄉村本土經濟的業態，成為鄉村問題之一。「餘村全球合夥人計劃」(圖 4-8)採用「兩入股三收益」的政策下的人才政策，與村集體共享收益，餘村的「兩入股三收益」的政策是指大餘村強村公司通過資產、資源兩入駐形式投資合夥人的項目運營開發，後

續按照股金、租金、薪金三收益計算分工(朱言, 2022)。在餘村創業的青年中(圖 4-9), 有用藝術賦能鄉村的團隊, 將礦坑遺址打造成美術館, 有以「零碳」為主題, 將老廠房打造成圖書館和共創空間, 有以科技賦能教育, 打造一個農業為主題的科技創新教育基地, 有社區營造團隊入駐, 也有以休閒為主的樂隊駐扎在此, 他們都成為餘村數字遊民公社的一員, 青來集成為青年創業基地, 讓青年的理想, 在鄉村集結。2023 年 4 月, 「大餘村 O₂ 生態文化圈計劃」發佈, 活動圍繞著「文旅產業賦能」、「青年社區營造」、和「藝術鄉建共創」三大主題展開, 生態文化圈計劃將營造一個共同共榮的空間, 讓餘村年輕化、亮起來(楊衛麗, 2023)。像餘村這樣的青年人才計劃, 是吸引創業者來鄉村重新審視鄉村, 以青年眼光再創鄉村資源和文化。原本鄉村發展方向掌握在政府手中, 有極大的局限性, 現在將這些權利轉移到青年創業者手中, 將價值共享擴大到外來創業者, 讓在地居民和外來創業者共享鄉村資源和經濟。



圖 4-8 餘村-全球合夥人站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 4-9 餘村入駐企業/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在地方發展和發展地方的模式中, 安吉縣作為一個大鄉村, 各個鄉村以經濟發展作為對接鄉村規劃後的重點, 在地居民和外來經濟創造者同在鄉村中創造經濟價值, 將文化、自然等因素整合, 藉助社會資本發展鄉村, 最終擴大到全縣。大余村計劃的提出, 意味著在安吉縣, 實現了村到鎮的發展, 並且聯動周圍鄉鎮形成發展長廊, 最終擴大到縣一級的整體發展, 村落成為縣域發展的重點和起點。在安吉模式中, 鄉村運營成為一個創新點, 通過對接資本和勞動力, 鄉村運營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主要負責對村落或多村聯合的區域進行定位、策劃、規劃、設計、運營、經營業態招募等, 通過項目的創建到實施獲得收益, 運營團隊也成為了鄉村發展中的新角色。

第三節 博物館化帶有形象經濟意味

Smith(2006)通過古根漢美術館的發展給畢爾包市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城市活力由此再生的事實，指出投資標誌性建築和文化設施，吸引更多遊客從而促進區域的經濟文化發展，這樣的過程被稱之為「畢爾包效應」。畢爾包效應的核心，是通過投資具有標誌性的建築或產業，打造城市品牌，在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經濟的普遍性和獨特的現代性取得突出的地位，特別是 Smith 提到的「911 事件」之後引發對於真實和標誌性的討論，都凸顯了圖像經濟對人類情感的核心重要性，以視覺形式為主的人、物、思想和文化之間象征性的交流，這種微妙的聯繫也被稱之為「圖像學」，足夠靈活，並服務於市場，打造城市品牌以發展經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圖像化形式，也就是說，城市品牌也是一種形象經濟。在本論文第三章提到的，在鄉村建設過程中「強調主題形象」階段，就是一種形象經濟，把「美麗鄉村」政策圖像化，進而使用到城市品牌創建上，這是一種政策博物館化之後的圖像化宣傳，也是鄉村政策中的一環，安吉縣呈現的鄉村發展，除了經濟發展還兼顧政策宣傳的功能，因此安吉縣的城市品牌和形象經濟就尤為重要。

安吉縣的城市品牌，是美麗鄉村政策，以安吉縣博物館化的成果呈現，最終都指向經濟發展，什麼樣的地方資源被博物館化後能取得經濟效益，就成為優先考慮的重點，並促成商業行為。上文提及地方文化成為一種標籤，就是一種圖像經濟，「一村一品」成為一種博物館式的宣傳手段，政策博物館化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並停滯不前，唯一發展的是經濟形勢上的轉變，村民收入增加成為鄉村發展的落腳點，讓鄉村的博物館化過程成為一種以經濟發展為目的商業行為，在這樣的觀念下，挖掘鄉村資源具有了選擇性時，優先考慮其商業性成為博物館化的前因。

在本研究的論述中，當鄉村發展再次回到規劃之初，地方感作為博物館化的前因，開始具備了商業性和可開發性，鄉村發展的成果能夠賦予後來創業者的靈感，成為地方中的元素，同時對於在地居民來說，這也是一種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身份轉變，由內而外的地方發展的發展模式，是回到地方本身和在地居民之間的關係，也是回到本論文最早對於地方感的論述。就像對 Cambridge(2007)的對畢爾包效應的評論一樣：「它們(指標誌性建築等)作為紀念地點的情感價值要高得多」，Smith 舉出的例子，其本身的情感意義大於建築物本身，不論是 Cambridge 還是 Smith 似乎都帶有諷刺的意味，但在安吉縣，這樣的情況似乎更加明朗，除了商業性質本身，其情感意義一直都是被官方新聞媒體提及的重點，但這樣的情感價值，在當前安吉縣的發展來看，是一種形象經濟，是為了擴大博物館化結果而產生的。這樣的形象經濟是一種被選擇的、為政策服務的宣傳方式，是外在附加並一直強調的論述，無法完全體現出地方感本身。

安吉縣的博物館化的過程，從物到空間，最終走向發展模式，是一個從博物館學的概念，到空間規劃的概念，最終在政府政策之下走向發展的過程。博物館化在安吉縣成為了地方發展的前端過程，為後續發展做準備，但是包容性引發的

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安吉縣鄉村發展再次博物館化，也就是說，以鄉村旅遊等商業項目而重建的現代化民宿、咖啡廳等，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再建的，是一種商業行為，而重建的現代化民宿，和越來越多風格各異的咖啡廳成為宣揚美麗鄉村政策的重點之一，這個過程可以被認為是博物館化，而這樣的博物館化是在商業意識之下產生的。這樣商業意識博物館化在鄉村發展中，成為發展政策博物館化的表現，博物館化產生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也促成博物館化的再發生。這樣由外向內的發展地方的模式，創造出的經濟價值，促成了博物館化的再次發生，進而導向包容性經濟發展模式。

另外，畢爾包效應是服務於市場的，安吉縣的鄉村發展，是以市場思維運營美麗鄉村的。首先創新運營機制，將社會資本、運營團隊、村集體和村民放置在一起，共創鄉村經濟，共享經濟成果，其次在地政府優化鄉村營商環境，建立鄉村信息共享機制，然後保障各個環節利益相關人的權益，扶持鄉村經營項目，最後在項目和人才計劃中，發展「兩入股三收益」的改革，優化鄉村智庫，這樣的發展是建立在鄉村規劃之後的，也就是鄉村博物館化之後。

安吉模式是一種鄉村發展模式，發展生態經濟促進第三產業在鄉村的發展，提出一種分配方案，在地居民入股成為資本受益人。在青年人才計劃中，通過在鄉村規劃階段時的博物館化過程和政策的博物館化，吸引外來青年入駐鄉村，因此促成了外來青年對地方的再挖掘，使得地方資源被博物館化，青年創業中取得的外來的社會資本投資，和政府提供的創業交流會與課程，創業項目順利落地，並且僱傭在地居民實現創業項目穩定發展，在這個項目中擴大參與，把社會資本和在地居民也納入其中，創造經濟收益，並共享成果。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以村落的包容性為起點，創業過程中挖掘的地方資源，並且博物館化後，創造經濟效益，使得形成良性發展模式。

包容性發展在安吉縣的發展中，使得博物館化帶有形象經濟意味，區域發展的核心意義是向人們傳遞生活的意義，博物館化促進的鄉村發展，創造的價值理應以福祉性的結果回饋地方，並且在地居民在過程中成為主體和最大成果受益人，鄉村是屬於在地居民的，在地居民才是地方的主人，博物館化帶來的價值，需要以長遠眼光看待，因此鄉村發展任務任重而道遠。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討論的是生態博物館與城鄉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以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為案例。研究展開以博物館化作為切入點，以地方感作為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價值所在，同時博物館實踐也將拉近地方與博物館之間的距離，在安吉縣的案例中，鄉村建設刺激著博物館化的進程，政策和權利的介入，使得空間博物館化的結果同時促進了政策博物館化。經濟包容性在鄉村中的發展，使得博物館化的結果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同時政策博物館化也因為經濟發展，逐漸走向形象經濟方向，最終生態博物館與空間規劃的結果，以安吉縣的發展呈現。如下圖所示(圖 5-1)，本研究以新博物館學中地方感到博物館化的過程、空間規劃中博物館化到包容性的過程，和包容性中的經濟包容性的發展方向作為章節分析的主軸，分別指出以地方感作為生態博物館的價值，在被博物館化之後衍生出多種博物館化現象後影響城鄉空間改造，並且在經濟包容性的作用之下，城鄉發展催生出形象經濟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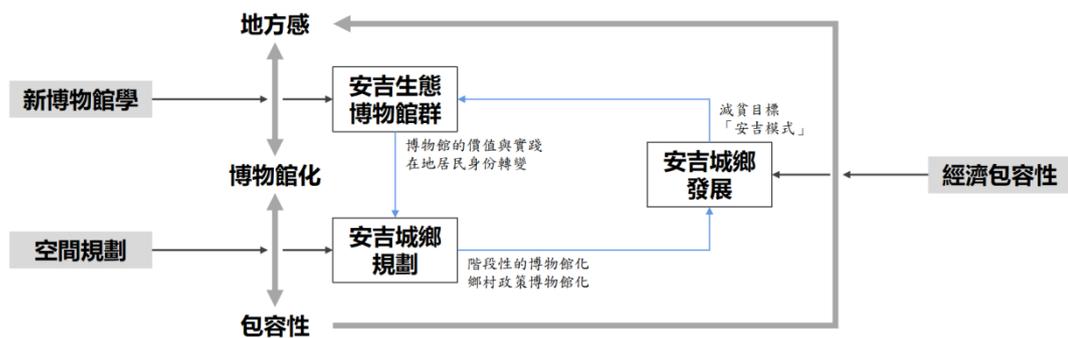


圖 5-1 論文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第二章的論述中，從安吉縣的歷史人文、自然環境和產業角度論述，這些都是成為博物館價值的來源，這些從地方中生產的因素，包含人與環境的交融，都是促成了生態博物館的建立，構連起從地方感到生態博物館的博物館化路徑，博物館的價值凸顯對地方感的重視。在這樣的路徑發展之下，安吉生態博物館通過自上而下的「文化下鄉」的活動，把從地方中汲取出的地方感，這種通過親密性累積的主觀情感，經由博物館化之後，成為具有展示性質和具體化的博物館物，再次傳遞給在地居民，是輔助地方感的形成與傳承的過程。博物館自下而上的「文化反哺」的活動，使得博物館能夠召集地方感的集中表現，生態博物館成為地方感的物化保護，並以整體形象展示於在地居民，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穩固地方感在在地居民情感中重量。文化下鄉和文化反哺，體現的是博物館能動性，是博

物館本身受制於博物館學的影響而促成的一種實踐，不論是地方感的博物館化過程，還是博物館實踐的再脈絡化，這都成為「安吉模式」中的一環，安吉生態博物館也成為了在地居民與地方對話的場所，成為一種紐帶。在這樣的過程中，在地居民也從最開始的「旁觀者」到後期「參與者」的身份轉變，同時也帶來的情感轉變，博物館成為在地居民參與地方發展的媒介，藉由上層政府對地方博物館的政策安排，和地方博物館本身的能動性，幫助在地居民加深歸屬感，重拾對地方的信心。對於生態博物館本身來說，地方感也是一種本土化的表現，博物館價值是一種內化並從地方種提煉出來的向內地方感，博物館的實踐，是一種博物館本身能動性來帶的地方感的再現，是一種外在疊加的地方感，這樣的博物館在安吉縣的鄉村中，代表著地方感的具象化表達。總而言之，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作為安吉地方展示的機構，其背後的博物館學，集中在生態博物館本身對於地方的論述，但就安吉縣的地方來說，帶有政治色彩的生態博物館，其本身的草根性局限在情感博物館化的面向，而非展示形式之上，因此安吉縣的生態博物館群，從館群形式上看，依舊保留著傳統博物館的莊嚴，在地居民僅靠博物館能動性，還不足以完全達到身份轉變的階段。

地方感成為了「促進博物館化」的方式之一，是博物館建立的因素之一，在博物館學之下的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均勻的分佈在鄉村中，與鄉村的規劃發展密不可分，也促成了鄉村空間博物館化的過程。中國城鄉發展狀態，從二元分裂的局面到如今逐漸走向融合，也體現在生態博物館的發展上，第一代生態博物館注重「中國化」和「本土化」的發展，這離不開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博物館多是以建立地方性的博物館為主的潮流，當生態博物館概念傳入中國，學者將其中國化後，實踐在貴州省這樣的少數民族地區，希望藉此能夠保存少數民族文化和情感。當城鄉二元關係開始鬆動朝向城鄉一體化方向發展時，廣西省開始籌建生態博物館，這一時期中國博物館學開始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中國第二代生態博物館也以此確定為專業化的探討。安吉生態博物館群被認為是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不同於前者坐落於少數民族地區，安吉縣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地區，並且處於城鄉融合的發展階段，因此安吉縣的生態博物館群是帶有鄉村規劃性質的、政府扶持下的「規劃現代性」的，縱觀中國生態博物館概念的發展，政府的介入也預示著生態博物館需要具備博物館學以外的功能。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規劃現代性」體現在鄉村規劃之上，2008 年安吉縣提出美麗鄉村政策，至此影響了安吉縣至今的城鄉發展，本研究從安吉縣內選取景塢村、餘村和古城村來概括安吉縣的鄉村空間博物館化的過程，博物館化體現在鄉村改造上，並且經過田野研究，這三個村落的博物館化是一種階段性的過程，第一階段通過保存與恢復鄉村中歷史、自然或產業，憑藉生態博物館的原地性的特點，這些展示內容點狀分佈在村落中，第二階段連接這些展示點之間，改造道路等線狀的空間，藉由填補可利用的外部空間，初步完成鄉村改造，第三階段強調村落的主題意象和美麗鄉村政策，以完善鄉村改造。這三個階段博物館化的結果，是美麗鄉村在政策的呈現，換句話說，安吉縣作為提出美麗鄉村政策的縣城，本身帶有政策的展示性，需要

將這種特殊性普遍化實踐，並且這也的博物館化在安吉縣，成為縣級政府對鄉級政府一種階段性的指標。因此這樣的博物館化過程，同時也是政策博物館化的表現，這也導致了安吉鄉村中的博物館化，始終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下。在這一章節中，地方感藉由博物館化的過程，被粗糙的使用在鄉村空間規劃之上，使得博物館化成為一種空間規劃方式，在本研究中博物館化成為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

為實現減貧目標，各國都實施了相應政策，這是包容性發展的過程，鄉村經濟發展是中國實現減貧目標的主要任務，在安吉縣的案例中，鄉村改造的熱門話題之下，鄉村經濟發展順勢成為熱點。在第四章中論述了經濟包容性需要擴大參與為地方做貢獻，在安吉縣的發展中，鄉村發展被認定為「安吉模式」，倡導將資源變為資本，在維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之下，發展生態經濟，並且以市場化的思維發展新的分配制度。這樣的分配制度，不僅將在地居民從經濟層面轉變為「參與者」，也吸引外來創業者來鄉村中發展，「安吉模式」名詞的出現，是這種發展方式被博物館化的結果，也是政策博物館化的一部分，並且被強調成為安吉縣主題形象的一種，以此成為良性循環，又進一步擴大了政策博物館化，成為安吉縣的鄉村品牌，「一村一品」成為鄉村現狀和政策手段，安吉縣也因此存在著鄉村博物館化的現象，是以安吉縣為尺度的博物館化，這樣的博物館化在安吉縣促成了商業發展模式，以旅遊產業為主的經濟項目，並讓地方成為一種標籤，也就是地方品牌化帶來巨大經濟效益。而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擴大的政策博物館化，使其滋生出一種形象經濟，在早期這種形象經濟能夠深入人心離不開政策對鄉村的規劃與發展，而後來，隨著商業經濟項目的介入，大批外來創業者的介入，他們創造出了源自鄉村資源的項目，創造出了所謂地方情感，這種被創造出來的地方感，也讓博物館化帶上了形象經濟的意味。

在本研究中，地方感的概念一直貫穿整體，安吉縣的生態博物館群多是以地方感作為博物館的價值所在，地方感的博物館化後，其賦有地方感的物，或者說被認為具有地方感的物成為博物館物，並放置於生態博物館內，這樣的博物館中的地方感，是物到博物館物的轉變，博物館就自帶地方感，也就是說，這樣的地方感，是博物館化從地方萃取出來的，同樣也能夠證實在本研究中，生態博物館「向內的地方感」，是一直被提及的由內而外的地方感，是與生俱來的本土情愫，同時也是博物館背後蘊含的文化脈絡。在經濟包容性的作用下，「安吉模式」把在地資源變為資本，鄉村資源開發成為經濟項目，也就是說，部分地方感被博物館化後，開發為經濟項目，經濟項目就帶有地方，安吉模式實行的市場化和新分配制度，把在地居民和外來創業者放置於同等地位，這也是在地居民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身份轉變，暗示著地方感經由博物館化並被經濟包容性影響之後，創造出新的地方感，這樣的地方感，是由外向內、疊加的「向外的地方感」。這樣向外的地方感展示的是一種權力關係，一種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政策要求，其目的是發展鄉村經濟，實現減貧目標。這樣的鄉村發展模式，回應了生態博物館的論述中，本土性和草根性的內與外的結論。

地方感經由博物館化後，被認定為向內的地方感，受到經濟包容性的影響，創造出向外的地方感，這一過程同時也是政府權利逐漸擴大的表現，地方感的博物館化尚可認為是一種博物館學的主動性，但從博物館學過渡到空間規劃的過程中，則是政府指導下、減貧目標和市場化的結果，在政策博物館化的過程中，鄉村發展是依循「經濟調性」展開的。安吉縣作為第一個提出鄉村發展政策的縣城，其本身就帶有證明政策可行性的目的，因此出現的形象經濟也是論證鄉村政策成功的宣發，但是形象經濟的出現，也預示著鄉村政策在安吉縣的發展只能是正向的結果。

安吉生態博物館被冠以「生態博物館」的名號，是源於中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而中國生態博物館是蘇東海先生最早學習海外新博物館學而引進的，而在 20 多年的發展中，早已形成獨特的風格。生態博物館的思潮從法國傳遞到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都根據地方特殊性而改變，中國生態博物館中政府權力的介入成為特點，就本研究來說，博物館化連結了博物館學和城鄉發展，是連結了地方感到經濟發展的實踐，安吉從情感、空間、政策等的博物館化過程，形成如今特殊的城鄉景觀。張譽騰(2003)曾在著作中提到 Mayrand 的創意三角形(triangle of creativity)(圖 5-2)來歸納加拿大的上博思生態博物館，透過生態博物館的機制，希望能激起民眾的意識，以嶄新的眼光、創意的做法，來探索和使用他們所居住的空間，試圖以這樣的模型促使在地居民回答「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我們是誰」、「我們想到那裡去」這三個問題，構連起生態博物館和地方之間的連結，以回應生態博物館的現在和未來。但這樣的結構僅在博物館學範疇流動，是希望藉由生態博物館來影響地方的模型，而對於本研究來說，這只是地方發展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安吉縣的地方發展，生態博物館只作為一個切入點，而非完全依靠博物館力量，還需要政府扶持和資本介入，與地方共同創造經濟效益。



圖 5-2 Mayrand 的創意三角形
資料來源：張譽騰(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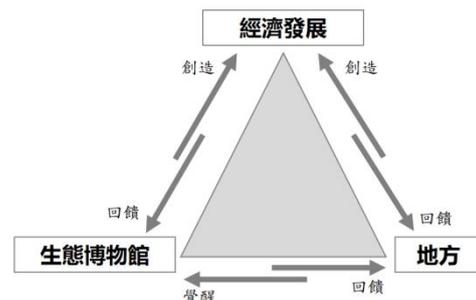


圖 5-3 安吉縣的創意三角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因此本研究在 Mayrand 的基礎上，衍生出屬於安吉縣地方發展的模型(圖 5-3)。三角形的模型套用到本研究對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的邏輯中，分別以地方、生態博物館和經濟發展作為節點。在地方建立的，以地方感作為博物館價值的生態博物館，是在地居民從博物館角度看待地方發展的意識覺醒，同時博物館實踐，即安吉縣的文化下鄉和文化反哺，能夠回饋地方以文化角度。在安吉

縣的發展中，對生態博物館的意識覺醒刺激了城鄉空間，以博物館化的方式進行城鄉改造，湧現出的空間博物館化和政策博物館化，在經濟包容性的作用之下，促進了經濟發展，這種經濟發展形成的「安吉模式」也回饋到生態博物館的運營之上。同時，「安吉模式」的市場化運營模式，產生新的分配制度，讓在地居民參與地方發展，創造經濟效益，這也是經濟發展回饋到地方的方式。至此安吉縣的三角模型形成良性循環。

安吉縣共有 73 家(截至 2022 年)生態博物館，其背後蘊含著豐富的安吉地方感，包括在地文化與歷史、自然環境和地方產業，共同構建了生態博物館的價值，在文化層面，這些生態博物館受到中心館的統一規劃與發展，在行政上則是基層政府的管理，因此館群體系從文化和行政上受到不同單位的管轄，而行政上主要是以執行中心館提出的要求為主，鄉村館之間的連結多以鄉村文化活動為主。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建立，展示的是中國生態博物館在安吉縣的發展，展示博物館功能、空間規劃、在地居民和政府權力之間的關係。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在安吉縣的發展，是一個集合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的混雜綜合體，安吉縣的發展模式，意味著城鄉政策可以從新博物館學角度切入。地方感和博物館化的關係中，促成並影響著安吉生態博物館群，在博物館化的過程中，轉向包容性的發展模式，影響著安吉城鄉規劃，而包容性的發展，促成了安吉城鄉發展的可能。地方感、博物館化和包容性的循環關係，也使得安吉生態博物館、安吉城鄉規劃和安吉城鄉發展成為一種循環關係，博物館化成為這兩者循環關係的主要動力來源。在安吉縣的規劃發展，生態博物館作為一個契機，通過博物館的實踐過程，來刺激城鄉空間的主體性，並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主導下，帶動城鄉的發展，拉近城鄉之間的距離。安吉生態博物館群作為一個統一的文化載體，分散在全縣各個村落，影響地方建設，帶動城鄉發展。安吉生態博物館作為中國第三代生態博物館，能夠代表生態博物館逐漸走向社區、鄉村的事實，同時安吉縣提出的美麗鄉村政策作為中國鄉村發展首要政策，能夠代表重視鄉村發展，並且朝向城鄉融合發展的方向，因此中國的生態博物館，透過對博物館化的過程，從文化、經濟等層面的博物館化，來實現城鄉發展。同時，「安吉模式」成為一種經驗用以廣泛推廣至全國，因此安吉縣的城鄉發展能夠代表城鄉發展的一種「中國經驗」。

最後，本研究以安吉縣的博物館為例，探究中國「生態博物館」概念與城鄉發展的關聯性，借以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兩個領域的理論，來闡述兩者之間的連結。但生態博物館是在不斷動態發展著的，中國生態博物館也將會有第四代、第五代等的代際關係，因此安吉案例僅能代表著當前已發展的第三代生態博物館實踐。另外，安吉縣的特殊性在於鄉村政策的實踐引發的博物館化現象，並且安吉縣位於中國東部發達地區，其經濟發展也完全不同於中西部等內陸縣城，因此本研究在地域上的局限性尤為明顯。本研究寄希望於在新博物館學和空間規劃領域有所發展，但多有未盡之處，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于國華(2008)，《流留補償：基於生態博物視野的鄉村化產業研究》，台灣：索引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王大偉、孔翠芳、徐勤賢(2021)，〈中國百年城鄉關係——從農村包圍城市到城鄉融合發展〉，《區域經濟評論》(3)：5-12，河南省社會學學院、中國區域經濟協會。
- 王秀玲(2023)，〈安吉生態經濟發展模式探討〉，取自中國農村網，網址：<https://reurl.cc/p5GGvb> (取用日期：2023/09/15)。
- 王政琪(2017)，〈包容性城市重在共用——訪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於海〉，《人民日報》(17)，取自人民論壇網，網址：<https://reurl.cc/E1AAya>(取用日期：2022/03/12)。
- 王嵩山(2004)，〈博物館——全球化與地方性〉，《博物館學季刊》18(4)：5-6，台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尹凱(2017)，〈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種生態博物館的路徑〉，《民俗研究》(5)：21-28，山東大學。
- 孔祥智(2021)，〈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新中國城鄉關係的演變及發展趨勢〉，《農民日報》(2021年5月8日，第003版：三農論壇)，農民日報社。
- 孔祥智、張效榕(2018)，〈從城鄉一體化到鄉村振興——十八大以來中國城鄉關係演變的路徑及發展趨勢〉，《教學與研究》(8)：5-14，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
- 朱言、劉斌(2022)，〈安吉：開啟全域鄉村經營新視野〉，《浙江日報》(2022/11/09)，取自人民融媒體，網址：<https://reurl.cc/7MagoN>(取用日期：2023/10/31)。
- 安吉縣博物館(2020)，〈安吉縣博物館(諸樂三藝術館)三服務之文化下鄉——助力2020年遞鋪街道鶴鹿溪村首屆文旅節〉，取自微信公眾號安吉縣博物館，網址：<https://reurl.cc/blvLel>(取用日期：2023/09/20)。
- 安吉縣博物館(2022)，〈「身邊的文化遺產」博物館微課堂進校園〉，取自微信公眾號安吉縣博物館，網址：<https://reurl.cc/6Q81ed>(取用日期：2023/09/20)。
- 安吉縣博物館(2022)，〈安吉生態博物館群清單〉，為博物館內部統計資料。



- 安吉縣博物館(2022)，〈報名通知：第九屆小小講解員培訓開始報名〉，取自微信公眾號安吉縣博物館 網址：<https://reurl.cc/6Q81Rr>(取用日期：2023/09/20)。
- 安來順(2011)，〈有匪君子 仰之彌高——深切緬懷蘇東海先生〉，《中國博物館》(3)：3-6，北京市：中國博物館協會。
- 安來順(2011)，〈國際生態博物館 40 年：發展與問題〉，《中國博物館》(2011 合刊：15-23)，北京市：中國博物館協會。
- 李秉霖(2006)，〈保存的政治與展示的經濟：十三行遺址的博物館化〉，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李思薇(2019)，〈複刻記憶：美術館中的王大閔自宅〉，《博物館與文化》(17)：97-127，台北市：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 呂建昌、嚴嘯(2013)，〈新博物館學運動的姊妹館——生態博物館和社區博物館辨析〉，《東南文化》(1)：111-116，南京市：南京博物院。
- 孟凡行、蘇東海、方李莉、安麗哲(2017)，〈生態博物館建設與民族文化發展——以梭戛生態博物館為中心的討論〉，《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4)：128-140，貴州省：凱里學院。
- 姚禹陽(2018)，〈「安吉模式」對我國美麗鄉村建設的啟示〉，《現代化農業》(3)：37-38，黑龍江省：黑龍江省農墾科學院。
- 秦富、徐偉軍、江文濤、弓秀雲(2006)，〈「十一五」時期我國農業投資需求研究〉，《農業技術經濟》(01)：2-10，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
- 徐偉(2013)，〈論中國城市化包容性發展戰略〉，《甘肅社會科學》(5)：156-159，甘肅省：甘肅省社會科學院。
- 陳少非(2020)，《安吉本紀——一座小城的 1830 年傳奇》，北京市：北京紅旗出版社。
- 陳其澎(2011)，〈論展示在博覽會與博物館的角色〉，《建築學報》(76)：47-71，台北市：台灣建築學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 張明門、王雅莉(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包容性發展研究〉，《城市經濟》(10)：6-11，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
- 張岩松(2013)，〈統籌城鄉發展和城鄉發展一體化〉，《中國發展觀察》(3)：8-12，中國發展出版社。
- 張海鵬(2019)，〈中國城鄉關係演變 70 年：從分割到融合〉，《中國農村經濟》(3)：2-18，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

- 張強(2013),〈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研究與探索〉,《中國農村經濟》(1):15-23,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
- 張譽騰(1996),〈生態博物館的規劃理念和個案解析〉,《博物館學季刊》10(1):7-18,台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張譽騰(2003),《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 黃衛琴(2018),〈安吉生態博物館群讓「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活起來〉,取自《每日頭條》,網址:<https://reurl.cc/dmYK1D>(取用日期:2022/02/28)。
- 董元亮、馬軍山、潘琤琤、林國苗(2013),〈露天博物館概念在鄉村景觀專案中的應用——以「浙江嘉興聚寶灣鄉村公園景觀設計」為例〉,《中國城市林業》11(1):38-41,浙江省:浙江省林業局。
- 湖州市人民政府(2021),〈從「千萬工程」到「安吉模式」〉,取自湖州市人民政府網,網站:<http://s8u.cn/hTNdA>(取用日期:2023年11月5日)。
- 費孝通(2008),《鄉土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
- 楊汶、戴煒(2013),〈建國初期蘇聯博物館事業對中國的影響〉,《文史博覽》(2):9-12,湖南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
- 楊衛麗(2023),〈「大余村 O₂生態文化圈計劃」發佈〉,取自安吉新聞網,網址:<https://reurl.cc/9RldoO>(取用日期:2023/11/01)。
- 雷達婭(1956),〈蘇聯地誌博物館的科學研究工作——在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文物參考資料》(6),文物出版社。
- 新華社(2014),〈中國美麗鄉村指數首次發佈:浙江安吉成為首個範本〉,取自人民網,網址:<https://reurl.cc/an0yW9>(引用日期:2022/3/7)。
- 趙慧君(2017),〈地方性或全國性:新中國成立初期地誌博物館宗旨變遷〉,《博物院》,2017(4):73-77,北京市:科學出版社。
- 慕思勉(1999),〈臺灣的異質地方——90年代地方或社區博物館的觀察〉,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蔣永穆、胡筠怡(2022),〈從分離到融合:中國共產黨百年正確處理城鄉關係的重大成就與歷史經驗〉,《政治經濟學評論》(2):13-2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廣西民族博物館(2020),〈中國生態博物館的「進化史」〉,取自廣西民族博物館官方網站,網址:<https://reurl.cc/zZg9Vy>(引用日期:2022/3/7)。
- 鄧慧超(2015),〈安吉生態博物館試析〉,陝西師範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學

位論文。

潘守永、黃承文、劉欣(2014)，〈生態博物館案例：浙江安吉生態博物館群的規劃和建設〉，《旅遊規劃與設計》(11)：66-71，北京市：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蘇東海(2009)，〈國際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分化與整合——博物館研究的兩條思想筭記〉，《東南文化》(6)：9-14，南京市：南京博物院。

權衡(2016)，〈包容性城鎮化是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踐形式〉，《文匯報》2016年6月10日，網址：<https://r41.life/J4o8u>(取用日期：2023年11月10日)。

Crang, Mike. (2003)，《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王志弘、餘佳玲、方淑惠譯)，台北市：巨流圖書有限公司，(原著出版於1998年)。

Cresswell, Tim. (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王志弘、徐苔玲譯)，臺北市：群學。

Q·F·彼得羅夫(1958)，〈地誌博物館的事業範圍及其舉辦陳列的原則〉、〈改造地誌博物館工作的當前任務〉，《博物館譯業》(第二輯)：10，北京市：文物出版社。

Varine, H. D、張晉平 (2005)，〈20世紀60-70年代新博物館運動思想和「生態博物館」用詞和概念的起源〉，《中國博物館》(3)：25-27，北京市：中國博物館協會。

英文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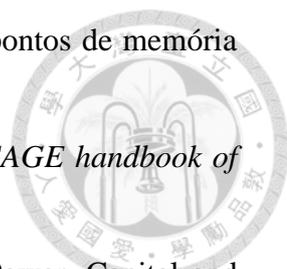
Anttiroiko, Ari-veikko & Jong, M. D. (2021). *The Inclusive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eating Shared Urban Prosperity City* (1st ed.). Palgrave Pivot.

Ashworth, Gregory J. & Graham, Brian J. (2015). "Heritage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st-war European Cit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war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ykaç leidholm, Pinar. (2019). Musealization as an Urban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ltanahmet District in Istanbul's Historic Peninsul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45(6): 1246-1272.

Baudrillard, Jean. (1981).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Galilée.

Cambridge, Matt. (2007). *Comment: The Architecture of Aftermath*. Art book(London, England),14(3): 56.

- 
- Cristiane, L & Eliane, R & Álisson, F. (2023). Musealização em pontos de memória brasileiros. *Cadernos De Sociomuseologia*, 65(21): 31-42.
- Crysler, Greig & Heynen, Hilde & Cairns, Stephen. (2012). *The SAGE handbook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 Daherr, Rami Farouk. (1999).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Capital and Culture in an Emerging Jordanian Heritage Industry.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10(1): 39.
- Davis, P. (2011).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2nd ed.). A&C Black.
- Desvallées, André & Mairesse, François . (2009). *Key Concepts of Museology*. ICOM.
- Dolák, J. (2017). O museólogo 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 – Conceitos básicos. In B. Brulon & A. Baraçal (Eds.), *Stránský: uma ponte Brno – Brasil*. ICOFOM.
- EBRD. (2017). *Economic Inclusion Strategy (EIS) 2017-2021*.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Edward C. Relph.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 Edward M. Bruner,r. (1993). Introduction: Museums and Tourism. *Museum Anthropology*, 17(3): 6.
- Fainstein, Susan S. & DeFilippis, James. (2015).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 (4), Chichester. West Sussex : Wiley Blackwell.
- Gibson-Graham, J. K., & the Community Economies Collective. (2017). *Cultivating Community Economies: Tools for Building a Liveable World*.
- Gosepath, S. (2011). *Equality*.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1 Edition).
- Guedes, Leandro L. (n.d.). (2021). Shifting Paradigms in Musealiza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Rio de Janeiro Indian Museum. *ICOFOM Study Series*, 49(1): 91-106.
- Huyssen, Andreas. (2003).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H. (2009). *Equity in Development: Why it Is Important and How to Achieve I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Knapp, Verlag Armin (2004) , *Zusammenarbeit mit dem Cubanischen Fremdenverkehrsamt* (eds.), Kuba Urlaubs Tipps 2005. Frankfurt, Germany: Verlag Armin Knapp.
- LeGates, Richard T & Stout, Frederic & Larice, Michael. (2012). *The Urban Design Reader*. Routledge.
- Lin, Francis Chia-hui. (2021). *Asian Museums' Historiographical Musealisation: Discussion on the Asian Built Displayness* , 博物館研究專刊第 008 號. Taipei: National Taiwan Museum 2021: 329-360.
- Liu, Zhaowen & Jong, Martin de & Li, Fen & Brand, Nikki & Hertogh, Marcel & Dong, Liang. (2020). *Towards Developing a New Model for Inclusive Cities in China—The Case of Xiong' an New Area*. 12 (15): 6195. Switzerland: Sustainability.
- Muller, M. (1999). Musealisation, aestheticis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 4(1): 361-367.
- Nelle, A. B. (2009). Museality in the Urban Context: An Investigation of Museality and Musealisation Processes in Three Spanish-Colonial World Heritage Towns.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14(3): 152-171.
- OECD. (2011).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Social Cohesion in a Shifting World*. Paris: OECD.
- Orbaşlır, Aylin. (2000). *Tourists in Historic Towns: Urban Conservation and Heritage Management*. London: New York.
- Ortlieb, R., & Sieben, B. (2014). The Making of Inclusion as Structu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of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33(3): 235-248.
- Porter, M. E., & Kramer, M. R. (2011). Creating Shared Value: How to Reinvent Capitalism—and Unleash a Wav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9(1-2): 62-77.
- Rixon, D. (201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Public Sector Agencies: Ascending the Rungs of the Accountability Lad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3(7): 347-356.
- Silver, H. (2015). The Contexts of Social Inclusion. *DESA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Smith, T. (2006). *The Architecture of Aftermath* (New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ares, Brulon, B. (2019). Museus, patrimônios e experiência criadora: Ensaio sobre as bases da museologia experimental. *Museologia e Patrimônio*, 12(1): 199-231.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Vergo, Peter. (1997). *The New Museology*. Reaktion Books.

Vilcea , C, Popescu , L, & Nită, A. (2023).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as Cultural Heritage In Situ—Perspectives from a Medium-Sized City. *Heritage*, (6): 4514-4526.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https://reurl.cc/bl0j76>.

